

重庆陶研文史 (季刊)

主 管：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主 办：重庆市陶研会文史委员会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顾 问：宋乃庆 贾培基 杜积西
邝忠炽 李一林 孙丹年
邹尚智 孙朝云 罗春秀
主 编：张和松
副主编：郭 华
编辑部主任：代建佗
编 委：张和松 郭 华 魏 蓉
杨 明 蔡春洪 王天海
邓玉洪 夏 颖 刘 刚
唐智松 于 波 代建佗
编 辑：贾振婷

准印证：渝内字(01)-(062)号
电 话：023-68519132
传 真：023-68852884
邮 箱：cqyctyh@163.com
邮 编：400050
出版日期：2023年3月
地 址：重庆市谢家湾正街92号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内
设计编排：重庆巨典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收录网站：维普资讯网
www.cqvip.com

行知思想

普及什么教育……………陶行知 (1)
大众读书谈……………陶行知 (2)
大众画报——一个需要·一个建议……………陶行知 (5)
亭子间工学团——跟华荣根学……………陶行知 (6)
是谁不灵……………陶行知 (7)
跟西桥学……………陶行知 (8)

学陶师陶

陶行知的人才教育简述……………夏德清 (9)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张文郁 (18)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取向
……………王建平 (23)
陶行知：爱满天下……………黄亚栋 (28)
向陶行知请教“双减”答案……………储朝晖 (31)

流金岁月

往事回顾——在《流淌的岁月》文友座谈会上的发言
……………贾培基 (34)
如诗如歌的育才学校专业组（连载之五）
……………孙朝云 (37)
回忆在上海育才学校的日子……………马 腾 (51)
陶行知和吴树琴的患难之爱……………沈俊峰 (54)
沧桑感喟话“特园”……………杨耀健 (56)
李公朴：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胡平原 (62)
杨秉孙从难童到小提琴家的坎坷人生……………罗昌遐 (66)
沉痛悼念程代辉同志……………《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68)
沉痛悼念周令钊同志……………《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69)
沉痛悼念姚文忠先生……………《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69)

教育教学

- 析文感情，因情育人——浅谈陶行知“情育”思想与语文教学·····戴建新（70）
- 跟着名家学写作，巧摹经典成佳文——谈中考散文类文章的修改润色·····李龙云（72）
- 运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进行有效作文教学初探·····肖晓旭（76）

育才风采

- 育才科创 | 育才学子荣获重庆市中小学生科技节表彰“大满冠”·····重庆市育才中学校（81）
- 亚洲亚军！育才学子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设计了一座太空港·····重庆市育才中学校（84）
- 全市第一 | 育才多名学子入选重庆市2023年“英才计划”·····重庆市育才中学校（88）
- 誓师冲刺 | 决战百日，折桂蟾宫，育才加油！·····重庆市育才中学校（90）

普及什么教育

文/陶行知

这些年来教育是给镇江醋浸透了。一提起教育两个字就觉得酸溜溜的，谁也不愿把它普及。的确，教育是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它是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1]。如果把这种教育普及出去，中华民国简直要成为一个中华少爷国，中华小姐国，中华政客国，中华书呆国。更加确切些，简直要成为一个中华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共和国，真要不打而自倒了。所以我们开始必得声明，我们所要普及的，不是少爷教育，不是小姐教育，不是政客教育，不是书呆子教育。我们所要普及的是：自动工学团。什么叫自动？自动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自动教育是教大众自己干，教小孩自己干，不是替代大众、小孩干。

什么叫做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

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是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

工学团可大可小，从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几十个人的学校、庙宇，几百个人的村庄、监狱，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

团不是一个机关，不是一个工学的机关。假使它只是一个工学的机关，那便成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改良学校而不是工学团。团是团体，是力的凝结，力的组织，力的集中，力的共同发挥。

【注释】

原载1934年2月16日《生活教育》第1卷第1期。

[1] 乌烟 即鸦片。

大众读书谈

文/陶行知

一 卖报孩子

“你们把报卖给别人看，自己也能看报吗？”

“看不懂。”

“读了书，就会看报，你们愿意读书吗？”

“愿意的，可惜没有人教。”

“我们请一位先生来教你们，好不好？”

“好的。先生哪一天来？”

“说来就来。你们早报什么时候卖完？”

“十点钟。”

“晚报什么时候卖？”

“五点钟就要去贩报来卖。”

“你们要读书，总得要找一个地方。哪家的房子大些，可以去借借看。”

“吕公义家里大些，和他妈妈说说看。”

“读了书，要教人。我们请先生来教你们，你们还要教家里的人和邻居的穷孩子，愿意不愿意？”

“愿意的，不会教人怎么办？”

“读一课，教一课，怎么不会？如果真的不会，请教先生。”

“好的。我教妈妈好不好？……我教小妹妹行吗？”

“行！每个人教两个人。一面温书，一面教人，把别人教会了，自己的功课也温熟了。一弹打中两只鸟，对不对？”

“对！一弹打中两只鸟。”

吕公义得到妈妈的许可，卖报儿童工学团出世了。这里有一张八仙桌，凳子不全，有些小孩

子要站着上课。黑板、地图是捐来的。一位青年天天来尽义务，来教他们二小时。他们每人要教别人半小时。他们靠卖报吃饭，卖报就是他们的工。每天求些新知识，就是他们的学。有了这个小小组织，遇事大家商量，就是他们的团。这是一个小小工学团。这是一个文化细胞。他们已经读完四册“老少通”，接着读“高级市民课本”^[1]，并学看他们自己所卖的报。

二 小农人

“你们办的儿童工学团有几个小先生？”

“九个。”

“有几个团员？”

“八十几位。”

“你们遇着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做了小先生，全天在团里工作，家里少了一个人，事做不了，饭不够吃，父亲埋怨哟。”

“你们父亲怨得很对。你们为什么丢掉饭碗、工作来做小先生啊？”

“那么，怎么办呢？”

“你们素来在家里干什么事？”

“跟父亲种田、种菜、种瓜、守牛……”

“好，种田的仍旧种田；种菜的仍旧种菜；守牛的仍旧守牛。抓住你的饭碗求学，抓住你的饭碗教人。每天学一点钟，教一点钟，试试看。”

“这样，家里的人就高兴了。不过儿童工学团的功课不是减少了吗？”

“那是当然的。如果不减少功课，这个工学

团就要变成一个吃人的学校，而不是一个自救救人的工学团了。”

“对！我们九个人轮流来教。”

在这个方针指导之下，杭茂祥小先生来信说：“我在农场上种了西瓜，常常要捉虫浇水。我从做上学种西瓜的方法。现在正有很大的西瓜结着。我的试验成功，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啊。”杭金洪小先生也来信说：“在九个小先生之中，分两班，一班在上午教人，下午回家工作；另一班在下午教人，上午工作。”

“小先生有饭吃了。”这“有饭吃了”四个字是说得容易，但是抓住工作去求学教人，是小农人上进的重要法门，那是无可怀疑的了。

三 女工

“你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

“我们厂里十二点钟放工人出厂吃饭，一点钟才许工人进厂做工。我们吃饭只需十分钟，足足有半小时闲着，常常有男人跟着我们钉梢，实在讨厌。因此我向姐妹们提议大家来读书，赞成的有二三十人，我们就开办了。”

“你们怎样借到这个课堂？”

“起初我们是在一个弄堂里露天上课，那些男人还是跟来围着。我们不得已，只好和这里校长商量借一个课堂给我们。本来小学校是十二时放学，一时半上课，课堂是空着，校长又热心，就借给我们，从此我们是能安心了。”

“我看你教得很好，你是在哪里读过书？”

“我在民众夜校里读过书，现在还是每天晚上去求学。”

“你为什么要这样吃苦教人？”

“我既得了一点小学问，就应该帮助我们小姊妹。这是我的责任。我很高兴干，并不苦。”

这位热心的女工，早上要走八里路上工，晚上要走八里路回家。除了做十一点钟工外，午刻要教半小时功课，晚上要求一小时学。她的学校已由二三十人增加到一百人，由一校而分为两校。我十分高兴地提出这位新时代的女子来做我们的表率。我不愿意说出这个学校的地址，因为一说出来，一定有许多人要去参观，她们只

有半小时，哪有这许多工夫来招待呢？读者如果一定要参观，即请各人自己办它一个，就近参观好了。

四 识字农人

“你从前在哪里读过书？”

“在私塾里读的。”

“读了多少时候？”

“八个月。”

“操先生^[2]来过后，你跟他学过多少时候？”

“两个月。”

这是一年半前我和孟根根的对话。那时他拿了他亲笔写的五万字的日记给我看，使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暗示。一位受了八个月私塾死教育的农人是一封信也不会写，经过两个月的新启发，居然能把死字活用，写出生动之农人文学，这不是一件大事吗？在私塾教育的基础上改造农人的头脑与文化是我们今后必须努力的一件工作。改造现存的私塾，使这基础易于接受现代文化，更是农人读书之一大助力。

五 送花车夫

“你们这样夜深呆等在这个荒野的地方做什么？”

“等农人送花来，拉到上海去。”

“天天在这儿等吗？”

“风雨无阻，天天来的。”

“什么时候等起，等到什么时候？”

“从晚上十时要等到十一时。十二时是必须拉到。”

“有几部？”

“二十部。”

“你贵姓？叫什么名字？”

“我姓王，名字叫兆其。”

“我去请一位先生，天天晚上在桥边教你们读书好不好？”

“欢迎。我们一到这里就读，等到花来就歇，每晚可以读一个钟头咧。”

义务先生已经请好，正在预备开课了。

六 小车上流动工学团

“你贵姓？”

“我叫老吴。”

“你这部车能推几个人？”

“男人六个，女人十个。”

“你推来这些女人做什么的？”

“她们是纱厂工人。”

“几个钱推一趟？”

“包月的。每月一元四毛大洋一个人。每天一接一送。”

“每天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接？”

“我早上五点钟推她们去，要到五点三刻才到厂。晚上六点钟我去工厂旁边等她们，要到六点三刻才能把她们送回家。”

“你每天推几个人？”

“有九个人包了我这部车。”

“好，吴大哥，谢谢你！你车上这九个人当中有认得字的吗？”

“那个，我不知道。”

谈了这几句话，在我的脑袋中浮出了一个小车上的流动工学团。在小车上教女工读书是一件极自然而经济的事。我们如果在每部车上找到一两位识字的女工，这件事就会办得成功。叫识字的坐在中间，不识字的坐在两边，拿起书来教，这是多么便当啊。手车是手工艺时代最高之发明。除非是上海交通制度起了根本的变化，这手车是什么东西也打它不倒。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都不能把它排挤掉。一部车上坐十个人，每人一元四角，车夫再推一些零星客人，就可以糊口。女工每月出一元四毛便可坐六十次车，每次十里只花铜板八个，那是最经济了。现在已经有人自告奋勇，试办手车流动工学团，我们预祝它的降生吧。

【注释】

原载1935年7月25日《读书生活》第2卷第6期。

[1]高级市民课本 由陶行知主编，世界书局印行的民众教育教材，分为国语和常识两种读本。

[2]操先生 即操震球。

大众画报

——一个需要·一个建议

文/陶行知

识字运动展开了，普及教育的呼声是得到全国的响应了，读完《千字课》的成人儿童是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们再读什么？”“我们有什么报可以看？”这是大众时常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答复，因为几家大书局里都出了高级民众用读本及民众用丛书，尽可选择介绍；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把我们难倒了，有什么报可以给粗识字义的大众看？大报写的是文言，又无标点符号，依大众看来，真是漆黑一团，除了知识分子及中等以上的商人谁也不懂。小报、周刊、半月刊多数是用白话文写，也有标点符号，但因西化语法太多，大众也不能看得十分明白。画报是有资格受大众欢迎的，但是有些画报，编排复杂，说明难寻，有时也是文绉绉的，使得大众只是看画而不知道画中的意义，并且价钱太贵，一般大众决不能把两天的饭钱省下来买一份画报看。大家要看报，而中国现在是没有一个报

能给大众看得懂。因此，我想向作家及出版界提出一个建议：

“编辑出版一种真正的大众画报。”

这种大众画报采取日报、三日报、周报、半月报、月报，都有需要，但应当符合下列五种条件：

- （一）灌输现代知识，培养前进思想；
- （二）用大众语写，要趣味胜过正经；
- （三）用连环图画写，要图画多于文字；
- （四）编排清楚；
- （五）价钱便宜。

如果能合上面所说的五种条件，这种画报必可成为普及教育的一种最重要的工具。大众得了它必是如同大旱得了大雨一样的快乐。我是天天望着这样有意义的画报出现啊！

【注释】

原载1935年12月1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19期。

亭子间工学团

——跟华荣根学

文/陶行知

华荣根，父母以卖花为业，租得亭子间一所，同时是工场、卧室、饭厅。荣根还在里面办了一个小小工学团，教八个穷小孩。他每天还跑五里路去求学。我参观时大受感动，回来写了几首小诗，愿弄堂里的穷孩子都学华荣根和他的小学生。

（一）

吃饭也在此，
睡觉也在此，
做工教学都在此：
富翁愧死。

（二）

爸爸也卖花。
妈妈也卖花。
字儿认得一大担，
大如东瓜。

（三）

跑五里路来。
跑五里路去。
去是教人来求学，
风雨无阻。

（四）

学一两点钟。
教一两点钟。
他有一个大信仰：
知识为公。

【注释】

原载1935年12月1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19期，收入本集时加了前面一段文字，诗句也有个别改动。

[1]亭子间工学团 亭子间原为上海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位置多在房子后部楼梯中侧，租金较正房便宜很多，常为经济困难者所租用。该工学团因设在上海的亭子间内而得名，其创办者为方友竹，即方明。

是谁不灵

文/陶行知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要人告诉他说：‘上海的小先生不灵，失败了！’”我安慰我的朋友说，小先生没有失败啊，真正失败的不是小先生。且听我说来。

一次我把一架干电收音机送给一位好朋友，并写了一张说明书给他保存，指示他如何管理，如何换电，哪里灌电，哪里买干电。起初他用这架简单的收音机，不用接电线和天线就能听见许多好听的音乐，他很高兴。过了一个多月，当我再到他家里会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的收音机不灵！我问他可曾依照说明书办。他说没有。我叫他把说明书找出来，让我再指点他一番。他去找了好久，回来说，找不着了。我去找了一位无线电的小先生来为他的收音机医治一下。收音机复活了！

今年夏天上海有好些学校都叫高年级小学生到家里去教人。大先生好像是对小学生说过这样的话：识字可以救国，你们可以乘暑假去教一两个人，帮助扫除文盲，等到开学，再来报告成绩。说了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他的责任就算尽了，以后再也没有过问。开学后一查，没有多大成绩，一口咬定说：小先生不灵！这样的大先生

和断定那架收音机不灵的朋友是道同志合。小先生受了这种冤屈到哪里去伸？

一个农人要想有些收获不是撒播几把种子就算了。他把种子撒下之后，必须锄草、分栽、施肥、灌溉、除虫、抵抗剥削，从事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有碗饭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固然不对；只想收获，懒得耕耘，何能有成？

所以与其说是小先生不灵，不如说是大先生不灵。若不然，翁家山^[1]的小先生又何以灵？南通教导十四万人的保甲小先生又何以灵？

小先生这个办法还没有一个地方好好地给它试行过。人都说安徽是全省推行教生即是全省推行小先生。其实，安徽对于小先生只是像私人劝导的干法，不能算为一个真正的试验。新近广西才预备认真地开始作有系统的进行。小先生的足迹虽已跑进二十五省市，但唯一的有系统的实验，到现在还只有广西。小先生运动还只有前哨的接触，现在就断它失败，是未免太早一些。

【注释】

原载1935年10月15日《晨报·普教周报》。

[1]翁家山 指白动生领导的杭州翁家山小学。

跟西桥学

文/陶行知

村里没有钱，办不起学校，怎么办？

等等等，等到胡子白还没有地方求学，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跟西桥学！

西桥是一个江南的穷苦的农村。去年春天西桥有一位觉悟的苦学生，名叫承国英的，在这里邀集了几位农友，开办了一个西桥小学。承君除自己尽义务外，还以他的稿费供学校开支，农人也尽力担负。村外朋友看见他们干得起劲，也时常来一点小帮忙。他们干了两个月便加入普及教育运动，小朋友几乎每人都做了小先生，精神十分充足。

不久，旱灾来到，农村几乎破产。出版界的不景气又堵住了稿子的出路。承君忧劳过甚，不得不来沪暂时休养。大家都以为西桥要停顿了。

奇怪得很！西桥不但没有停顿，并且干得更有精神。

现在西桥小学是在六位小先生手里，这六位是第一代小先生。他们已经把六十几位小学生统变成第二代小先生。西桥的小学生是没有一个人不做小先生，更有意义的是那六位主持的小先生轮流依时刻来校教人自修，余时仍在田园里或家庭里做工赚饭吃。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真正的儿童自动工学团了。它指示了中国普及教育一条正确的路线。

我最近收了西桥小先生几封信，大受感动，特在本期通讯栏介绍给大家一看，想大家也必受同样感动。

原载1935年9月1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13期，最末一段在收入本集时被删去。

陶行知的人才教育简述

文/夏德清

人才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四、五十年前，陶行知先生就人才教育的缘起、概念、培养目标、方法，以及人才教育与天才教育、基础教育、普及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都作过深刻的阐述。并以育才学校作为培养人才之基地，论述并探讨了培养特殊人才之幼苗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就陶行知先生关于人才教育的理论作一简要的叙述，以期引起研究。

一、人才教育的缘起

一九二〇年，陶行知先生大声疾呼，要培养“第一流的教育家”！所谓“第一流的教育家”，按陶行知先生所设想的标准，就是：“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有胆量开阔的人”。前者是“创造的教育家”，后者是“开阔的教育家”，两者“都是第一流的人物”“第一流的教育家”，亦即“教育界”的“第一流”的“人才”并告诫人们：“大丈夫不能舍身试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岂能随便去！”^[1]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奔波于平民教育运动中，他写了一首诗，诗云：“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2]一九二七年六月，陶行知先生写了《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上，不算是好汉！”^[3]

诗言志，歌咏言！陶行知先生以此“自勉并勉同志”。

在晓庄时期，一些有为的青年，因不满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统治，和生活中的悲观失望，常常在距晓庄不远的燕子矶投江自尽。陶行先生知道此事，甚为惋惜。“为了力求挽救”他在“燕子矶头竖立了两块大木牌，分别亲笔题了六个大字：‘想一想！’‘死不得！’还分别写了警句：‘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努力而死。’”在陶行知先生的启发下，原来有些企图从燕子矶头自杀的人醒过来了。

这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培养“第一流的教育家”“做一大事”“好汉”，以及为“中国……农民努力而死”的教育，就是“人才教育”。但是这种人才，究竟由什么学校造就？究竟用什么方法养成？陶行知先生说，“这，可算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4]

事隔十年后的一九三八年，陶行知先生从国外二十六国宣传抗战回国，途经香港时发表谈话，表示愿在抗战中从事三件大事，即回国三愿，这三愿都与人才教育息息相关。如，第一愿，“选拔难童办一个试验培养‘人才幼苗’的学校”；第二愿，“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后来，育才学校在艰难中“逐渐长大”。晓庄学院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批准就不能公开招生，“而只好成立由少

数人筹款和约集少数研究人员组成的私人研究机构”，培养高级研究人员。

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要创办难童学校，从事人才教育，培养特殊人才呢？

一九三九年，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谈到：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一次，“路过长沙、汉口时，看到难童中也有一些特殊才能的小孩”，“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又有一次。他在重庆临时保育院参观，对一些阔人及教授们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儿子一事时，他说，“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以上三个印象，在他的脑子里“各各独立存在了很久。有一天，忽然这三个意思凝聚起来了”。于是他“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5]一九四二年，在《致育才之友书》中，他指出创办育才学校是“由五种动机结晶而成”。这“五种动机”，更加系统地说明了陶行知先生从事人才教育、培养特殊人才之幼苗的动机或原因。

那五种动机呢？

第一，是爱迪生的幼年生活。爱迪生幼年喜欢动手做科学试验。学校以此便把他开除了，幸亏他有一位好的母亲支持并帮助他，使这位“仅仅受了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也就成为一位现代的大发明家。”^[6]

第二，是法拉第的幼年生活。他幼年在书店铺里一面订书，一面读书，“书订好了，头脑也吃饱了”。当别的徒弟到利波老板那里去告状，利波老板不仅不批评、责难法拉第，还“宽容”、鼓励他，致使法拉第后来成为发电机原理的发明者、杰出的大科学家。^[7]

第三，是法国邮船上之所见。

一九三八年八月，陶行知先生从埃及乘法国邮船回国，出了红海，看见一位四岁光景的外国小孩随着不同乐曲跳着不同的舞姿，作出种种表

演。陶行知先生看了后，认为小孩之音乐天才，从小便可测验。^[8]

第四，是湖北临时保育院之所见。

一九三八年十月，陶行知先生和作曲家任光先生一同乘船来到武汉。在武汉看见一位害癫痫的小朋友指挥小朋友们唱歌唱得很好，后陶行知先生请任光先生教他音符和拍子，这位小朋友在三天内竟将一支不曾听过的歌用音符记录下来，陶行知先生颇有感触地说：“一个没有音乐才干的人是三年也不见得能学会。”^[9]

第五，是在重庆临时保育院所受之感触。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陶行知先生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院长告诉他常有一些达官贵人和大学教授来院选择干儿子，不管有无才能，唯有长得漂亮就要。而且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些难堪的话，使他们蒙受侮辱。当时陶行知先生表示，“我若来选，只问他有无才干。倘使有才干，虽是秃子、麻子、缺嘴都要。我不要他们做干儿子，只是为民族培养人才之幼苗。”^[10]

以上五个印象，使陶行知先生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一所为“新中国培养人才之幼苗”的育才学校，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核心——重庆北碚附近的草街乡古圣寺诞生了。

经过七年的艰苦创业，育才学校在万分艰难中熬过来了。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不少优秀人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虽然陶行知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请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去育才讲学，但由于环境恶劣，于培养人才设下了很多极为不便的条件。因此，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夜与到延安去的柳湜一席话，倾吐了他对解放区培养人才的向往。陶先生说：“回去也好，还是搞教育罢！把它搞通，你那里有条件可以造就一些真正的人才”（柳湜：《记最后一夜》《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145页）并接着说：“今天解放区内，我们有的是工作条件，并且现在的工作已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我看，最重要的就是你说的，不搞教条，我一生就

是反对教条,因此什么地方都能工作,随时都找工作的机会,要有根据地(指教育园地——夏注),重视创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同上)事实上也是如此。通过革命实践,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陶行知先生把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希望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教育,不断鼓励他的学生、战友跑向解放区,奔向革命,为革命培养人才。

二、人才教育的概念

什么是人才教育?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陶行知先生赋予它以不同的内容。

在二十年代初期,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发现“英才”、培养“有胆量创造的人”“有胆量开阔的人”,为教育上的“人才教育”。对于中国办学之初,在二十年代伊始的平民教育时期,陶行知先生当时主要致力于平民教育,而对另一部分专门提倡人才教育的人只顾一端表示异议,他说,“平民主义的影响,中国办学之初,大家心目中只知有人才教育”当时一些人所要推广的学堂,“只是培养人才的学堂”。“培植人才,以济时艰”,是当时提倡学务的人的共同心理^[11],而忽视了另一端:“平民教育”。并强调他之所倡导的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富贵贱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把它沟通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12]

在三十年代中期,陶行知先生提出了什么是人才教育,揭露并批判了旧教育摧残人才教育的罪恶。他说:“从前中学以上采用文言文,是根据一种似是而非的人才教育论,以为士大夫便是人才,能读古书便是人才。殊不知人才的解释,是抱有学计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的人……今日之学校名为造就人才,实在是造就三种人:一是少爷,二是小姐,三是蛀书虫。”并对“抱有学术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的“新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这种人才所说的话,是大众能听懂的话;所写之文是大众能懂之文。故培养学术人才的学校应该注重的也是大众能懂的白话文,非大众不能懂的文言文……大众的要求,儿童的

要求、新人才的要求,都是逼着白话文进展。而不让文言复辟”。^[13]

在三十年代末期,陶行知先生提出“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创办育才学校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14]

在四十年代中期,陶行知先生更加明确更加系统地阐明了人才教育的概念特征:

(1)人才教育是“属于国民教育范畴之外的一种因材施教”的教育。

(2)人才教育是指“如有特殊才能的,应加以特殊的教育。使其才能充分发挥”^[15]

以上这些,是陶行知先生关于人才教育的概念的基本思想,直到现在,它仍不失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既要看到在各个年龄阶段上,不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的特征,我们把它称为共同特征,又要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差异。这种差异,我们把它称为“特殊才能”,针对这种“特殊才能”,我们加以“特殊的教育”或“培养”,使其“特殊才能充分发挥”成为“不断地为老百姓服务”^[16]的专才。

三、人才教育的目标

人才教育的目标是人才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它在人才教育的整个活动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陶行知先生明确地提出了育才学校的人才教育的目的。他说:“创办育才学校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这样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地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地生长繁荣。”^[17]

人才幼苗之发展的人是育才学校人才教育的目标。这种目标,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是“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这样,“才不致成为乌托邦的幻想”。^[18]

人才幼苗之发展的人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陶行知先生认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要引导学生们做到：

- 1.团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
- 2.团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
- 3.团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
- 4.团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19]

与此同时，陶行知先生特别强调“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必须在此说明”，哪三个不是呢？

1.不是培养小专家。“只是要使他在幼年时期得到培养，让他健全而有效地向前发展”。

2.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3.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

“育才学校之创立只是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它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决不是专为这特殊教育而产生特殊教育，也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做特殊教育”。^[20]

教育方针是实现培养人才幼苗之发展的途径。陶行知先生不仅为育才学校提出了人才教育的培养目标。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教育方针。一九三九年六月，他曾经谈过，“要从活生生的可变动的法则来理解”育才学校的培养目标，即无论是已经发现小朋友的特长，还是“一时不能发现他们的特长”，都一律要求“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予其某种特殊教育”。^[21]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陶行知先生写了一封给育才全体同志的信，说自己“因事留渝，不能出席”学校“今次召开的校务会议”，依章请马侣贤副校长主持，自己“扼要贡献意见”十则，“以供参考”。其中，“意见”第八则，专门谈到育才的教育方针，陶行知先生说：“关于教育方针，扼要地说，约有五点：甲、已发现有特殊才能者采取即专即博之原则；乙、未发现特殊才能者采取先博后专之原则；丙、中

途发现所入之组不合性情，或发现另有更高之才能时得以转组等、普修课依部章分阶段；戊、特修课依各本组之性质定进程，不做普修课之尾巴。上述方针，以往没有很好执行，原因是初选未尽正确，执行时未尽坚决，但尚未有客观事实与理由摇动创造者之信念，倘要修改方针，必须根据客观事实，提出数目字，来做考虑与讨论的参考。”^[22]

育才学校的人才教育方针，就是使全体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平均发展，注重实践，使情操教育与知识教育同时并重。陶行知先生关于人才教育的目标和为实现这个目标所规定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平均发展”。“注重实践”以及“情操与知识同时并重的教育”，等等。既是对国民党“法西斯教育”的声讨，也是对资产阶级“通才教育”的批判，澄清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目标、教育方针和“中国任何时代的传统教育，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根本区别，阐明了陶行知的教育“不谋而合”。从而说明了他的后期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不过，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在解放区之“外边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只有在解放区，“不独实现陶行知的理想，并且有更多的发展。”

四、人才教育的方法

人才教育的方法，是实现人才教育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果只提出人才教育的目标，不解决人才教育的方法，那人才教育的幼苗仍然会枯萎、夭折。

陶行知先生关于人才教育的方法有：从小发现、及时培养；注意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紧密配合；发挥集体教育的作用；注意因材施教；搞好幼年研究班和见习团，等等。

（一）从小发现、及时培养

一九三八年八月，陶行知先生在法国邮船上之所见后，他下了一个判断，认为“小孩之音乐天才，四岁便可测验，测验确实，便应及时培养”。同年十月，在汉口一位害癫痫的小朋友不仅能指挥小朋友们唱歌，而且很快地学会了任光

先生教给他的音符和拍子。这件事，使作曲家任光先生感到很惊讶，也使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感到欢欣。一年后，育才学校招生，因该小朋友时正害病，未能应招，又过了一年陶行知先生记起，速要求派人招来了这位有“音乐才干的人”并且通过关系帮助这位小朋友治好了病，使这位小朋友在育才学习、工作，解放后。该人成为“新中国音乐工作者”。

还有，爱迪生、法拉第的幼年生活，都给陶行知先生以极深刻的印象，致使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的总结中写道：“人才幼苗当从小培养……在小的时候，已被发见有特殊的才干，那么立刻就应该给他以适当之肥料、水分、阳光，使他们欣欣向荣。”^[23]

（二）注意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紧密配合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往往是不相一致的。一个人一生中，会受到这几个方面的巨大影响。

（1）社会教育

作为儿童时期阶段的人，它和人一样，它的思想和行为，乃是被他们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含儿童在内）起着重要的作用，像重庆保育院院长给陶行知先生介绍所说的那种“选干儿子”的做法，甚至“当着孩子的面说些有各种缺憾”的不要的话，使他们幼小的心灵，“蒙上难堪的侮辱”，“以至在他们生命中，烙上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又如，像法拉第幼年“一面订书，一面吃书，书订好了，头脑也吃饱了”。甚至他在订书的时候，看到所写的“看完觉得不够味”，还发誓“将来要写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法拉第这根科学的幼苗，如果没有利波老板的识拔宽容，也是会被人摧残的。这就是社会给予法拉第的教育与影响。因此，陶行知先生说，当我们感谢法拉第、爱迪生给世界带来电光的时候，“不能不想念利波啊”。

（2）学校教育

一般说来，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

织、有计划的系统的影响过程。它是培养与造就人才的主要工场，陶行知先生很重视学校的作用，他一生中主要精力用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后期曾一度全力以赴地献身于培养人才幼苗之发展的育才学校教育。当育才遇到空前的困难，以至朋友们劝他停办，且说“小学太小，缓不济急，如此成就困难，不如改行。”陶行知先生答复说：第一，“小中有大，倘使我们能够保存一个爱迪生，则我们的心血就不算白费了。”第二。

“虽缓而急，从秧苗已长，必得分栽，十天不雨，尽就枯稿，岂不是当今之急务么？”第三，“中华民族有的是钱，无论怎样穷，只要认清人才的幼苗，应该从小培养，总有钱来维持这个学校。”于是，他就向少数朋友募捐了，请求他们给育才学校予以大力赞助。其原因，“一半是由于武训先生精神在后面推动，一半也是由于孩子们努力向上，可以造就，还有许多埋藏在一般小孩中之人才幼苗，急待培养，不忍不为他们请命，倘蒙概允赐助，则我们可以用十年树才之方法，完成百年树人之大计。”完成育才学校“对于民族人类倘有少许贡献”。^[24]在育才学校五周岁之前夕，陶行知先生在募捐中，再一次提到育才之“艰窘”，但“解慰”的是，育才“诸生虽属童年，深知奋发”，方今所需人才，“夫亦安忍今此萃萃向上之学子中途而废耶？”为此，他起草书函，请本校先生往各处趋访，“务希赐鉴见玉成”。

育才学校在千灾万难中过来了，当文化之园里还存在着“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之慨的时候，存在着及一些人“似乎有惜春之意”的时候，陶行知先生满怀信心地说：“这春暮的气象，大家多少有些同感，但是夏天之莲、秋天之菊、冬天之梅、四季常青之松柏，只有园丁负责，不给茅草乱长，哪样不可以及时欣欣向荣呢？而且春，无论如何也会回到人间。向前看啊！前面有着更大的黄金时代待创造。”^[25]这是陶行知先生在育才二周岁之前夜对育才师生的勉励。后来，在育才学校五周岁时，他又勉励育才师生，育才学校居然在千灾万难中奇迹般地活了五年，从五年看五十年的时候，“才能展开光明

的前途，走上十万八千里之长征。”

现在，育才学校已经走过了四十二年了，它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新中国和新世界之创造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产生了多大的力量，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是我们为它作出结论的时候了。

（3）家庭教育

家庭，不仅是青少年出生之地，也是青少年的教育之地。双亲，尤其是母亲，她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他们的教育水平与修养程度高低与否，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我们还是从陶行知先生屡次举的例子来看吧。像爱迪生幼年学校所遭到的待遇和打击，如果没有他母亲的家庭教育，那么，仅仅受三个月学校形式教育的爱迪生，也就不能成为“一位现代的大发明家”了。

为了培养特殊幼苗之发展，必须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结合。“像爱迪生母亲那样了解儿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假如他的附近有化学家、电学家特殊的帮助，设备方面又有使用之便利，则可减少他许多困难，我们这样便想学做爱迪生的母亲，而又想给小朋友这些特殊的便利。”^[26]育才学校就是这样的一所“学做爱迪生的母亲”，又“给小朋友这些特殊的便利”的培养人才幼苗之学校。

（三）发挥集体教育的作用

集体教育是陶行知先生“初入人才教育之路”中所做的“一点探路的工作”的一个方面。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创办之先，曾经明确地指出过，在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单单帮助个人成才是不够的，也是不对的，必须在集体生活中来学习，“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在《育才学校十字诀》中的第七诀，提出“七（集）体创造”。他说：“我们希望以集体力量纠正个人主义，以创造的工作来纠正个人主义，以创造的工作来纠正空话与幻想，在共同努力创造学习上来学习共同努力创造新中国新世界。”

这里，陶行知先生很明确地提出了人才教育不是个人主义之人才教育，乃是集体主义之人才教育。这种集体主义是为民族、为世界培养人

才。陶行知先生很强调创造，曾经写了《创造宣言》《创造年献诗》《育才创造年计划大纲》，以及“为发挥创造精神，鼓励创造生活”而颁布的《育才创造奖金办法》。但，这种创造，“也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英雄的少数人的创造……要用……解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把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27]

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陶行知先生集体教育的意义，在《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阐述了集体是人才教育的基础，并深刻地说明了“为集体自治”“为集体探讨”“为集体创造”三种要素的“丰富集体生活在教育上之意义”。

（四）注意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育才学校人才教育之一特点，育才学校在教学中，除了对学生统一教学要求外，还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特殊教育，以便发挥他们的专长，育才学校开创时，就是在集体中按照学生们的特殊才能，给予某种特殊教育。当时设立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组，依据智力测验（陶行知先生称谓“智慧测验”）。选拔难童加入最适合其才能兴趣之一组织学习，“以期因材施教，务使各得其所”这样的目的。“在使人才幼苗得到及时之培养而免于延误枯萎特殊才干之幼苗，一经发现，即从小教起，不但是合于世界学问之幼年史实，即我们这短短两年的试验，也证明了路线之正确。将来，倘能照预定计划加设工艺组和农艺组，更为容易见效而适合需要。”当时有一位来育才学校视察的同志看见“这办法合理而主张普遍推行”的意见时，陶行知先生说，“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我想每省先设一所以资试验，欲是有益而无害，将来随办学人才之增加，则每一行政督察专员区设立一所亦属可行。”^[28]

（五）搞好幼年研究班和见习团

一九四一年九月，陶行知先生根据两年来，育才学校百余名少年儿童在校学习的潜力很大，进步也很显著，提出建立“育才幼年研究生办法”。在各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少年儿童们开始搞专题研究，又由于学生学习刻苦、认真，不时提出很多等待学校解决的问题，陶行知先生又提

出按音乐、戏剧等六个组的不同需要，组织学生走向社会、成立“见习团”向社会调查、实习。最后以见习的成绩向全校师生及社会汇报。这样做效果很好，深受师生及社会的好评。一九四三年年底，陶行知先生总结了“幼年研究生”和“见习团”两个制度的经验，认为这是有利于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它是既可以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师资、图书、设备、仪器等不足的好办法。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冬，将育才学校音乐组、戏剧组分别迁往重庆中央交响乐团、重庆中华剧艺社附近，以便使该组有更多的艺术实践和更多的更好的教育的辅导。

五、正确处理人才教育中的几种关系

人才教育不是一种凌驾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上的普通教育，也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因材施教教育，而是与其它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教育。这里，我们就陶行知先生关于人才教育与天才教育、基础教育、普及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的关系表述如下：

（一）人才教育与天才教育的关系

一提起人才教育，不少人立刻想天才教育，认为人才，就是天才，殊不知，这是不对的。

关于人才教育、天才教育的关系问题，陶行知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一九四二年秋天的某一天早晨，陶行知先生站在古圣寺露天舞台的前面，对育才师生讲述了“人才、大才、天才”。他说：“人人有一定的才能，但不能放任，让他自生自灭，人才通过教育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可能成为大才”。

“不要满足于大才，必须日新、日日新，继续努力，勇于攀登科学文化高峰。”又说：“天才是出于勤奋、锲而不舍”最后，他说：“人才、大才、天才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是我们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教育培养的结果，是自己忘我地勤奋学习不断钻研发展起来的。”从这里，我们看出：人才是人人具有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活到老、学到老”，不论让它自暴自弃、自生自灭就可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才，做出有益于人民的有成就的事

来，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意思。

而天才则不同了。它是在人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天才的基础或前提，天才是人才高度发展的结果。人才是众多的，天才是极少数的。如果说还有什么中间环节的话，那么在人才与天才之间，如陶行知先生所陈述的还夹着一个大才，大才是教育和自己努力的结果，天才在很大程度上靠个人努力的结果，陶行知先生认为，它是做学问的依据。他在《学问之要素——答程仲沂先生信》中说过：“有几分天才做几分学问。大概天才有十分之八九之势力，教育的势力只占十分之一、二，教育万能说是教育界自欺欺人的话。但是天才有时很不容易看出来。时机未到，天才隐在里面，专靠主观武断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是常有的事。”^[29]

在这里，陶行知先生批判了教育万能论，很重视天才的“势力”，这种“势力”决非天生之才，乃是与生活实际、与大众紧密系在一起的“勤奋、锲而不舍”，是个人长期“继续努力”，不断更新的结果。关于天才根基于大众、根基于生活，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他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很值得深思。他说：“我听说的音乐天才和文学天才并不是超人的天才。有音乐的天才而实际上不是一个与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大灾难拼命的斗士，他写不出感动大众的乐谱。有文学的天才而实际上不是与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和灾难拼命的斗士也写不出感动大众的歌词”又说：“只有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战斗里，才能把他们的天才发挥出来，写成大众的音乐，大众的诗歌，使大众有东西唱，兴高采烈的唱了又唱。”^[30]

在人才与天才的关系中，陶行知先生还强调指出，不在为天才而办天才教育，他一生中一方面致力于普及教育，一方面致力于人才教育，但不排除天才教育，而且尽可能地在他所创办的事业中，将人才培养成天才，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九四〇年，他在答复一位朋友的信中曾经指出：“我们当然不应该为‘天才’而办‘天才’教育，但是为着增加建国的力量而培养特殊

才能的幼苗使他们不致枯萎夭折也是值得做的工作。我们当然不应该教他们做人上人，但是为着社会进步，让他们依据各人的才能志愿学做一群人中人，而且把他们的贡献发挥出来，以为人民服务。也是值得干的工作”。^[31]陶行知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干。据戴白韬同志回忆说：陶行知先生不仅帮助他的夫人研究制药，发明金鸡纳霜代用品，无偿地送给川中疾疫流行的贫民治疗，而且多次帮助过一位姓李的某君研究土法炼钢和试验江中小鱼雷艇，并且卓有成效，“以便大规模试验，充实抗战力量”和“袭击长江中的敌舰”，“李君在欧洲学习造军器多年，陶氏想尽一切办法，把仅有的一点钱，毫不吝啬地供给他，并和他计划研究方案以冀对日有所助益，表现了高度爱国热忱和抗日决心。”“但昏庸腐败的国民党老爷，却置之不理”^[32]

（二）人才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

关于人才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在陶行知先生的著作中，有时提到特殊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这里统一用“人才教育”来替代“特殊教育”。

育才学校开创时进行的是“人才教育”。设六组以进行教育之后发现有的小朋友不宜在某一组学习，师生与小朋友本人都希望转组，又发现有的小朋友确很聪明，但一时又未发现他的特长，“或是各方面都有才能的”。陶行知先生说，“我们将来要设普通组以教育之。”^[33]后来在育才学校“人才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先生发现文化基础知识之重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文化基础知识包括四门：一是国文；二是外国语；三是数学；四是科学方法——治学治事之科学方法。他把这文化基础知识称为“文化锁匙”，“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地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因此，“育才除普通功课依照通常进行外，用四分之一的时间让学生各依性之所近学习一门特修课。”特修课即六组专业之学习。^[34]

关于人才教育与基础教育之关系，我们再从陶行知先生关于普修课与特修课之关系的叙述中

可以看出。育才初创后，普修课、特修课时间各占二分之一，后来，“因研究结果而改订时间，使普修课约占三分之二，特修课占三分之一，“以至后来，特修课的时间占四分之一。这样一来，人才教育的特修课可以一直专门教到大学，而基础教育的普通课则可以“能同的学校同年限毕业”。有人怀疑这怎么能行？陶行知先生据理说，他们有四个条件能使它成为可能。其一：是他们的学校几乎是全年学校或四季学校。不单放什么寒暑期，这样全年可以多上十几周的课。其二：是特修课之一部分是可以移转到普修课上面去。其三：是由于集体探讨及集体创造性的学习，学生潜修其中，自然是随时随地地吸收得很多，相当于普修课之内容。其四：是为了预防及纠正特修课教育之狭隘性格，须多方引导学生在各组之立场与观点，尽量对于普修课各部门找出他们与本组学术之关联并要求育才“担任普修课之导师，随时尽可能扼要指出“学生们的”功课与特修课之联系”，同时，要求“担任特修课之导师乃至比较深造的学生提出各该组当前学习精华，使之深入浅出，公诸全校，以丰富全校之普修课内容。这样，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鸿沟打通，乃能达到一般的特殊与特殊的一般之境界。”^[35]

总之，陶行知先生在注重人才教育的同时，并不忽视人才的基础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注重“幼苗”之基础教育，育才学校是特定社会特定环境中的产物它有理由要为难童请命，使难童中的“个别优异倾向”的儿童提前培养。它有责任为“脱离”实际和社会人才之缺培养人才。但在今天，“便在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中予以统一，防止那样的分裂倾向”，在陶行知先生看来。实在是“有其必要”。

（三）人才教育与普及教育的关系

陶行知先生是在普及教育的运动实践中，发现要搞人才教育的，又要在人才教育的实践中丰富普及教育的运动实践。他曾声明：不是丢掉普及教育来干这人才教育。也不是丢掉人才教育来专干普及教育。^[36]

这里，我们特别要提的是，陶行知先生从旅游二十六国宣传抗战回来，兴奋异常，发愿要在

抗战中继续努力从事多年的普及教育运动，其中计划在大别山创建一所“培养干部”、“用普及教育的武器来进行战地民众动员工作”的晓庄学院，可是蒋介石的反动政府的“方针是不许动员民众的。也怕陶行知先生认真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不允许晓庄学院创立。所以后来陶行知先生才把他的力量用在特才儿童的培养上面。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这里还包含了这一段曲折与苦衷。“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到老百姓中去”，可见陶行知先生的精神是永远向着老百姓的。”^[37]实际上，即使陶行知先生“把他的力量用在特才儿童的培养上面”时，也未一刻忘记工农群众的普及教育。在草街子的凤凰山巅的古圣寺育才学校师生，从开学不久就深入到工矿和农村中去，为凤凰山附近的工友农友举办识字班，送字上门。实施普及教育，就在育才学校创办五月零五天，陶行知先生还特意撰文介绍“民众教育是一件大事不可小看，更不可小做”为内容的《我的民众教育观》。

（四）人才教育与道德教育之关系

陶行知先生很重视育才学校的道德教育，认为它是人才教育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38]所以陶行知先生就曾提出“人格防”来要育才全体同志“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陶行知先生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种。公德是关系到集体能不能巩固，是否可以兴盛起来的条件，而私德又是公德的根本。因此，要求育才的人才教育既要“顾到公德，卫护公德”又要“讲究公德”，以便人人建筑起“人格长城”来“为集体谋利益。”^[39]

以上，我们简述了陶行知先生人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从中，我们看出，陶行知先生不仅为抗战培养人才费尽了心血，而且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历尽了辛苦。当他“天天与半价赛跑”经济已到“山穷水尽难以维持，朋友们劝他停办”育才，有的朋友还劝他“何必背着石头游泳时”。他说，“不，我是背着爱人在游泳呢。”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一次，他的夫人问道：“你为办育

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陶行知先生说：“我若一走，学校的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学校一样，被蒋介石封闭，所以我非在这里顶下去不可。”最后，并坚定地说：“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又何妨！”^[40]陶行知先生这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育才学校培育“人才”的经验，“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日稿于武昌桂子山

【注释】

- [1][4] 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
- [2][3][41] 陶行知：《行知诗歌集》。
- [5][14][17][18][19][20][21][26][33][36]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
- [6][7][8][9][10][25] 陶行知：《致育才之友书》。
- [11] 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
- [12][29] 陶行知：《知行书馆》。
- [13] 陶行知：《文言白话又一战》。
- [15]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 [16] 陶行知：《民主教育》。
- [22][27] 陶行知：《召开校务会议——给育才全体同志的信》。
- [23] 陶行知：《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
- [25][28][35] 陶行知：《育才学校二周岁前夜》。
- [30] 陶行知：《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 [31] 陶行知：《谈生活教育——答复一位朋友的信》。
- [32] 戴伯韬：《回忆陶行知》第138-139页，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 [34] 陶行知：《育才十字诀》。
- [37] 丁华：《育才学校的新教育》，截《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第243-244页，延安新教育学会选编，大连大众书店，一九四七年版。
- [38][39] 陶行知：《每天四问》。
- [40] 吴树琴：《周总理对陶行知先生的关怀》《人物》1980年第四期，第8页。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文/张文郁

陶行知（1891-1946），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逝世后，曾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评价。一九五二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时，又有“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基本上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的评价。此后若干年内，对陶行知的评价问题，仍常有争论。

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革命激变的时代。陶行知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有他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曾从约翰·杜威那里接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回国以后，在他早期的教育活动中，确有实用主义思想的表现。但是，陶行知的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他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超政治的教育家逐步地发展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成为人民敬仰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一）

一九一六年，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来，初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南高改称东南大学后，又任教育科主任。一九二〇年，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同另一些留美回国的人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担任总干事。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先后来中国，陶行知是主要接待员之一，对于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引进美国新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曾起一定

的作用。陶行知在此时期，还在《新教育》杂志上经常发表教育论文，批评传统教育，提倡教育改造，对于中国新教育运动，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陶行知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的“希望”，“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1]“教育救国”的思想，跃然纸上。陶行知在此时期还不能认识到，不通过政治、经济上的革命，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当时，肖楚女同志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现制度若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即令有效，也不过是多使平民认识得几个字，因而多使平民添得几分烦恼苦痛而已！他们的教育，要放在革命之后！革命之后的人的教育，那才是真正的平民教育！”^[2]

陶行知等推行平民教育几年之后，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些人开始分化，晏阳初借平民教育运动这块招牌投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也到处碰壁，不得不另找出路。

（二）

陶行知看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乡村比城市更严重，他认为，中国的人口有八分之七在乡

村,改造乡村,改造乡村教育,普及农民教育,可以改造乡村社会。陶行知下决心,要搞乡村教育运动。一九二六年,陶行知写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我们的信条》等文章,推动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提出:“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3]他还提出:“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4]因此,他订出乡村教育工作者信条:“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5]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陶行知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一九二九年三月改名晓庄学校。晓庄(原名小庄)是劳山山麓的一个小村,在这个小乡村的荒地上盖草房,办学校,师生共同开荒,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冲破了关门读书的旧教育传统。陶行知在晓庄,脱了长袍穿草鞋,挑粪锄地样样干,热爱乡村生活,热爱乡村教育,倾注了发自内心的思想感情,感动了全校师生,感动了乡村农民。陶行知对乡村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可以教育别人的。正如郭沫若同志说:“他自愿‘一闻牛粪诗百篇’,请从这句话的体验上来改造我们自己的意识吧。”^[6]

陶行知的教育生活理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体系。教育生活理论,从思想体系上说,并没有完全超脱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范畴,只是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主张。但是,教育生活理论也并不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翻版,陶行知的教育生活理论,是联系中国当时的实际,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实际有一定的联系。他竭力反对旧的学校的脱离实际的死读书,也较早地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在教育改革上是有进步意

义的。教育生活的理论,晓庄学校的实践,冲击了旧中国的传统教育,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吸引了不少抱有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愿望的人参加,其中包括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而进步力量占优势,有共产党员参加,大多是学校的骨干力量。

一九三〇年五月,晓庄学校师生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包围并封闭了学校,捕杀了十多名师生,陶行知也被通缉,避难去日本。陶行知改造乡村,改造乡村教育的事,遭到一次惨重的打击。

纵观陶行知在一九二六年以后,为了改造乡村社会,改造乡村教育,下了决心,离开城市,毅然下乡,创办乡村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陶行知教育思想也从一九二六年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他既反对“老八股”,也反对“新八股”,反对“依型他国”,主张根据本国情况来改造中国教育。他在编集自己的旧稿时曾说:“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7]

陶行知毅然下乡开展改造乡村,改造乡村教育的行动,也引起了当时还只在城市搞城市革命工作同志的注意。周恩来同志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讲到:“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8]

(三)

一九三一年春天,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过着隐蔽的生活,他的改造教育的雄心,并未泯灭,而且更进一步,最初一年,他集合晓庄校友,创办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发起“科学下嫁运动”,提出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的口号,普及科学教育,使下层大众都能受到现代科学教育。陶行知和晓庄校友等曾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科学普及读物。

一九三二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和江苏宝山县交界的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型式，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办学主张。^[9]参加工学团的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接受军事、生产、科学、知识、民权、生育等六项训练。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组织，团结群众的组织，因此很得工农群众的欢迎。山海工学团成立以后不久，在肖场、夏家宅、红庙、沈家楼、赵泾港相继成立工学团。在北新泾，成立晨更工学团；在市区旧租界，还组织了报童工学团。陶行知在实施工学团教育中，发现了“小先生”制，用“即知即传”的方法，进行普及文化知识教育，很有实际的教育效用。“小先生”制在上海推行后，“不久，即普及到二十一行省，四特别市，形成了普及教育运动上一支广大而有力的队伍。”^[10]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曾经采用“小先生”制来普及群众教育。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山海工学团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宣传抗日救亡，后来转到武汉，经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决定编入政治部宣传队。

一九二九年，陶行知支持了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创办。在该校纪念建校五十周年的报道中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新安小学，是一九二九年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11]一九三五年，新安小学七名学生自动组织了一个新安旅行团，用旅行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宣传普及教育。当新安旅行团成立，出发旅行时，陶行知作了一首诗歌《新安小学儿童自动旅行团小影》来歌颂：“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12]“七·七”抗战爆发后，新安旅行团来到武汉，又辗转去华中解放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贡献。

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间，陶行知在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方面，在改造教育组织形式和改造教育方法方面。在教育适应政治形势需要方面，都曾经作出一定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给抗日根据地、解放

区输送了不少干部。

（四）

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新高潮。北京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行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13]一九三六年一月，陶行知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对人民有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

^[14]一九三六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写了《论团结御侮——复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一信，赞同他们的主张。^[15]陶行知并在教育界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在教育界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

陶行知在此时期，靠拢了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他曾用自己的经历指出：“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作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16]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正在英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未遭逮捕，但又一次受到通缉。陶行知在国外访问了二十八个国家，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争取外国人民的同情，发动华侨捐款救国。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七月底，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出狱，陶行知于一九三八年夏回国。当时，救国会

已被公认为一个政团，陶行知和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五年初，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陶行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起，已经不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陶行知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当选为理事长。生活教育社虽然是一个民间的教育团体，但以提倡抗日、民主的教育为它的主要宗旨，社内有共产党员，有党的领导，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为抗日、民主、人民解放，作出过贡献。

一九三九年七月，陶行知在重庆自筹经费创办了一个新型的学校——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学生，在开始时是从战区流亡来的难童，后来，在重庆接受的学生多半是其他学校的“红色分子”。育才学校采取新型的分组教育，除了必须传授的基本文化知识外，根据学生的专长加深培养，发展他们的专长和才能，并且密切结合政治形势，把抗日、民主教育贯串在全部教育过程中，进行比较系统的革命教育。育才学校教师中，容纳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成为当时抗日、民主斗争的一个堡垒，在反独战、争民主的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人民拥护，敌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准立案，不发补助经费，企图借此扼杀革命力量。陶行知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艰苦撑持，为革命保持力量，并为中原、陕北、四川等解放区、革命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革命干部。

一九四五年春，陶行知和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教育的课程，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社会大学设政治经济、新闻、文学、教育四个学系，第一期招收了一百九十七位同学，大多数是职业青年，只有二十六位同学是待业青年。经费无来源，学生自筹学习用费，教授义务任课。当时在重庆的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响应陶行知和李公朴的号召，参加义务讲课，其中经常讲课的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许涤新、王昆仑、侯外庐、

杨晦、何其芳、艾芜、力扬、曹靖华、陈翰伯、张友渔、于刚、孙起孟、潘菽、李公朴、陶行知、方与严等，^[17]社会大学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同社会联系面较广，教育同社会政治相联系，在反内战、反独我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新型的办学形式，对于推广高等教育也很有意义。

一九四六年四月，陶行知从重庆返回上海，为育才学校迁到上海作准备。陶行知一到上海，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作上，他到处讲演，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和民主而大声疾呼。六月二十三日，陶行知在上海北站欢送人代表去南京请愿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演，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18]

陶行知这次回到上海，时间不长，生命也很短促。他夜以继日，忙于民盟的工作，忙于生活教育社的工作，忙于育才学校还沪的工作，忙于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的筹备工作等。陶行知在上海社会大学筹备期间作了一次题为《民主教育》的讲演，指出民主教育的前提是：“人民第一”“天下为公”，提出教师“要向学生学习”“应向老百姓学习”的主张。^[19]陶行知强调向人民学习，为上海《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亲笔题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20]七月十一日、十五日，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社会上传闻陶行知也已名列“黑榜”，传闻特务头子陈立夫说，要割掉在上海的“盲肠”。陶行知冷静沉着，不怕牺牲。七月十六日，陶行知写给育才学校同学会上海分会全体同学的信上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抵抗的大势。”“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一百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百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21]这是陶行知写的最后

一信，也是他的庄严的遗嘱。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晨，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威胁下，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症逝世。

陶行知一生，早期确有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九二六年以后，抛弃城市平民教育运动，毅然下乡搞乡村教育运动，这对于他后来的教育思想的转变，已经奠定了根基。一九三一年以后，他推动城乡工学团运动，冲击了封建、买办教育，创造独特的工农大众教育的形式，做了有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前后，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并参加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分明，态度坚决，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教育作出了贡献。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陶行知无愧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注释】

[1]陶行知：《作十万新民寿六旬王母》，《行知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27页。

[2]肖楚女：《陶朱公底平民教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

[3]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第129-130页。

[4]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同上书，第132、133页。

[5]陶行知：《我们的信条》，同上书，第115页。

[6]郭沫若：《行知诗歌集·校后记》，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494页。

[7]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第1页。

[8]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中国青年报》1978年10月7日。

[9]陶行知：《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98页。

[10]方与严：《生活教育简述》，上海教育书店1950年版，第15页。

[11]新华社电：《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纪念建校五十周年》《解放日报》1979年6月19日。

[12]陶行知：《行知诗歌集》，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37页。

[13]《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

[14]《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

[15]《民族战线》，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

[16]张健：《略谈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99页。

[17]社会大学同学会编：《社会大学》，北门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经售，1948年6月出版，第101-103页。

[18]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照片注文。

[19]上海《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周刊第二期，1946年6月25日。

[20]同上刊，第七期，1946年6月30日。

[21]生活教育社编：《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第一辑，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插页，陶行知先生遗墨。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取向

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王建平

陶行知一生对创造教育情有独钟。从1917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新教育的改革,此后的30年间,从未离开过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和实验。他的一生无时不在创造,无处不在创新。“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教育界的改革风起云涌,陶行知把握时代脉搏,高瞻远瞩,博采众长,锐意改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创造教育,终于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创造教育理论,为我国的创造教育理论大厦奠定了基石。正确评价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积极汲取其创造教育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我们当前深化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新世纪合格人才,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是大有裨益的。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自成体系,颇具特色,丰富多彩,是其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陶行知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开拓了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对创造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虽然说是有了人类就有了发明创造,但是,真正把创造作为专门的学问来加以研究,并明确提出创造教育的概念,还只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事。1869年,英国的高尔顿(F. Galton)出版《遗

传的天才》一书,以997名天才人物为研究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个体能力的差异,并进行了旨在测验发散思维的“自由联想”实验,是国际上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创造思维的开始。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关于创造力的研究主要被精神分析学派所垄断。20世纪30年代,随着杜威的《我们如何思考》和《艺术的实验》的出版,人们对创造力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证、实验阶段。1941年,公认的现代创造学奠基人——美国的奥斯本出版《思考的方法》一书,对人的创造性思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创造的原理和技法,创造教育开始萌芽,并随后进入实验阶段,主要在大学。如194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设《创造力开发》课程,创造学正式成为大学的教育内容;从1950年开始,吉尔福特在美国心理学协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创造思维问题,全美国开始进行发展创造力的教学实验。著名的成功实验有:奥斯本使用了《应用想象力》教科书,布法罗大学的创造力开发课程,帕内斯在大学和中学的创造力开发课程,马尔兹曼在加州大学的实验,罗杰斯的实验,等等。至20世纪60年代,这类研究在美国形成热潮。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前苏联等也都相继展开了有关创造教育的研究。^[1]一种以开发全民,特别是新一代创造力为任务,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创造教育,开始成为当代西方教育改革的潮流和趋势。

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前，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但也偶尔闪烁着点滴的星光。如两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指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显示出创造过程中有无相生的道理；儒家经典之一《大学》主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体现了不断更新、不断创造的思想。这些说明中国古代的学者对创造的本质也曾作过探讨。但真正把创造引入教育领域的，在“五四”运动之前尚无证可考。这也可能与那时中国漫长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关，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们是无须创造，也不敢创造的，尤其是在精神领域。这样，陶行知从“五四”时期的新教育改革开始，对创造教育理论的探索与实践就显得极为引人注目。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把创造引入教育领域，明确提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鼓励教育工作者要做“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内，陶行知先后发表《新教育》《活的教育》《创造的教育》《创造的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等文章，就创造教育的内涵、特点、目的、任务、原则、意义、方法与过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是系统、全面研究与实践创造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近现代创造教育理论的开拓者和先驱。

（二）陶行知对创造教育理论的探讨，既立足时代，又广泛吸取了当时中外创造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在认识层面上，有许多地方甚至超越了同时期欧美学者的水平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当时欧美学者大多以心理学为基础，从个体（主要是成功人士和天才儿童）的角度来研究创造教育。陶行知更多的是将创造教育放在社会这一大环境中，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把创造教育的对象由儿童扩大到全体民众，这样使得其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广泛，而且也更实用。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当时欧美学者因为坚信“创造力=创造思维能力”，所以他们极为热衷于

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在杜威以前，一般是一种主观心理分析，如精神分析学派的“升华”理论（1924）。^[2]在杜威以后，主要是建立在心理实验基础上的心理分析，如吉尔特的智力三维结构模型说（1959~1977）^[3]等等。这类研究的贡献是为创造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其缺陷是把创造教育的对象——“人”仅仅看做是具体生物属性的个体，而忽视了其社会属性。陶行知“行知行”的哲学认识论，使得其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色彩。如他认为创造的本质有三个关键的因素：“行动”“思想”和“新价值的产生”，缺一不可。这三个因素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联系，即，“行动”决定“思想”，“行动”和“思想”又共同决定着是否有“新价值的产生”，而是否有“新价值的产生”是判断是否为“创造”的最终标准。可见，陶行知对创造本质的哲学阐释远远超越了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观性和杜威机械的经验性。另外，陶行知对创造教育的实践性特征的认识以及强调创造教育的民主原则等，也显然跳出了心理分析仅从内部属性来研究创造教育的局限，而更多地关注创造的外部属性——社会属性和外部环境条件，从而把创造教育的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陶行知不仅在创造教育的理论上敢于研究和探索，更可贵的是他还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各种创造教育的实践活动。1927年陶行知创办南京乡村试验师范学校，进行创造教育试验活动；1931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推广自然科学知识，组织学生玩科学把戏，开展创造实验；1932年，又创办了“山海工学团”，进行创造教育的试验；1939年，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全面进行创造教育的活动；1940年6月，育才学校开展“创造月”活动，迎接两周年校庆；1940年8月，陶行知又宣布“创造年”开始，并制定了创造年计划，还特别设立了“育才创造奖学金”，试验了“育才幼年研究生制”。1942年，育才学校师生实现了“创造年”计划，取得了大量的物质建设、科学创造、

文学艺术创造等方面的成果,也使得其创造教育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可以说,在创造教育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重大建树,攀登了那个时代创造教育的高峰。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的现代价值取向

创造力的开发和培养是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它不仅是个体完善的必然需求,而且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科技创新与进步,将是影响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江泽民同志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创造力的研究和创造人才的培养。重温江泽民同志有关创新人才的讲话,吸收和借鉴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基本精神,对我们实施以培养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造就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创造型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汲取陶行知的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树立创造的教育观

教育观是教育者对教育的职能和如何进行教育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教育如何使个体得到完善和发展、为社会培养何种人才以及如何培养等问题是教育的基本问题。现代教育的进步之处在于注重个体的智能发展和全面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首先必须具备现代的教育观。陶行知批判传统教育观,指出它的最大缺陷在于以传授知识作为教学的唯一目的,以培养能熟练掌握已有知识的书生型人才为教育目标,“把学生当天津鸭儿填”。由此,必然导致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和以讲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体系,从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个体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学生智能的培养,阻碍了学生独出心裁创造性的发挥和创造能力的发展。改革束缚创造力发展的传统教育观,是学生创造力培养的重要前提。陶行知论及教育观的转

变涉及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结合现实,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观念的转变将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第一,要坚信每个儿童都有或多或少的创造力,这是实施创造教育的必要前提。陶行知所提出的“人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创造力”的观点,今天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所证实,但是,在今天,真正让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接受“人人都有创造力”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的困难,我们的学校仍然在以智商和学科成绩作为划分优异儿童与一般儿童的主要标准;各个学校还都在为培养所谓的“尖子生”“天才儿童”而乐此不疲,这种狭隘的观念必然会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及至社会的不公平,我们当然并不否认“天才儿童”的存在,学校教育也要面对不同的儿童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学校教育更应该是面对全体学生的教育。我们在观念形态上要把单纯的“精英教育”转为全体学生和全民族的教育,要使每个学生都享受教育机会,要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平等的教育环境下发展他们各自不同的创造潜能,这是教育理想追求,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第二,将以课程教材传授为主的教学目标改变为增长经验、发展创造能力的教学目标。创造性的教育观并不排斥课程教材,也不否认讲授法的必要性。然而,只沿用单一的学科课程显然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陶行知的多样化、系统化、弹性化的课程组织目标以及在“大自然、大社会中求得活教材”的教材观,为我们今天的课程教材改革指明了新路。创造性的教育观应是把教材的讲授作为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非最终目的。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儿童通过以教材为基础而展开的学习活动,获得有关周围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并将抽象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之中,在知识的运用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独创力。所以,创造性的教学是以教材为基础的一个开放系统,教学的目的是将教材的知识转变为儿童学习的经验,发展儿童的创新能力。

第三,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转变为启发儿童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的教学方法。传统的

教学方法多以教师的讲解为课堂教学的中心,却很少关心儿童对学习的主动参与程度,甚至作业也都是以教师讲解的同类问题的反复演练和记忆为主。陶行知形容这种教学方法实际上是视儿童为安静被动的接受者,学习对儿童来说,更多地意味着记忆和反复练习以求熟练掌握某种既得的知识,而不是一个思考、想象、浓缩和发现的过程。结果,儿童思维能力的拓展受到限制,儿童的主动性受到压抑和阻碍,使儿童养成了依赖他人的习惯,无法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实际上,每个儿童都具有对未知事物进行主动探索和发现的愿望和能力,这也正是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基础所在。创造性的教学要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就必须强调儿童的主动性,鼓励儿童对学习的主动参与,使儿童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培养、发展各种能力,不断增强创造力。

第四,转变传统的教育评价方式,注重创造力的考评。传统的评价方式以单纯的考试分数高低来衡量学生的学习质量,使学生的创造力在整天忙于应考当中磨灭殆尽。陶行知对这种应试教育、赶考教育的种种危害和弊病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这是“杀人的会考”“亡国的教育”“使人进棺材的教育”。陶行知在几十年前批判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至于必不教”的情况在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目前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挥棒下,学校仍然以考试分数为中心,将大量的时间、人力投入到考试、测验、作业、复习、分数、升学各方面去,大搞题海战术,严重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的狭窄片面。针对这种情况,陶行知在当年就提出要转变传统的评价方式,要注重“创造的考成”。所谓“创造的考成”,就是以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实际能力作为考试的内容,反对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这对我们今天还在探索、试验阶段的新的考评方式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无论我们今天的何种考评方式,都要首先重视对学生创造力的考查,要改变以考试分数高低、升学率高低来进行学校排序的错误做法,制定全面素质教育的评价标准体系,全面考

查评估学生创造力的水平状况,以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二) 借鉴陶行知强调“做”和实践,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经验,发挥实践活动在培养和发展学生创造力中的重要作用

实践性是陶行知创造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以“做”为核心的“教学做合一”也是陶行知创造教育的方法论基础。他有时甚至把生活实践、把学生的动手操作看做是培养和发展学生创造力的唯一源泉和途径。这虽然有失偏颇,但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实践活动在培养和发展学生创造力的重要性方面仍然有着一定的启迪作用。

首先,实践活动可以激发儿童广泛和强烈的好奇心。在具体的活动中,儿童可以不受课本的局限,去感受和接触更为丰富的周围世界,使其对随处可见的未知事物产生好奇心,而强烈的好奇心正是进行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

其次,经常参加实践活动有助于培养儿童发现问题的能力。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观察和思考,可以提高儿童发现问题的敏锐程度,激发儿童的创造想象。有关统计表明,中国儿童的创造想象主要来自“学习”和“生活”两方面,而源于日常生活的创造想象又是居于首位。

再次,实践活动可以锻炼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儿童会积极动脑、动手,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解决实践活动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儿童可以不受书本知识的束缚,思维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其创造潜能也因此能够得以充分地发挥。

最后,儿童通过有创造性的实践,可以养成有利于创造力发挥的良好的个性品质。如主动探索的精神,敢于独创的勇气,对创造活动的热爱和渴望等。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在我们国家里,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遵照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借鉴陶行知强调“做”、加强实践活动的经验,我

们一方面要鼓励学生能够经常地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要在学校内部通过创造形式多样的、富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如课外活动和课堂活动,集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等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造力。

(三)借鉴陶行知在创造教育中认真抓好培育创造型教师这一关键,在当前推进素质教育的实践中,大力培养创造型、高素质的教师

陶行知认为,新教育要取得成功需要“第一流的教育家”,也就是要有“开辟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教育家,所以,教育要培养富有创造力的儿童,必须要有创造型的教师。这是因为,首先,教师所面对的儿童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个性特征,教育对象这种复杂多变性就要求教师必须视具体问题,灵活运用各种适当的教育方法,并积极尝试新的方式,因材施教,让每个儿童都得到发展。其次,教师的工作是一种富有个性的劳动。虽然教学的基本大纲和内容是固定的,但实际的教学组织、教育方式、教学过程却是由每个教师亲自主持的,整个教育环节的实施都带有每个教师显著的个人风格。可见,素质教育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有创造性。这是胜任教学工作的关键,关系着能不能始终以一种创新的思路去引导学生、教育学生。再次,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其灵魂就在于创造。能不能从教育学和教学法的僵化的常规中走出来,能不能把教学进行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并不断赋予教材以新意和活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教师要具有创造的教育艺术和创造性。只会“照本宣科”、缺乏创造性的教师是难以达到这种要求的。最后,教师如果期望培养出富有创造精神的学生,其自身必须首先具有创造性。如果教师自身缺乏创造性和创造意识,他就很可能对儿童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许多调查也表明,大多数教师由于自身缺乏创造性,他们也谈不上喜欢创造型的学生,或者根本无能力识别他们,因此更谈不上促进和发展他们的创造才能了。

那么,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具有创造性的教育工作者呢?根据我国现代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要

求,借鉴陶行知的教师理论,当前,我们强调创造型教师应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素质:

第一,创造型教师应具备多元、合理的知识结构。即教师是具备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创造型的教师应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学习,发挥学生主体性。就具体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尽可能地使学生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在教师的引导下,大胆想象,积极思维,主动探索,在学习中发挥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力。

第三,创造型的教师应具有民主精神。首先,创造型的教师要注意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和创新。其次,要尊重学生的创造个性。创造型的学生往往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教师要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的创造潜能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再次,要放弃权威态度,主动“向学生学”,使创造活动成为师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教学相长。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要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培养要靠教师。因此,培养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教师是摆在本世纪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目前,国务院正在实施的“跨世纪园丁工程”是我国政府培养创新型教师的重大举措和系统工程,它必将对我国新世纪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巨大的作用。这些措施不仅继承和吸取了陶行知创造教育的理论方法,而且大大超越和发展了陶行知的创造教育理论。

【参考文献】

原载《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改革》。

[1]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2]王世杰.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3]张德秀,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与教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俞国良.创造力心理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陶行知：爱满天下

文/黄亚栋

【摘要】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被誉为“万世师表”。他的一生是献身教育、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and 甘于清贫的一生。他三十年如一日以身立教、矢志不移，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探求新路。他言教与身教并重，不仅创立了生活教育学说，还在家庭、学校、社会中传播教育之爱。他不仅爱国、爱民，还热爱每一位学生。他为人师表、师德高尚，最终使得教育之爱遍及天下。

【关键词】陶行知；爱满天下；万世师表；生活教育学说

教育实践方面的贡献

发起七大教育运动，推动中国教育大众化

1917年9月，陶行知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教育科，初入教坛便“小试牛刀”，提出一系列教学与管理改革。譬如，“教学法”的提出，学生自治的倡导，男女同校的实施等，都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范例。他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呕心沥血，为了推动中国教育大众化，先后发起七大教育运动，包括发动平民教育运动（1921-1925）、推行乡村教育运动（1926-1930）、开展普及教育运动（1931-1935）、发起国难教育运动（1935-1937）、投身战时教育运动（1937-1939）、从事全面教育运动（1940-1945）、倡导民主教育运动（1945-194

6）。例如，他提出乡村教育的目标是：“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1]从乡村教育所服务的农民数量上来看，他确实给广大的中国民众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他还先后参与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组织中华平民教育总会（1923），发起乡村教育同志会（1926），创办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1933），成立国难教育社（1936），成立生活教育社（1938），主持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1945）。可以说，他主持、组织、发起、创办、成立和参与的各个教育团体和各种教育活动，把这段时间连起来正好构成一部推动中国教育大众化的教育活动史。

创办新型学校，打破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

【注释】

[1]俞国良，创造力心理学。杭州，新江人民出版社，1996.29~40.

[2]万翼，郭斯萍，智慧之门——创造力开发，江

四：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25，40.

[3]万翼，郭斯萍，智慧之门——创造力开发.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25，40.

[4]光明日报.第1版.1998.

陶行知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他以振兴中国教育为己任，先后创办了数所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新型学校，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例如，1921年在南京为玄武湖渔民子弟创办昆明学校；1923年秋创办南京安徽公学；1927年3月创办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8年创办湘湖师范学校；1929年创办新安小学；1932年10月创办山海工学团，另外还办有报童、棉花、种稻、晨更、流浪儿等工学团；1938年11月在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1939年7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

以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为例，这是一所培养乡村教师的学校，他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中指出：“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本校各科教师都称为指导员，不称为教员。他们指导学生教学做，他们与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我们所要考的有五样东西：农事或土木操作；智慧测验；常识测验；做国文一篇；三分钟演说……本校一切建筑都是茅草屋。”^[2]可见，晓庄师范学校对教师素质的要求颇高。另外，师生之间地位平等、关系融洽、命运相系、同甘共苦，不仅住的宿舍是自己动手建造的茅草屋，还有教室、图书馆、科学馆、娱乐室、操室、陈列所、动物园、指导员家属住宅，都是由人人动手参与建造的茅草屋。考试不拘泥于智慧和常识的测验，还侧重于操作技巧和演说能力的考核。校园建筑的命名也别具一格，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礼堂取名“犁宫”，门前大柱上的一副对联更引人入胜，上联是“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下联是“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倡导教学做合一，培养一批手脑双挥型人才

陶行知在《手脑相长歌》中说：“人有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3]该诗表达了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即“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

也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么学，怎样学便怎么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4]他进一步解释说“做”字：“这定义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是在劳力上劳心。”^[5]他把这种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用于亲手创办的学校中，培养出一批手脑双挥型人才。

以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与重庆育才学校为例，就不难看出他的突出成就。其一，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给中国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生活教育运动的骨干，为革命输送了栋梁之才。例如张劲夫、操震球、刘季平、董纯才、方与严、戴伯韬、程今吾和李楚材等。其二，以山海工学团为核心的各工学团，在1932年至1937年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方明、张健和杨应彬等。工学团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恢复与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三，重庆育才学校在办学的8年中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革命干部与各类艺术人才，例如李鹏、陈贻鑫和杜鸣心等。

教育理论方面的建树创造性地提出生活教育学说

陶行知一生不断进步，勇于追求真理，致力于人民教育和社会改革等事业，他认为，“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陈法、异型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6]也就是说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不仅要有批判精神，还应注重教育试验。他敢于探索未发明的新理，敢于进入未开化的边疆，通过开展教育运动、坚持办学实践、身处教学一线、精于培育人才，最终创立生活教育理论。他在丰富的著述中构建了一个概念清晰、原理明确、主张具体、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生活教育学说”理论。他的生活教育学说是“由若干概念范

畴、基本原理和具体主张组成”。“它以政治理念、哲学观点和文化思想为主要理论基石，以‘生活’范畴为基本逻辑起点，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为教育哲学依据，以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创造教育、终生教育等为具体教育主张，有机地构成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与自身教育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变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特定历史内涵，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影响到当时的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7]虽然他的生活教育学说是产生在他生活的特殊年代，但是他主张的科学教育、创造教育、师范教育和终生教育等，对于现在和未来中国和世界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创新和发展了其他教育理论

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地提出“生活教育学说”，还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进行总结，创新和发展了诸多领域的教育理论，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14个方面：教育改革、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民主教育、儿童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女子教育、终生教育、道德教育、科学教育、创造教育。总之，他针对中国教育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教育观点，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树立了“万世师表”的教师典范

唐代文学家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是师者的典范和表率，不但立德、立言，还立行、立功。

“万世师表”的最高荣誉，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人获得，除了孔子，另一个就是陶行知。纵观陶行知的一生是献身教育、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and 甘于清贫的一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就教育而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他选择了一条教育救国之路，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条教育救国之路虽然荆棘丛生、崎

岖不平，但是他不改初心、无怨无悔。他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大学校长之职，推脱教育厅长之职，婉拒总干事之职，始终坚守在教育前沿阵地，尽职尽责做一名好老师、好的中小学校长。他为教育有泪不轻弹，有苦肚里咽，为教育风雨兼程、寻觅曙光。他在家庭中传播教育之爱，在学校中传播教育之爱，在社会上传播教育之爱。他不仅爱国、爱民，还热爱每一位学生，最终使得教育之爱遍及天下。

陶行知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世界级教育大师。他身耕教育、笔耕不辍，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经验，创立了生活教育学说。他言教与身教并重，立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他还做到不崇洋媚外、不迷恋金钱、不贪图地位、不居功自傲，是一位自律性极强的伟大教育家。他以“爱满天下”的人生格言作为毕生追求的教育真谛，“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为中华民族谋取解放，为中国教育探求新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来造就人才’”^[8]，“为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这正是他作为第一流“人民教育家”的本色所在。陶行知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为我们树立的师德典范永散光辉。

【参考文献】

原载《神州学人》，2018年第9期。

[1]《陶行知全集》第1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第167页。

[2]《陶行知全集》第1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第665、668、669页。

[3]《陶行知全集》第4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第173页。

[4]《陶行知全集》第2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第289页。

[5]《陶行知全集》第5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

向陶行知请教“双减”答案

文/储朝晖

春天不是读书天：关在堂前，闷短寿源。
 春天不是读书天：掀开门帘，投奔自然。
 春天不是读书天：鸟语树尖，花笑西园。
 春天不是读书天：宁梦蝴蝶，与花同眠。
 春天不是读书天：放个纸鸢，飞上半天。
 春天不是读书天：舞雩风前，恍若神仙。
 春天不是读书天：放牛塘边，赤脚种田。
 春天不是读书天：攀上山颠，如登九天。
 春天不是读书天：工罢游园，苦中有甜。
 春天不是读书天：之乎者也，忒讨人嫌！
 春天不是读书天：书里流连，非呆即癫。

——歌曲《春天不是读书天》陶行知词 赵元任曲

1917年，陶行知抱着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受到教育的宏愿回到祖国。经过若干年的实践，他看到教育不只是有没有的问题和有没有普及的问题，还在于以什么样的观念办教育、参与教育、接受教育。而教育与生活的脱节、隔离、相互矛盾与伤害，是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怎样减少直至消除伤害人生与成长的教育成为教育普及后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在不少人的眼中，教育就只是读书，教育就只是考试，教育就只是追求学历学位，这直接妨碍了人们通过教育追求幸福，使教育成为人的负担和限制。

“活的教育”寻找教育的幸福

陶行知倡导“活的教育”，希望大家“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当下，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源头上是由于在观念上仅仅将教育当成读书、考试。

古人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陶行知却说，“春天不是读书天”，似乎要改写古训。1931年4月15日，陶行知以“自由诗人”署名，在《师范生》创刊号发表题为《春天不是读书天》的词一首，试图让人分清读书、考试、学习、教育之间的差别与关联。

陶行知不是让孩子不读书，而是认为孩子的成长之计不能囿于书本、课堂教学和考试，要在这个最适合亲近自然的季节到自然中去多读些“活书”，不仅要让他获取书本上的闻知，还要获得对自然的亲知，再通过“接知如接枝”将亲知、闻知、说知融会贯通生成聪明的大脑，拥有健康的体魄和一个有趣的健全的灵魂。

陶行知不是一般地反对读书，而是反对并警醒人们不要进入“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恶性循环，他倡导“活的教育”，希望大家“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他说，“花草是活

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第204页。

[6]《陶行知全集》第1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第95页。

[7]《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周洪宇著，湖北教育

出版社，2011，第2-3页。

[8]《陶行知词典》，金林祥、胡国枢主编，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第486页。

书，树木是活书，飞禽、走兽、小虫、微生物是活书，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都是活的知识之宝库，便都是活的书”，他认为书仅仅是教育和学习的工具之一，主张在生活中用书，而不是把读书当成教育的全部，并写诗道：“用书如用刀，不快自须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即书仅仅用在为人的成长和追求幸福上才有教育意义。

当下，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源头上是由于仅仅将教育当成了读书、考试，忽视了热爱自然、到自然中去探索、到社会中去锻炼，忽视了劳动、运动和休闲的教育价值，忽视了自然与社会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家长、学生、教师甚至一些教育管理者，都进入了这样的观念误区，还要用一个标准比拼谁在这个误区中的效果更优，以至很多人不能自拔。只要这样的教育思想观念不转变，当事人在教育价值天平上的负担一头就会越来越沉重，幸福那端就会越来越轻飘，生活或教育中幸福的成分就会越来越稀少，即便是这条赛道上的优胜者，经过短暂欢喜后进入悲剧的比例也会大大增高。

“抬头乐干”做学习的主人

陶行知呼吁，教育需要“六大解放”，把学习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给儿童。就当下而言，让学习者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才能真正“减负”。

有一次，陶行知看到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用了成语“埋头苦干”，就不以为然地将它改为“抬头乐干”，这是效果有天壤之别的两种学习态度和方式。如果“埋头苦干”，就只能像毛驴拉磨，永不停歇地围绕磨盘转下去，越干越苦，最终枯竭了自己也未必能有益于他人和社会；“抬头乐干”则需要自己时刻看清方向，自主选择路线与方式、节奏、内容，带着好奇心越干越快乐，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自己能够不断获得成长，能走得比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更长远，还能使自己对社会发展与他人追求幸福发挥尽可能

大的作用。

同样，如果“减负”仍局限在减少作业的形而下层面上，是永远不能实现目标的。因为负担总是相对于一个人的意愿、承受力和需求而言的，需要根据学习当事人与所学习内容的关系和状态来判定。学习同一知识单元的内容，对于一个学生可能过于轻松，对另一个学生则可能过于沉重。一个自愿自主的学习者，即便所学习内容有难度，他也会从克服困难中获得乐趣，但是如果所学的内容并非他选定，也不能按照他习惯与擅长的方式学习，又未必能证明它对学习者的生活向前向上发展有多大价值，学习就会转变成沉重的负担。

简而言之，从主体角度观察，让学习者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才能真正“减负”。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反复强调培养主人，培养人做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陶行知在晓庄师范时的学生方与严就认为，陶行知所创始的生活教育一开始即以革命的姿态出现，他是要教人民起来做主人，革“只能教人俯首帖耳服从，只有因旧贯而不知创造的传统教育”的命。陶行知自己也写诗道：“揭开革命旗，飘扬劳山侧，风云崛起处，书呆失魂魄。书呆不要吓！往事不足责。合将大人心，渲染儿童色。”

教人做主人需要从自主学习开始，如果一个人长期在不自主的状态下生活，长时间不能自主学习，学习的时间、空间、内容、主题都是被父母和老师安排的，自己没有选择的机会，也就难以养成选择与自主的能力，就会形成被动型人格，就很难自主，这样的教育断难培养真正的主人，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减负”。

针对旧教育对学生束缚过多的问题，陶行知形象而又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就像被裹小脚后的“三寸金莲”，这样的教育只能把学生培养成“三寸金头”，不仅限制人的自主，还摧毁了人天生的创造性。他呼吁教育需要“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讲；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和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不逼迫赶

考，使之能学习自己渴望的东西。简言之，把学习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给儿童。

每个人的天性是倾向成为学习的主人的，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的特质就是自动性与创造性，被外界压力压服的人就会丢失自主性，外部环境事实上已成为阻碍学生做学习主人的主因。确保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就需要同时保证教师的教学自主，尽可能地发挥学校的创新性与自主性，就需要改进教育教学的管理与评价。

做“人中人”理性参与竞争

陶行知倡导做“人中人”，人人平等，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在立足点求平等，于出头处争自由”，也就是说，不盲目参与那些“不甘落后”的比拼。

学生学业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人争做“人上人”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不甘落后”的人的比拼。不少父母都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教育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孩子施加压力。陶行知看到有学生在作文中写了这句已经在中国深深扎根的话时，便改为：“吃得苦中苦，不为人上人”。

陶行知对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直呼它是“吃人”的教育，一种方式是教人“吃别人”，通过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走通读书做官的途径，做成“人上人”后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另一种方式是“吃自己”，以教育的名义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丢失了自己的天性和正常思考能力，难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未能获得生产生活技能，难以“手脑相长”，摧毁每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针对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做“人上人”的追求，陶行知倡导做“人中人”，人人平等，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从个体角度看，追求做“人上人”的人必然同时仍然是“人下人”；从社会角度看，当其中的人大多数都在追求做“人上人”的时候，必然加剧不平等，扩大等级差，从而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张力增大，体

现在教育上的就是学生、教师的负担不断加重。

若以“人中人”作为目标，所要建立的就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和相互拥有关系，人际张力便能大大降低，再通过建立“在立足点求平等，于出头处争自由”的相互尊重、激励和适度竞争的社会机制，建立更加平等而不乏活力的社会关系，使造成学生学业竞争的社会观念、体制的源头和条件得到改善，学业压力也就会因此大大减轻。

由于传统的等级观念尚存，当下社会还存在社会地位与收入的高下之分，使得做“人上人”的观念在社会中还较为普遍，同时现有体制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这种观念的人开启了方便之门，使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并能从中获益，于是追求“人上人”仍是不少父母教育孩子，或孩子驱动与要求自己的强大甚至是强制力量。

所以，减轻当下过重的学业负担和升学、择校压力，减少过度培训，就需要从根源上消除追求做“人上人”的观念基础和现实的体制机制根基。同时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平等”，教育学生做“人中人”，致力于创造平等的社会，并不断改进与之相关的各方面社会体制、机制，使之逐渐减少追求做“人上人”者的获利空间，越来越有利于保障追求做“人中人”者的权利。长期坚持必能见到它对减轻学业压力的成效。

“创造的考成”为学生真正“减负”

陶行知呼吁，“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就当下而言，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为“双减”释放更强动力。

如何评价学生和教育，决定着学生和教育当事人的生活样态。90年前，陶行知对此就有清晰的认知，1934年他发表《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明确反对“会考”。

陶行知认为，会考的逻辑是考什么才学什么，而不是学什么考什么，是用同一个标准评价各不相同的人，会考所能考的是所有人同质的部分，无法考查个性化的创造才能。此外，会考的

往事回顾

——在《流淌的岁月》文友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贾培基

窦瑞华副市长、各位老领导、老朋友，你们好！

《流淌的岁月》这本书从编著、印刷都是周富道在具体操办，费用和会议开支是刘冰老总解囊，这个会才得以召开。北京友协的同志也赶来参加，使我们这次书友会更加亮丽。

昨天晚上我与蒋国庆交换意见，今天会如何开？他说，他组织开场，刘冰董事长致欢迎辞，我说，需要我说什么呢？蒋区长说，老人说老话，你就说说你自己。我同意他的意见，向大家回顾一下往事。



压力还会抑制人创造才能的成长与发展，导致“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就不必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做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教的只是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所以，陶行知反对“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掉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的会考，呼吁“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

根据陶行知阐述，考成与会考的差异在于前者考查生活的实质。比如：校内师生及周围人民的身体强健了多少？有何证据？校内师生及周围人民对于手脑并用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有多少

我生于1935年12月。那时，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我的祖籍是重庆长寿区。父亲是长寿20年代的第一批共青团员，被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第四期学员。三十年代初期，他受命到上海帮助训练税警团战士。税警团隶属中国财政部，团长就是爱国将领孙立人。

我出生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农村外婆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参加了当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当时他是税警团连长，率领战士英勇奋战，他身中三枪，不下火线，被

是获得了继续不断的求知欲？有何证据？校内师生及周围人民对于改造物质及社会环境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何证据？

简而言之，考成的范围从若干学科扩大到生活整体，考成依据实证的证据，考成从整体出发确定每部分的权重，考成的目标是为了使教育能贴近生活，增长人的生活力，引导教育更贴切地服务人的生活向前向上发展，实现人生目标，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

陶行知所说的考成并未形成系统可操作的体系，但是后来世界各国的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正是朝着这样的大方向发展。因此，学习并有效运用基于整体、实证、多元、综合的评价理论与实践，改进包括考试招生制度在内的教育评价体系，才能为“减负”创造更好的条件。

原载《中国教育报》

送到战地医院抢救，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临终前，他留下的遗言就是要我长大了学建筑，为重建中华尽一份力。同时，嘱咐部队要我们赶快离开山东，韩复榘（时任山东省长）是不抗日的，要我们一定不要做亡国奴。当时，外祖父已去世，外婆、母亲带领两个未成年的舅父、一个表哥和我，与未满周岁的妹妹，举家走上逃亡之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个长征，一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还有一个长征是千百万群众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走向大西南的长征，这是旷日持久的悲壮的逃亡之路。我们一家，从山东出发，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贵州，最终于1944年到达重庆，长达6年之久。途经之地，没有火车，也找不到汽车，逃难民众携儿带女、肩挑背扛。从我有记忆起，留下的印象是风餐露宿、走走停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沿途都是难民的人流，饿死、病死、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悲惨情景历历在目。在逃亡中，中国民众死亡何止千万。我们永世不能忘记这笔血海深仇。每当我回忆这段逃亡生活，就会想起艾青的诗：“当我还是一个儿童，已有了严肃的心情，我用忧郁的眼睛，看着数不清的苦难，岁月在血泊中浮游，死亡在追赶着生命……”就泪水长流。

在流亡途中，我八岁了，没有书读。到达重庆后，两个舅舅已成年，找到了工作，并先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二舅父李延伦，是陶行知创办的社会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是陶先生做学生工作的得力助手。我是受战争损害的儿童，是地下党的同志把我送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我们班上许多同学是战时孤儿，每当我们谈起战争中失去了亲人，都会伤心流泪。陶先生知道孩子们的伤痛，由音乐老师创作了《我们不流眼泪，流泪是懦弱的行为，泪水洗不尽我们的耻辱，也不能把敌人打退……》的歌曲，同学们相互安慰鼓励，决心长大后要为我们

的父母兄弟姊妹报仇雪恨。1945年8月，我十岁时，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日益迫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撤回延安。在南方局和红岩村庄主饶国模的支持下，育才学校从合川古圣寺迁到了红岩村。我们这些小同学，就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三楼上，层高低，我们都是地铺睡觉，解放后，我才知道我睡那间屋子是办事处的发报室。育才学校教师许多都是隐蔽的中共党员，八路军办事处又把图书留给了育才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粮食。我们从小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陶先生在抗日战争看到了中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掷地有声地呼出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了不起，将来一定了不得！”他的爱国热情感染和教育了师生。他追随中国共产党以及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友谊，也深深地教育了育才师生。1949年11月，我们在红岩村迎接了重庆解放，那时，我十四岁。值得回忆的是：1950年，重庆要在学校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我是第一批被发展的团员，入团仪式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举行。时任重庆市长的陈锡联是我们入团宣誓的监誓人，刘伯承司令员讲话，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做新中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1950年11月，重庆举行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我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出席了大会。会议根据学校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现，选举重庆大学刘文权为市学联主席、重庆一中学生会主席方延惠和我被选为学联副主席。当时育才学校学生会主席是邝忠龄，因怀孕生小孩，就由我去履行市学联副主席一职。

我于1954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政治法律专业人才。1956年，我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一生受到的最大波折是文化大革命，那时我30岁。我用所学的马列主义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批判》，批判造反派夺权，是毁我人民政权；批判只抓“革命”，不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走上崩溃的边缘；批判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等。这十大批判传到了市委副书记辛易之那

里，他十分赞同，批示印刷10万份，在全市散发。这就捅了马蜂窝，重庆造反派在他们办的报上发出通缉令，要捉拿《十批判》的“黑手”，说这是直指中央文革的反革命传单。于是，我先后逃亡到上海、西安等地，直到1967年所谓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我已生活费用断绝，只得回到重庆。造反派已查清我是“十批判”的作者，他们多方侦察，终于把我抓住。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补发工资，解决生活费用；二是文斗，不能伤我身体。西南政法学院造反派从1967年2月起，对我批斗、挂黑牌游街有数十次之多，由造反派宣布我是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开除我的党籍。我心里很清楚，造反派的决定是不算数的，毫不畏惧，也不认错，也不写检讨。但是，进了造反派组织的所谓“劳改队”，并送我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群人到西山坪劳改农场劳动。1970年，十三军主持重庆市革委工作。当时市革委政工组长高维狱（三十七师师长）派三十七师团长汪汝哲，到西山坪了解情况，当听到我说的情况后，他当面说：“你不是反革命，你是拥军的，我们需要你去工作。”我于1970年5月20日，部队派车把我接到市革委政工组报导上班。我在西山坪劳动时，心中总是想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常常想起《列宁在十月》的两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了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大、市政协。我先后在市宣传部等部门和市政府工作。经历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重庆直辖的全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我被指派负责经办了文教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我们这个班子经历两年多的工作，对一万多人员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公职。再就是为重庆直辖尽了一份力，当时市领导要我具体落实在渝四川省属高校、中专、医院、科研院所划归重庆的具体事项，我认真完成了任务。市委书记又指定我负责制定在渝高等学校结构调整方案，即部分高校的合并与重组，我们的方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批准并全部实施。由我担负的工作，我尽职尽责完成了任务。2003年，我68岁时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所走过的坎坷道路。今天，国家正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胜利前行，我们感到欣慰，并盼台湾早日回归，盼中共二十大后，又有新的振奋人心的发展。谢谢同志们。

2022年7月2日

如诗如歌的育才学校专业组(连载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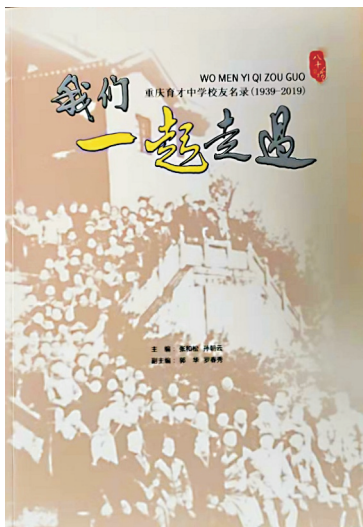
文/孙朝云

五、敢于斗争的社会组

人数最多的社会组

社会科学组（简称社会组）是育才学校最先开设的六个专业组之一，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组。

古圣寺时期社会组的彭洋同学回忆说：“育才创办之初就设立了社会组，至1949年底共招收了四个班。在校本部古圣寺时期为第一班，1945年初迁回龙寺时期是第二、第三班，1946年初迁至红岩村及1947年校本部迁上海（留在重庆的小学、初中部改为育才重庆分部），1949年初又招收社会组，1949年下期社会组与教育组合并为社会教育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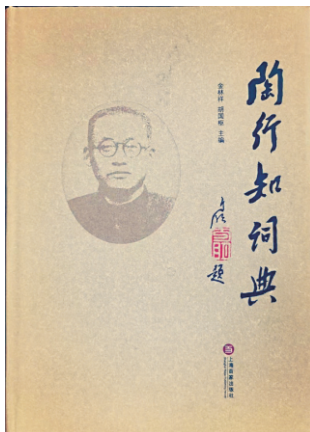


《重庆育才中学校友名录》
(1939—2019)

据重庆育才中学2019年80周年校庆出版的《重庆育才中学校友名录（1939—2019）》书中的名字：古圣寺时期社会组108人，红岩村时期社会组31人，共139人。

在《陶行知词典》“育才学生名录（1939.7.20—

1946.7.25）”中的社会组名单为75人，是各组中学生最多的。



方明题写书名的《陶行知词典》

1940和1941年去延安的11人中就有5人是社会组的：李远芑（李鹏）、王智、肖志蓬、魏道静、周负今（周力生）。1946年去延安的7人中有3人是社会组的：时佩甲、罗叶明、余劲梅。

1949年及之前，社会组去川东地区和重庆秘密活动及武装起义的也有二三十位师生：陈尧楷、徐永培、徐春轩、曾贵谦（曾哲）、王继云、刘迦（刘素清）、董和欢（董淑文）、胡芳玉、易元琪、赵令芹（社会组教师）、吴吉林、魏义成、罗洛庚、程忠瑛、陈国魂、向杰栋、林涛（钟林、钟青安）、刘光荣、詹廷栋、蔡学尧（蔡原）、陈祥超、郭一帆（社会组教师）、李一林（李少白）、谢毅然、马莲碧、喻素芳、吴吉林（吴绍云）、韩述志、秦泽芳（秦树清）、彭洋等。另外，社会组到苏北、中原等解放区去的和到浙南游击区和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也不少。

由于经济困难和形势所迫，1940年7月和1941年2月育才学校教师两次大批离校，到1941年底，在校行政领导、各组主任、教师共30多人

(不含义务教师), 学生152人。在6个专业组的学生112人中, 社会组的人数最多, 有38人。



学生们抱着自己在马家沱农场种植的西瓜

经费、人力、物力等的困难没有压垮育才, 全校师生响应陶校长的号召, 学习延安军民自力更生精神, 实行开荒种地, 生产自救。1944年3月2日, 为了学习南泥湾垦荒生产, 以补充学校经费的困难, 陶校长在北碚澄江镇嘉陵江边马家沱物色到了一片空地245亩, 因是光秃坚硬的生荒地, 故名“光铁坡”。便写了一首《今征三十士》的诗, 张贴在壁报栏内, 召开动员大会, 号召同学报名参加“光铁坡”垦荒种地。不到一天的工夫, 同学们就用铅笔、钢笔、毛笔, 把自己的名字写满了诗的公告。全校除音乐组和绘画组在重庆、合川演出外, 共有67人报名参加, 其中, 社会组19人: 王传义、周寿梅、吴瑞林、曾贵谦、傅子祝、陈尧楷、彭英、张旭东、石远贤、杨惠群、李文帆、郭嗣俭、向颐、张学如、谢可列、周文彬、江伯雍、王继荣、王有德。其余戏剧组16人, 自然组14人, 文学组9人, 小学部9人。3月9日, 光铁坡正式动工,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劳动, 开垦荒地30亩, 并种上南瓜、玉米等作物, 建起了育才学校第一个农场——马家沱农场。

一起走过的历程

1939年育才学校开办时社会组的建立, 首任主任是孙铭勋, 指导员是吴勃, 艺友是皮晓芳、李荣福、冷中雪、稽钰、杜琴远、程森、廖意林、杨寿南、聂奇慧。



社会组首任主任孙明勋

1940年暑假后因经济困难以及20多位老师先后离校, 学校改组, 艺友制取消改设导师, 社会组的导师是聂奇慧和廖意林。以后社会组有吴勃、廖意林、屠公博、苏永扬(苏辛涛)、袁

铁羽、徐冰若、罗克汀、刘询岳等任主任。社会组先后有方与严、聂奇慧(聂静涵)、牟执伯、王琳、程森(凌则之)、赵令芹、杜远琴、吴甫、冷中雪、杨寿南、赵隆侃、牟以石、皮晓芳、李福荣、稽钰、吴让能(育才上海时期)、刘俊英、屈渭滨、李能寿、郭一帆、邓初民、张友渔、秦邦宪等担任教师。

社会组开设社会发展史、伦理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哲学、法学、地理、中国问题、国际问题、教育概论、宪法概论、新闻学、农民问题、时事等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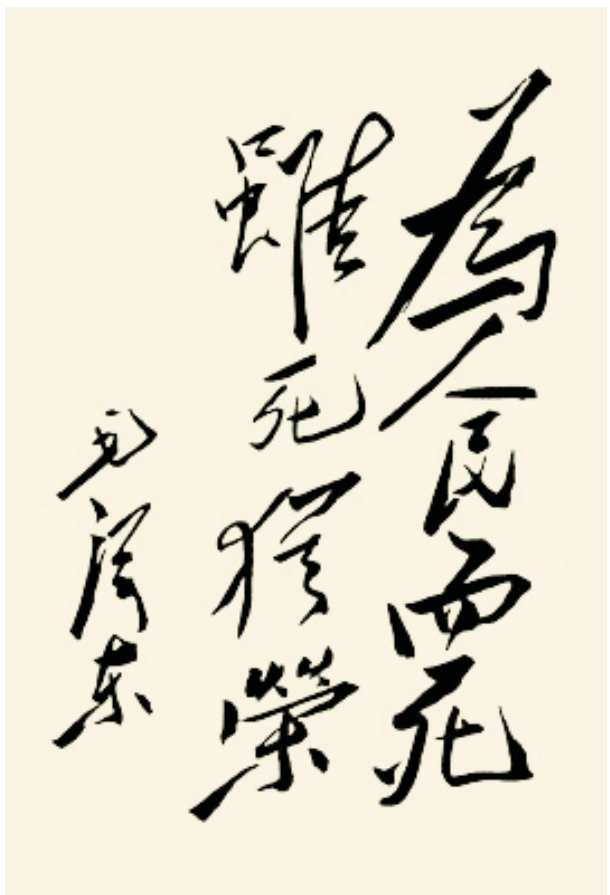
社会组和其他组一样, 除了上课学好各门功课之外, 还组织了各种兴趣组, 也到工厂和农村做社会调查, 办农村识字班。

抗日战争最吃紧的时候, 社会组作了两幅战争形势的彩色大地图, 一幅是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图, 一幅是苏德战争形势图, 挂在教室里, 上面插着各种国旗, 每天根据最新消息更换国旗, 使大家一目了然地看清八路军、国民党军与日军、苏军与德军的作战区和战争形势。社会组经常举行各种研讨会、报告会和时事座谈会, 大家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还组织到群众中去, 到工厂、农村、街道去调查、采访, 除每周星期五下午全校共同出去采访外, 还增加了一个下午的采访时间。



社会组办的时事壁报

社会组还创办了《小时潮》《形势》《小战士》《小太阳》《星根》墙报、《最新消息》黑板报和《时事壁报》等，每天《新华日报》上的重要新闻，都有专人负责把它用小黑板在过道上公布出来。



1946年4月毛泽东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

1944年报名去“光铁坡”开荒建农场；1945年在回龙寺邀请陈家庚、萨空了作专题报告；1946年参加“一二五”为促成政协会议成功

的万人大游行、叶挺将军出狱欢迎会、“四八”烈士追悼会、较场口集会；1947年参加学生“抗暴运动”；1948年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1949年赴川东武隆地区进行地下武装斗争，参加重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大游行等等，社会组都很积极，甚至还献出了他们8位同学的宝贵生命。

1946年初，地下党支部书记廖意林派社会组赵隆侃老师率领社会组学生吴吉林、詹廷栋、胡芳玉和文学组的邓菱，到合川组织农村小组，实习在蒋管区内如何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历时半年再返校学习。

社会组邀请专家学者到校讲学的有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吴玉章、秦邦宪、侯外庐、叶以群、姚雪垠、周谷成。红岩村时期有章汉夫、熊复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常去作专题报告，周恩来、邓颖超也几次到育才参观并来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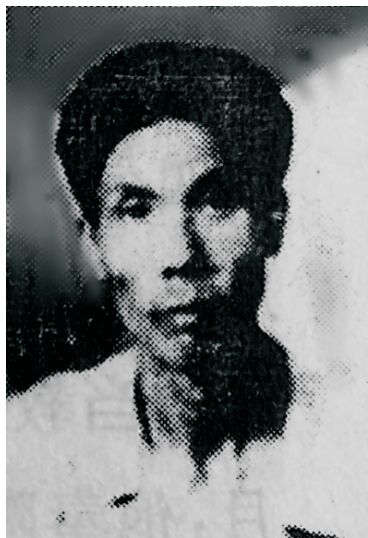


1944年秋育才学生第二次听翦伯赞先生讲中国历史

1947年9月，以迁往上海的文学组、社会组少数同学为基础，组建了新闻组并招收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同学。余家宏任新闻组主任。新闻组成立后，编印出版了新的《演出通讯》（月刊），直到上海解放，先后出版了13期。

陕北秧歌舞，通过八路办事处同志的传教，最先在育才学校流行。在1949年“四·二一”学生运动前后，社会组及教育组的部分同学，就在武训教学大楼上，自觉地跳起舞来，一边唱着进步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我们是兄弟姐妹》《年轻的朋友快快

来》《你是灯塔》等歌曲。



育才学校分部第一任主任郭平

育才校本部和
专业组全部迁往上海后，重庆只留下普通组和小学部，为育才学校分部，由原小学部主任郭平任主任，并兼教务主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仍是廖意林。1949年3月，重庆育才学校成立教育组、社会组，由袁铁羽任教育组主任，徐冰若任社会组主任，由刘俊英、徐冰若、袁铁羽、屈渭滨、李能寿等任课。9月，由于社会组、教育组许多师生离校参加革命，人数锐减，故两组合并为社教组，刘俊英任社教组主任兼语文课教学，政治课改由张思旷担任，教育课由李能寿担任，音乐课由李育林兼任。

1951年9月，上级行政部门对育才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社会教育组撤销，学生分配工作，至此，育才学校社会组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育才到延安的社会组师生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敌人暗地里加紧了对重庆育才学校地下党组织的监视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地下党组织为了培养年轻的后备干部，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决定从学校同学中选送一批优秀的学生到延安去，在那里接受党的培训和学习。是年夏，周恩来副主席派他的秘书袁超俊去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找陶行知先生，请他在学生中选一批没有父母和其他亲属在大后方的孤儿，送到延安去培养。袁超俊坐船到北碚，走路到草街子古圣寺，当晚就见到了陶行知先生，同他说了这件事。他回去后不久，陶先生就送了一批小孩去，集中在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

处)。在那里将以八路军家属子女的名义待命到延安去。一天下午，这批同学得到办事处的通知，说周副主席要接见他们大家。不一会，办事处钱之光主任陪同周副主席到了育才，周副主席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后说：“你们愿意到延安去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周副主席严肃地说：“到那里不是去享福，而是去革命，是要吃苦，甚至要做出牺牲的。你们的家人同意你们去吗？在重庆有亲属吗？如果你们哪一个人的家庭或亲属不同意你们去，可以留下，送你们回学校去，不然你们去了，家里来向我要人，我怎么交待呢？”并亲自和每个孩子谈话，得知其中有两个孩子大后方还有亲人，一个是杜鸣心，一个是伍必端，就把他俩留下来了，两个人都哭了好几场。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为了一路上躲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盘查，每个孩子都由时任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秘书、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救亡俱乐部主任荣高棠编写一段故事，这每一段故事周副主席都要亲自审查、修改，让每个孩子记熟，被盘查时不露出破绽。周副主席说



原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

这些故事的情节中如有破绽，在重庆通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关卡中，在国民党特务的盘查面前就会使孩子们有丧命的危险。当年送到延安的同学有：李冬、王智、萧志逢、周力生、魏道静、刘国钧、张作

民、刘幼雪和戴晓林等同学。到延安后,社会组的萧志蓬、王智和文学组的李冬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自然科学学院预科补习二班学习,文学组的刘国钧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1943年3月王智和李冬又调到中国医科大学学医。

据不完全统计,从育才学校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往延安去的师生有30余人,其中社会组就有李远芄、王智、肖志蓬、魏道静、周负今(周力生)、时佩甲、罗叶明和余劲梅8人,而李鹏是1940年10月最先去延安的。



烈士李硕勋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之一,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1927年,李硕勋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此后又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和浙江、江苏等省军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广东军委书记。同年7月,他在海南岛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两个月后英勇就义。

李硕勋牺牲后,母亲赵君陶按照中央安排带着才三岁的李鹏从香港到上海,一年后又带着刚一岁



赵君陶与儿子李鹏合影

岁的遗腹女李琼和李鹏从上海到成都,先后在成都、合川、雅安、简阳、犍为等地以教员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开展抗日宣传。她一方面利用各种条件做党的地下工作,一方面悉心照料李鹏兄妹,含辛茹苦,饱经磨难。

1939年9月学校开学不久,正在北泉疗养的中国共产党内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就把住在他那里的烈士遗孤李远芄推荐到育才学校社会组学习,这个李远芄就是后来的李鹏。1940年10月李鹏离开育才学校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于1941年2月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抵达革命圣地延安,他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生活了整整5年,对延安的感情深厚。



1941年邓颖超与李鹏在重庆红岩村的留影

由于日军“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然而延安却又是充满希望的。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毛主席还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李鹏和同学们也投入到了大生产运动之中,学到了自力更生的生产、生活本领,树立了艰苦奋斗的人生价值观。

在延安生活了近5年,李鹏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莫斯科动力学院

1948年初，在全国解放已为时不远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决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去学习，以满足解放战争胜利后国家对经济技术干部的需要。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李鹏放弃了哈尔滨油脂厂自己已经熟悉的工作岗位，告别了相处融洽的同事，于1948年9月初坐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当李鹏等21名留苏学生为专业选择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听取了来苏联治病的任弼时同志的意见，选择了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5年大学期间，他学习非常刻苦、认真，最后的毕业设计得了满分，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全优生。

别开生面的时事晚会

1941年8月1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朝会上总结了“集体创造月”活动的经验教训，并宣布开展“育才创造年”活动。他亲拟《育才学校创造年计划大纲》和《育才学校创造奖金办法》，鼓励创造成为一种制度。两年来，学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创造活动。学校组织音乐、戏剧、绘画三组“雾季见习团”赴重庆学习、演出或举办画展；创立“幼年研究生制”，先后从学生中挑选了27名幼年研究生，开展历史、政治、军事、文学、戏剧等的研究，其中朱振华同学研究苏德战争后，写成了20万字的论文初稿，断定法西斯必败，苏联必胜；成立育才美术团、育才合唱团、育才实验剧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全校

都停课组织观看日蚀；组织师生步行百里到重庆观看曹禺编剧并主演的描写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的话剧《安魂曲》……使育才学校在经济困境中依然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

1943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创办四周年时，陶校长写了一首《创造年献诗》。

诗中写道：

行以求知知更行；
不知直认为不知；
遍览已知求未知；
已知与人已愈知。

……

“武断”“以为”靠不住，
存在由来定意识。

……

日日月月积成年，
努力创造新天地。



1946年9月20日《书报精华》第二十一期
刊登的陶行知遗作《创造宣言》

1943年10月13日，陶校长在凤凰山上写下了教育诗篇《创造宣言》。15日下午和16日，他分别在育才学校指导会育才学校朝会上作了宣读。全校立即响应陶行知校长创造宣言的号召，又掀起一个开展创造活动的高潮。当天晚上音乐组就在校内的露天舞台上举行了“音乐夜会”，31日晚上文学组举行了“诗的晚会”，12月18日自然组举行了“化学之舞”晚会。

11月6日晚上，社会组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时事晚会。他们把英、苏、美三国会议以活报剧形式搬上了舞台。选定“十月卅日”这天的时

事，把英、苏、美三国外交政策的情态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印象最深的、效果最好的时事教育晚会。

表演是以三幕话剧的形式展示的：第一幕是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以苏联小女孩（傅子祝同学饰）与卖报者（郭璞同学饰）攀谈“三国会议”的情景；第二幕是各国记者（杨惠如、毕汝钦、裴未如、田兆法四位同学分别饰演苏联记者、英国记者、美国记者、中国记者）采访三国政要（王有德同学饰演艾登外相，王传义同学饰演赫尔国务卿）；第三幕是表现“三国会议”的进程。

第三幕是这样的：会议厅布置得宏伟富丽，窗明几净，沙发靠椅都是用硬纸壳和鲜艳的花布做的，灯光是用油灯变幻折射的。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相艾登、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驻苏大使哈利曼、英驻苏大使卡尔、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以及苏联外长女书记员等，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亦被邀出席会议。会议共同商讨天下大事，对于开辟第二战场发生小的争执，但最终对于如何击溃希特勒、盟国合作以及欧洲战后问题，达成了三项协议。中国得以列入“四强宣言”，加重了我国的国际信誉，增强了我国击溃日寇的信心。会议最后起草《联合宣言》，当宣布“……对法西斯总反攻的时代已经到来，胜利的曙光已经亮了，从今天起，我们开始了世界的新时代”时，台上台下，欢呼声掌声雷动真的像传遍了全世界一样！随处可以听到高呼：“庆祝莫斯科会议的胜利！”“欢迎中英美苏四国的团结合作！”“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亲密合作！”“消灭法西斯！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来宾中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吴泽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形式、新的创造。李华先生说，这是把时事科学化、艺术化的创造。陶校长认为是



历史学家吴泽

把莫斯科搬到了凤凰山，或是凤凰山的大小朋友和农友们游历了莫斯科。这台晚会非常形象生动，使人感到真像参加了10月30日的会议一样。

“反美抗暴运动”中的社会组

1946年12月4日，在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沈崇事件”，激起了我国广大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然而，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社发了消息，称“沈崇似非良家女子。”“美军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需加调查。”北大西斋学生宿舍的墙上贴出了一张署名《情报网》的大字报，造谣说：“最近延安曾派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暗示沈崇是延安派来的，是行使苦肉计，引诱美军成奸，以便制造事端。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诽谤，愈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



当时一些报纸对沈崇事件的报道

12月30日下午1时半，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中法、朝阳等大学5000多人的游行队伍从北大出发，路经东皇城根、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特别绕行驻在协和医院的北平军调部，高喊：“抗议美军暴行，严惩美军官！”“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去！”“反对政府媚外，维护中国主权独立！”等响亮口号。沿途参加游行的人群很多，游行队伍增加到1万多人，围观的市民也有数万人。

北平的抗议游行迅速得到全国几十个大城市的响应。从1947年1月1日起，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青岛、广州等地相继涌起了学生抗暴游行的高潮，参加的学生有50万人以上。



北平大学生抗暴大游行，走在前面的队伍是清华大学

同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各团体纷纷起来支持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1947年1月6日，上海市总工会致电蒋介石，提出惩凶、赔偿、道歉等4项要求。同日，15个民主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



上海工人举行反美示威游行

1947年1月1日，育才学校社会组老师牟以石接到外地同学寄来的传单。得知这一消息后，广大师生强烈要求投入美军暴行的活动，马上得到地下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的支持。并当场决定：全校师生坚决响应平、津、沪、宁学生的行动，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反对中美商约，要求美军从中国滚出去。

运动一开始，育才地下党组织就在以吴玉章、张友渔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在学校地下党支部的部署下，先后派出社会组的王传义、冯鸿甲、董和欢、刘素清、杨维宝、李少白、吴晏清，文学组的刘子林、苏觉、苏水静、

殷晓枫、唐仲芬、周毅、陶月初、曾静、解伟民及自然组的赵义熙等50余人到全市包括重大、女师学院、西南学院、适存高商，渝女师、市一中、文德女中、广益中学、蜀都中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串联，为组织全市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做好了准备。



学生们写在电车上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

在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中，社会组起到了很好的先锋作用。1月2日，社会组和文学组为主的王传义（社会组）、易难、苏觉、苏永静等36位师生签名投书《新华日报》，大声疾呼：“中国真正的爱国行动和我们的力量来保卫祖国的生存，驱逐野蛮的美帝国主义。”1月3日，重庆31所大中学校代表116名在城区大梁子青年会开会，育才学校派了王传义（社会组）、易难（化名杨明）出席并参加了临时主席团。经讨论决定成立“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下设秘书、宣传、联络等股，宣传股由育才学校杨明负责，并决定1月4日至8日罢课5天，1月6日举行全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由育才文学组苏觉参加主编的《抗联通讯》作及时报道，沟通各学校之间的信息。

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游行学生被捕28人，重伤19人，约500人遭毒打，酿成“五二〇”惨案。在重庆，游行队伍同样遭到国民党军警特的暴行。



在南京金陵大学主大门张贴着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

2月5日，育才学校及其他进步青年参加“抗暴联”组织的宣传队，到达江北公园宣传时，突遭特务的棍棒、石块袭击，财物被抢，队伍被冲散，宣传队员被打伤。有7人重伤，10余人轻伤，多数是育才和社大同学，如社会组的冯鸿甲、自然组的赵义熙等同学被打伤。2月7日学生请愿敌人的暴行激怒了更多的革命群众，各学校派出200多名代表到西南长官公署请愿。2月8日，以育才学校为主的宣传队伍约200人上街游行，不少同学化妆参加游行表演，当游行队伍到达大同路时，预先埋伏在路口的大批国民党特务和便衣军警，疯狂地冲击队伍，用桌凳、扁担殴打宣传队员。育才社会组的王继云、戏剧组周竞等身受重伤住院，数百人民群众到医院慰问。这次血案，大多是育才学校同学。



重庆的反美抗暴游行和重庆大学女学生抗暴呼吁书

“2·5”“2·8”两次血案，激起了全市学生、教师和阶层人民的极大义愤，重庆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组成“重庆爱国学生血案后援会”，发表了《为重庆学生血案告全国人民书》。育才学校孙铭勋等39位教师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14日，“抗暴联”再次组织各校学生代表到市政府和西南行辕请愿。市长张笃伦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同同学们代表谈判。育才学校的易难同学参加了谈判。各报社进步记者、广大群众在外面唱歌、呼口号给代表们助威，最后迫使张笃伦答应了学生代表提出的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给受伤同学治伤、保证学生安全、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要求。当代表们出来宣布谈判结果时，全场欢声雷动，育才同学把易难抬起来抛向空中不断欢呼：我们胜利了！

“孙妈妈”为“黄五一”更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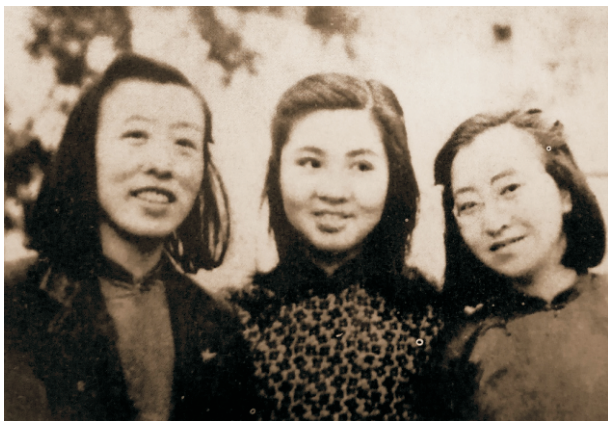
在育才学校，有一个被大家尊称为“孙妈妈”的老师，他叫孙铭勋，和蔼可亲，尊重人才，关心慈爱师生，没有一点架子，生活简朴，工作认真负责。他生于1907年，贵州省平坝县（现安顺市平坝区）人，是我国早期幼儿教育家。1927年，进入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学习幼稚师范教育，并按照陶行知的主张，在晓庄及其周围办起了中国第一批农民幼儿园，享有“陶门大弟子”的称誉。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贵州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参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首任育才社会组主任，陶先生辞世后，1947年4月育才学校本部开始搬迁上海后，留在重庆的普通组两个班和小学部为育才学校分部，1948年7月他也任育才学校分部部长，领导师生，千方百计把学校维持下来，直至重庆解放。1950年3月经人民政府批准，育才学校改私立为重庆市立育才学校，孙铭勋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研究员、西南师范学院副教授。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反右”中受错误处理，1961年含冤去世，1980年彻底平反。著有《古庙活菩萨》《幼稚教育》《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

《劳工幼儿园》《从行知诗歌看教育》等。



1940年孙妈妈（孙铭勋）带领社会组同学修筑古圣寺周围的一一路

其实，在育才这个大家庭里，其称呼犹如陶行知校长办学一样，是很新奇和特色的。陶行知虽不老但人们叫他老夫子，因为他学富五车，见多识广，进取谦和。也称方与严为老夫子。称男老师为“大哥”，称女老师为“大姐”，连校医熊医生也叫她“小熊姐”，既亲切，又自然。遇上同姓的教师人数多，年龄相差太悬殊，就按来校早晚或年龄进行排序，必要时还在前边加上老、大、小等词，比如，称廖意林叫意姐，夏英岚叫夏大姐，龚尔琼叫琼姐，称张其时叫张大哥，潘道凯叫潘二哥等等。这就是育才学校，老师像对待弟妹一样爱护学生，学生也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尊敬老师。



1945年意姐（廖意林，左）、群姐龚尔群，中）、微姐（周微林，右）合影

更名，在育才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非鲜见，就育才学校涉及的人和事来说，也有很多，这里随便都可数出几件有意义的更名来。陶行知不仅两次

为自己更名，还为学生更名。1934年2月16日，陶行知在上海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并题写刊名，1939年陶行知将它更名为《战时教育》，1945年11月又更名为《民主教育》。1945年文学组有一个名叫熊天才的同学，入学时陶行知校长对她说，要牢记昨日民之才，为人民服务，就替他更名叫熊民才。



陶行知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后更名为《战时教育》，又更名为《民主教育》

1940年底，音乐组学生杜明星在育才通过教育和实践得到感悟后，便自己更名为杜鸣心，领会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少年的殷切期望，明白了学习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一个出人头地的明星，而是一项为世界为人民服务的神圣工作。1947年7月，社会组吴绍云响应党的“下乡再下乡”的号召，离开江北区仙桃乡中心校到复兴场陈家岗万海清家当农民，就更名万海林，说是“万海清的被拉壮丁逃回的亲兄弟”，以掩护自己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和农运工作的身份。



1940年社会组部分同学合影
(后排右一徐永培、右二陈尧楷，前排左一朱振华)

1949年春，一天上劳动课，铲除校园内的杂草，同学们都非常认真地干活。到了下午有些累了，大家都坐下来休息时，忽然孙妈妈来了。他先随意同王廉贵同学摆谈了几句。然后笑着向社会组的黄五一同学说：“你的名字可否改一下？改为黄务一，免得惹起麻烦。”“五一”就是五一劳动节，带有革命色彩，容易引起特务注意。改名字是为了保护黄五一同学，以免引起特务注意。一字之改，妙！同学们都笑着点头，“黄五一”也从此叫“黄务一”了。

在武装斗争中熔炼青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挑起内战，大举向解放军进攻。镇压民主运动，陶行知先生战斗在第一线，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同时配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学校培训青年，到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育才学校学生近百人分到川东各地开展革命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



1947年意姐、苏永扬、模执伯和社会科学组部分同学留影

1946年至1949年，为配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学校培训青年，到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育才学校学生近百人分到川东各地。社会组去川东地区和重庆秘密活动及武装起义的也有二三十个师生：陈尧楷、徐永培、徐春轩、曾贵谦（曾哲）、王继云、刘迦（刘素清）、董和欢（董淑文）、胡芳玉、易元琪、赵令芹（社会组教师）、吴吉林、魏义成、罗洛庚、程忠瑛、陈国魂、向杰栋、林涛（钟林、钟青安）、刘光荣、詹廷栋、蔡学尧（蔡原）、陈祥超、郭一帆（社会组教师）、李一林（李少白）、谢毅然、

马莲碧、喻素芳、吴吉林（吴绍云）、韩述志、秦泽芳（秦树清）、彭洋等。其中参加华蓥山游击队的有徐永培、陈尧楷、徐春轩、易元琪、刘素清等；去武隆建立农民武装的有郭一帆、谢毅然、李一林等；去广安搞武装斗争的有刘光荣、向杰栋、陈国魂、程忠瑛等；去合川实习锻炼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的有詹廷栋、吴吉林、胡芳玉等。另外，社会组到苏北、中原等解放区去的和到浙南游击区和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也不少。



陈尧楷（社会组）

1946年，学校党组织就派出一批师生到各地参加武装斗争，社会组学生陈尧楷、徐永培和音乐组学生徐相应被派回到家乡四川大竹县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陈尧楷1922年生于大竹县张家场，1942年进育才

学校社会组学习，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张家场特支军事委员，并练就一身双手持枪的本领，人称“双枪王”。领导“张家场起义”，打响了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农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48年8月至9月，参加民联军第五支队在广安观音阁的华蓥山起义，任独立中队长，并成为第五支队实际上的军事负责人。9月上级组织建立广（安）邻（水）大（竹）山区党委和游击队，任命他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司令。后担任广邻大山区党委书记和广邻大山区游击队司令员，在竹垫广邻大山区策应华蓥山起义。后担任东山党委书记，带领武工队殊死战斗。1949年6月25日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7岁。李柏青《陈尧楷烈士》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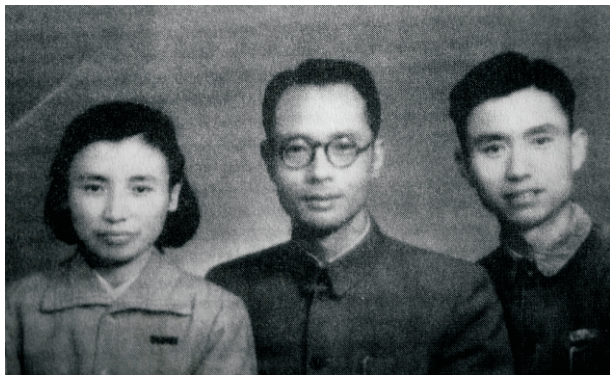
浑身侠义气如虹，家产全倾献大公。
行猎聚贤拖队伍，举旗斗敌起林丛。
具谋兼勇如儒将，遇挫仍坚似猛龙。
游击神枪陈氏子，威名何止震川东。



徐永培（社会组）和徐相应（音乐组）

徐永培和徐相应是叔侄，但徐永培比徐相应只大两岁。二人均是大竹县杨通乡的，均是1940年进入育才学校的，一个在社会组学习，一个在音乐组学习。1947年7月，徐永培任杨通乡特支书记，负责武装力量的政治工作；徐相应任特支委员，负责军事工作。1948年9月，徐永培任广（安）邻（水）大（竹）山区党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带领游击队与国民党的“清剿”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1949年5月13日在邻水县龙安乡被捕。徐永培被关在大竹监狱，徐相应被关在大竹三圣宫监狱。在狱中他们经受了百般酷刑，坚贞不屈，大义凛然，8月10日他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徐永培26岁，徐相应24岁。

敌人还要抓捕徐相应的爱人包璞，孙铭勋同志把包璞和她的两岁的女孩安排在学校，后来又派教育组学生邝忠龄护送，转移到邝忠龄的家中，保住了她的安全。



赵义熙（右，自然组）苏永静（左，文学组）与屠公博老师（中，社会组）合影

1947年2月5日，育才学校及其他进步青年参加“抗暴联”组织的宣传队，到达江北公园宣传时，突遭特务的棍棒、石块袭击，财物被抢，队伍被冲散，宣传队员被打伤。有7人重伤，10余人轻伤，多数是育才和社大同学，如赵义熙（自然组）、冯鸿甲（社会组）等同学被打伤，王锦波同学从头到脚被打得遍体鳞伤。育才师生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到医院去慰问受伤同学。“抗暴联”发表严正声明，并酝酿举行更大规模的抗暴宣传活动。敌人的暴行激怒了更多的革命群众，2月7日，各学校派出200多名代表到西南长官公署请愿。2月8日，以育才学校为主的宣传队伍约200人上街游行，不少同学化妆参加游行表演，周竞与另一位高个子男同学扮演美国兵，扮演群众的同学用麻绳捆着美国兵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大同路时，预先埋伏在路口的大批国民党特务和便衣军警，疯狂地冲击队伍，用桌凳、扁担殴打宣传队员。有的同学一面用身体掩护小同学，一面与特务暴徒搏斗。化妆扮演的同学一面用道具向敌特还击，一面掩护其他同学撤退。育才的王继云（社会组）赤手空拳与敌特搏斗，连续打伤数名特务，最后他和周竞（戏剧组）、谢仕桓（自然组）、李才秀（戏剧组）等身受重伤住院，数百人民群众到医院慰问。这次血案，学生8人重伤，20多人轻伤，大多是育才学校同学。



王继云（社会组）

王继云是重庆北碚天生桥人，生于贫苦家庭，1942年入育才学校社会组学习。1944年积极参加举办农民识字班工作。1947年抗暴斗争受伤后的10月，便被上级派往达县、梁平、大竹三县交界的山区开展游击活动。是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在麻柳河滩与敌人激战中，为了掩护战友撤离，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直到用尽最后一粒子弹而英勇牺牲，时年21岁。

住在育才学校旁草街镇的易元祺，1940年入

社会组学习，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春被派往澄江镇电厂，以推销电瓶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1947年奉上级指示到大竹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夏，在由重庆运送武器弹药至大竹途中遭遇敌人截击，不幸被捕，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于大竹县文星乡，时年24岁。



刘光荣（社会组）

1946年到育才学校社会组学习的刘光荣，1928年出生于四川广元县。1947年在“反美抗暴”运动中头部受伤，1948年去广安搞武装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岳特支委员。1949年3月在花桥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也不屈服，3月3日夜被杀害于广安城外官山白骨塔。被害前给母亲写绝命书：“儿子死后，老人家不要悲痛而应高兴！因为儿子是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牺牲的，是光荣的！”时年21岁。



胡芳玉（社会组）

还有一位是1945年经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管家巷28号）主任王敏介绍到社会组学习的女学生胡芳玉，1926年生于四川省梁山县（今梁平县）虎城乡。1946年初，地下党支部书记廖意林就派社会组赵隆侃老师率领组员社会组吴吉林、詹廷栋、胡芳玉和文学组的邓菱，到合川组织农村小组实习，在蒋管区内如何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历时半年再返校学习。胡芳玉在小学教书，组织发动群众做农运工作。9月中共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抽调她到北碚天府煤矿做地下工运工作，仍以教书为掩护。1947年秋，由王敏、钟鼎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经党组织派

遣回到家乡参加组织梁山的虎城、达县的南岳、大树一带武装起义工作，属华蓥山游击队第一工委领导，即虎城赤区。1948年初成立大刀队任政委。2月率队参加虎（城）南（岳）大（树）赤区的“二月暴动”，与数十倍于我的敌人顽强战斗。为了保护众多乡亲们的无辜牺牲而被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7日被杀害，时年23岁。



许智伟（中学部教师）

1949年6月临近解放，经中共川东党组织派遣，郭一帆（社会组）、许智伟（中学部）、徐行健（普通组）等教师带领学生谢毅然等13名学生到武隆县山区开展农民运动，支持教师袁铁羽等到川北和支持学生陈黎源等到岳池开展革命工作迎接解放。出发前，时任校长的孙铭勋从学校紧张的经费里挤出36块银元，给每名师生发了两块作为路费。郭一帆等师生到了桐梓山后，吸收和培养部分先进青年入团，发动当地群众迎接解放。当年8月，他们建立了中共桐梓山支部，由郭一帆任书记。9月经川东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武隆特支，由许智伟任特支书记，郭一帆、黄石声、邓致远为特支委员。在支部和特支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在桐梓、平桥、庙垭等地扎下了根，育才同学如谢毅然、何良、徐希明、张绍北、熊禾禄等都深入农村与群众同甘共苦，通过四五个月的工作，把铺坪、谭家坝一带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成立了约有二百多人参加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派农民代表参加。11月18日，解放军到达桐梓山，许智伟等人组织群众烧茶筹粮迎接，派人为解放军带路。22日晨，解放军将困守在白马山的敌军歼灭，顺利解放武隆。



武隆桐梓山郭一帆、许智伟、谢毅然等五烈士墓

1950年1月2日晨，郭一帆、许智伟、谢毅然等人住在群众家里，突遭几百暴匪包围。因寡不敌众，他们被匪徒们抓捕，并绑在桐梓山场口枫树上残忍杀害。郭一帆时年31岁，许智伟27岁，谢毅然只有19岁。



徐行健捐赠给母校的一块银元

1979年徐行健把他那得到的舍不得花的一枚银元捐赠育才母校，称为“幸存者”。如今，这枚银元已永久存入重庆育才陶行知纪念馆，成为了进行传统教育的教材。

1949年秋，孙铭勋参加了中共沙磁特支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小组，还派出学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策反工作。策反小组通过各种渠道，在解放前夕，策反了驻丰都的国民党47军长杨熙宇起义，策反了涪陵反共保民师师长王杰成起义和丰都地方反共团负责人的起义，为重庆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回忆在上海育才学校的日子

文/马腾

1946年人民教育家、重庆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先生被迫害致死，重庆育才学校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扬言要封闭学校的威逼下，处于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封锁、内外交困、无法维持下去的紧要关头，得到了上海宋庆龄先生的同情和大力资助，通过宋庆龄福利基金的帮助，育才学校由重庆迁入上海市宝山县的大场余庆桥赵家花园，从此以后，全校1000多名师生，在宋庆龄先生的亲切关怀下，得以重见天日，获得了新生和自由。

育才学校迁入上海后，全校师生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以极大的热情恢复和重振学校，使学校面目一新，欣欣向荣，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大大改善，生活条件有较大提高，这都得益于宋庆龄先生所领导的上海福利基金会的帮助和支持。

当时上海育才学校的校长为马侣贤，教务主任为杜君慧，副主任为徐荇、屠公博；总务部主任为谢阜如。学校设有六个专业：新闻教育组、自然科学组、绘画组、戏剧组、音乐组、舞蹈组。新闻教育组主任余家宏，自然科学组主任为潘道凯，绘画组主任为周令钊，戏剧组主任为周彼，音乐组主任为庄严，舞蹈组主任为戴爱莲。

我进入育才学校是经过叔父马侣贤介绍后，经过学校校务委员会批准进入的。入学前经过教务部主任杜君慧谈话后，正式注册入学。我所在的新闻教育组的老师有余家宏、陆静山、胡友模、龚思雪、张其时等，本组同学有吴瑞林、潘合定、汪祖高、钱行健、解伟民、沈丽珠、谢开

德、钱瑞华、王瑛、李丹等近30人。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子女、地下党的革命后代无父母的孤儿，生活费享受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义养的待遇，即公费生，其余为自费生。我在学校开始为自费生，后来在学校勤工俭学，为学校刻讲义和做杂务，申请为公费生。

学校按学科分别上基础课和专业课外，还经常组织座谈讨论，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举行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还经常邀请许多知名人士和学者到学校来讲演、作学术报告。使我们有机会经常见到许多学者名流，如宋庆龄先生和邓颖超同志曾来育才学校看望师生，国民党元老邵力子以及文艺界、教育界知名人士田汉、胡纯、贺绿汀、戴爱莲、陈鹤琴、周小燕、徐迟等到学校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育才学校位于上海市宝山县的大场余庆桥赵家花园，周围的村庄有沈家楼等10余个村庄，那里的普及教育、扫盲、识字班，都由学校包干负责，学校的老师、学生白天上课，晚饭后由老师和同学们组成有语文、音乐、戏剧、美术、舞蹈等班级抽调的师生五、六人为一组，分别到各个村庄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唱歌、跳舞、学画，同时每个组还配有一个医药箱，其中配有各种药品，在晚边农民收工后、上课前为农民看小毛病，如伤风、感冒、眼疾、皮肤病等，晚饭后正式上课。由于这一活动长期坚持，深受当地农民欢迎。使学校和周边村庄、农民关系亲密，亲如一家，所以每到逢年过节，都相互赠送礼品、拜

年贺岁；农民办喜事，都邀请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会干部作为贵客，热情招待。

学校平时除按专业分组学习、上课外，还经常外出实习采访，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学校内部还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联欢会、形势报告会，演出节目和展览，如新闻教育组由老师和同学们举行的时事报告会，介绍国内外大事；自然科学组举行的科学讲座，绘画组举办的画展，戏剧组、音乐组、舞蹈组举办的各种精彩演出，如活报剧、大型歌舞会、音乐演奏和演唱会。这些活动的组织者，除由老师主持外，还有同学们广泛参与，这样既活跃了学校的文化生活，又使同学们得到锻炼和提高，增强了实践能力。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之间如同家长和兄弟姐妹一样亲密，相互关怀照顾，经常以大哥、大姐、兄长和姐妹相称，团结、友爱形同一个和谐而欢乐的大家庭。

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有这样一所与众不同、特殊而极富传奇式的学校，因此在上海周边引人注目，造成较大的轰动和反响，所以每逢节假日和周末，都有大批的社会团体、学校、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前来考察、参观、学习，举行联欢活动，真是应接不暇。因为学校倾向革命，学生思想进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源源不断地为解放区输送大批革命力量和青年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执行反共政策，发动内战，一党专政，排除异己，育才学校师生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爱国斗争，因此成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平时不但不给学校一丝一文经费，反而经常到学校捣乱，国民党军警特务还不时到学校搜查，抓捕学校领导和进步学生，他们借口学校图书馆内有解放区出版的图书和文艺作品，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诬蔑学校“通敌”“与匪区有联络”等莫须有的罪名，扣押学校领导，多次在宋庆龄先生干预下才得以释放。

1948年—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被彻底摧毁，被迫举行和谈，在这期间，为了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救助

饱受战争之苦、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和千千万万的苦难儿童，在庆龄先生的倡导下，为募集福利基金，学校响应号召，经过精心排练，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隆重演出十幕大型话剧《小主人》，剧情生动、悲壮、感人，一针见血地揭露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战火不断、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流离失所，少年儿童失去父母，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流浪街头，饥寒交迫的悲惨局面，剧情感人肺腑，使观众感叹不已。演出取得极大成功，深受社会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在上海广大群众的要求下，该剧连续演出了半个多月，共十余场，场场暴满。《小主人》由学校戏剧组老师导演，同学王万恩、刘卯钊主演，服装、道具、效果都由各班级同学轮流担任，演出收入除日常开支外，其余全部捐献给上海宋庆龄福利基金会。除此以外，在解放前夕，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共同组织演出《大头鬼阴魂不散——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大型话剧，揭露蒋介石集团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排斥异己，特务横行，杀害进步人士，施政不力，造成经济崩溃，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痛苦，广大人民盼望解放的情景。这一剧目开始是秘密演出，上海解放后，公开向社会演出，深受上海党政机关和军管会的赞扬，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退缩在上海的蒋军残余势力，仍在负隅顽抗，我们育才学校在赵家花园的校本部已被蒋军强行占领，广大师生无法上课，甚至安全也无法保障，在这危急关头，又是在宋庆龄先生的亲切关怀下，由上海福利基金会出资，将上海市内北四川路第四人民医院对面的教堂租下，临时安置我们全校师生暂时住在那里，一边勉强上课，一边迎接上海解放，并抓紧排演节目，编写文章、歌曲和传单，以便在上海解放时迎接人民解放军，上街头演出。

1949年5月底，上海正式解放，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将事先准备好的歌舞、戏剧、传单等，在上海街头散发、演出，配合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军管会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动员工厂开工，商店开门营业，学校上课，恢复上海的正常秩序。一时

间学校的各项活动轰动了上海的各个街道、工厂、学校、文艺单位，不少单位还主动邀请学校戏剧组、音乐组、舞蹈组去他们单位演出和联欢，使育才学校在上海名声大震。由于育才学校文艺组织久负盛名，这就为全国解放后以及抗美援朝期间被选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慰问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团的组建奠定了基础。我到福建工作后，曾两次看到我校同学们的精彩演出，会见了我校老师庄严、吴平及同学吴振邦、张丽琳等，感到非常亲切，并为母校——育才学校感到自豪。

我在育才学校读书从入学到离校（1948—1949年），将近两年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锻炼，特别是受到陶老夫子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熏陶，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学校是综合性的多学科专科学校，我开始从参加勤工俭学，为学校刻讲义、编写育才通讯，担任后勤服务，被选为学生会干部。

由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大西南和福建沿海急待解放，我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打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随军服务团”，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而努力。从1949年6月入伍后，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行军，10月到达福建后分配工作，曾担任工作队长、区委秘书、县委组织部干事，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县委秘书、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中学校长、南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90年离职休养。

在福建的70多年来，曾参加过开辟新区、剿匪、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权，以及后来的“三反”“五反”，开展“一化三改”，即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到改革开放，为福建人民作出了有益贡献。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与合影留念。文化大革命后进入教育战线，有机会从事教学研究，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于1978年和福建省科委主任、原育才老校友陆维特、曾哲（曾贵谦）发起成立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陆维特为会长，曾哲为副会长，马腾为常务理事，推动全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扬光大。

1986年夏，全国陶行知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马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受到张颈夫会长和江泽民（当时市委书记）的接见。1986年12月，在上海陶行知研究会感召下，发起成立南平地区陶行知研究会，被聘为顾问连续多年，推动全区10个县（市、区）的陶研会工作的开展。

1990年离休后，仍从事许多社会活动，如关心下一代工作、“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挽救失足青年、参与南平创建老年大学，在学校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多年。1997年曾荣获福建省教育委员会授予“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受到了奖励。目前我已进入耄耋之年（93周岁），但耳聪目明，身体健康，得到国家照顾和关怀，晚年生活幸福。

应该肯定：我的成长完全归功于党的培养，也得益于陶行知老夫子伟大教育思想的熏陶，归功于母校育才学校对我的培养，并给我指出革命道路。育才学校啊，我敬爱的母亲；育才啊，我敬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将永远怀念你们！永远跟着党建设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终生！

2022年9月于福建省建瓯市芝城镇

陶行知和吴树琴的患难之爱

文/沈俊峰

少女情窦初开之时

吴树琴于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的溪头村。他的父亲是位教书先生，母亲是家庭妇女，这使得吴树琴从小有了受教育的机会。1934年，正值妙龄的吴树琴从屯溪隆阜第四女中示范班毕业了。为了追求进步，吴树琴便和两位最要好的女同学一起走出了大山，离开了熟悉的家乡，来到了繁华陌生的南京城。

在南京，他们找到了安徽公学的校长姚文采，请求这位同乡能帮助推荐她们继续深造的学校。热心的姚校长当即应允，于是修书一封，让3位姑娘到上海去找他的同乡好友陶行知。

那时候，陶行知因为不愿做国民党官而得罪了蒋介石，正遭通缉，整天过着东躲西藏的不安定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陶行知还是热情地介绍她们考进了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科学校，这令吴树琴从心里感动。

对于这样一位学贯中西致力于人民教育的学者，吴树琴早已久仰大名，只是未见面。自从她入学后，与陶行知的来往自然就多了。

吴树琴和同学们常去陶行知避难的住处玩，陶行知则热情地教他们学书法，带她们去听他和艾思奇的讲演，还邀请吴树琴去参观他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吴树琴被陶行知非凡的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所深深感染，对这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气宇不凡，颇有学者风度的中年男子更为钦佩。

1937年，陶行知受全国抗日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亚、非28个

国家和地区。他在国外期间，患有精神病的结发妻子汪纯宜不幸在上海病故，这使得他悲痛万分。

陶行知在悲伤苦闷之时，常给知心朋友吴树琴写信，诉说心中的感受。他写了将近100封信。陶行知还3次寄钱给她，支持她完成学业。一次，陶行知从美国洛杉矶寄来一首诗：“罗矶四月雪未溶，冰晶玉洁姐妹峰。我欲访兮无以登，一霎那间各西东。梦中几次曾相遇，醒来人影俱无踪。预期桂花初香日，应有故人月下逢。”这首火辣辣的情诗就像一枚石子，投进少女平静的心田，荡起了层层涟漪。爱神从天而降……

《结婚歌》——一首新的婚礼进行曲

1938年，吴树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中西药房实习。因为那里的人看不起女性，她常常受到歧视，吴树琴颇觉苦闷。她将现实情况告诉了远在香港的陶行知。陶行知当即复信，让她去香港到他创办的“晓庄研究所”工作。吴树琴毫不迟疑，很快就到了香港。不久，伴随着国共合作和抗日高潮的到来，陶行知的通缉令终于被解除了，他还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树琴和陶行知取道越南河内、云南昆明到了重庆。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1939年冬天的一个月夜，陶行知和吴树琴踏着清寒的月色漫步于花园小径。陶行知紧紧握着吴树琴的手，满怀激情地说道：“我们已经给那么多苦难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大家庭，我们也需要一个小家庭了，琴，我们结婚吧！”

吴树琴无言地点了点头。

为了筹办婚事，陶行知忙开了，还满怀兴奋地作了一首《结婚歌》。婚后，陶行知携夫人回到了重庆北碚区区长芦子英用旧碉堡为他们改建的新房。

幸福的生活仅有8年

婚后，陶行知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实践着自己平民教育的理想。对此，吴树琴尽其所能热情地支持帮助他。陶行知病了，吴树琴亲自给他配药吃，因为她知道陶行知勤俭节约的脾性。陶行知每月400元的参政费全部交给学校使用，他还为办教育到处募捐。

1945年12月1日，昆明3万学生罢课，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撤退在中国的美国侵略军，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国民党反动当局向罢课的学生发动袭击，投掷手榴弹，炸死爱国学生和教师4人，伤20多人。惨案发生后，12月9日，陶行知深知情势危险，便在城里大义凛然地写信给她：“……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的，望你不要悲伤。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的基础……”

抗战胜利了，黑暗似乎暂时过去了。吴树琴和陶行知在1946年4月11日回到了上海。陶行知的志向是，恢复上海工学团，还要办社会大学。当时国民党特务很猖狂，在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传闻下一个就是陶行知。友人叮嘱他们二人分开住，目标小。陶行知听从了，他还准备了两份遗嘱，一份寄给了生活教育社，称：“死我一个，能唤起千万个。”一份留给吴树琴，嘱她“继续搞教育”。

然而，人们没有料到事情会是另外一个结局。1946年7月，因长期营养不良，操劳过度，年仅55岁的陶行知没有倒在反动派的枪口下，却因脑溢血猝然去世。这从天而降的噩耗，对吴树琴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也太突然了，她痛不欲生，哭干了眼泪，整整失眠了3个多月。陶行知不幸去世后，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高度评价了陶行知不平

凡的一生。郭沫若先生也在致悼词中说：“陶先生是以德服人的，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很完整的圣人姿态。他是知、情、理三方面很平衡发展的，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真、善、美的完人。”

孤独的怀念

陶行知病逝后，吴树琴将伤痛埋在心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曾在报纸上发表《痛哭行知》的殉葬诗：“你和我永别了！你和你爱的人民永别了！你永别了世界，永别了一切！虽然我们是千呼万号，都永远喊你不回来！……使我难忘的，是当你有快乐的时候，一定先带给我，让我共同快乐。当你有愁困的时候，只是静默不言，将痛苦的事情往心里丢，怕我对你焦忧伤心……”

从相识到相爱及至永别，陶行知留给她的唯有两袖清风，百余封情书和献身平民教育的敬业精神，但有了这些就足够了，陶行知的伟大人格改变了吴树琴的一生。

1953年，随着电影《武训传》受批判，陶行知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消失了30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研究才恢复。1991年在陶行知诞辰100周年之际，有关部门专门举行了纪念大会。随着“陶研”的升温，吴树琴越来越忙了，登门求教的，写信请求释疑的纷至沓来，吴树琴写信封论扎，买邮票论版，连邮局的小姐都认识她了。光《陶行知文集》她就送了1000多册。吴树琴还积极协助有关教育科研单位拍摄了《烛光曲》《最后的一百天》《万世师表》等电视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树琴老人现在读书看报不戴眼镜，身体健康，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问及其健康秘诀，吴老淡淡一笑说：“要有一颗平常心。”1983年9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6卷本的《陶行知全集》，付给吴树琴及其家庭6万元版税，他们一分钱也没拿，全捐给了全国陶行知研究会。说起这一切，吴树琴再一次说出陶行知的那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原载《家庭之友》1996年第7期。

沧桑感喟话“特园”

文/杨耀健

一

“特园”的主人名叫鲜英，1885年4月出生于四川西充县太平乡，幼读私塾，熟谙经史。光绪末年四川总督锡良奉旨筹办新军，在成都开办弁目学堂，意在培养朝廷鹰犬。但鲜英考入该校却参加了同盟会，暗中进行反清活动，并与同学刘湘、杨森、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贺国光等人交谊笃厚。民国初，鲜英被选送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毕业后留任袁世凯总统府侍卫官。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毅然南下广州，参加“护国之役”讨袁。1920年刘湘任陆军十六师师长，任命鲜英为该师参谋长。翌年四川防区制形成，川军总司令刘湘盘踞重庆，复任鲜英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即铸币厂）局长，1925年又提任他为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江（北）巴（县）卫戍总司令。1928年川军整编部队时，鲜英辞去师长职，改任四川善后督办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

1935年1月，刘湘通过张澜与中共代表张曙时建立联系后，鲜英开始接触中共人员。不久，他同张澜、钟体乾三人代表刘湘，在成都同中共派来的代表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并由刘湘资助20万银元，购买食盐、布匹、西药等大宗物资，暗中援助陕北红军。1935年5月，鲜英任四川第十三行政区督察专员，驻节绵阳；1936年12月改任第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驻节南充。1939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

共高潮后，他鉴于国事日非，从此不再出任国民党的任何职务，虽经张群、杨森、贺国光等人敦请，他仍婉言谢绝，息影“特园”。

鲜英的夫人金竹生是一位勤俭持家、精明实干的农村劳动妇女，与鲜英在西充县太平乡鲜家沟老家结婚。因西充土地贫瘠，两家又拮据，鲜英乃思变外出习武。直到鲜英出任重庆铜元局局长时，才将夫人接到重庆居住。鲜英为官清廉，没有家产。金竹生说，没有恒产便没有恒心，也难以在重庆立足，要动脑筋。她看见铜元局内有几座小山高的煤渣无人要，便请人打成煤块煤砖卖钱，有了钱先买房后出租，收取租金后再购房。鸡生蛋，蛋孵鸡，金竹生用这种简朴的原始积累方法，历时9年，积攒起一笔钱，于1929年在上清寺择地修建住宅。

其时上清寺一带属于重庆主城区的边缘，金竹生所择之地，原是外省人的墓地，故地皮费不贵。金竹生有一点钱就建一幢房屋，使之逐渐连成一片。1931年鲜宅竣工，共有大小房屋36间，占地面积七亩有余。因鲜英字特生，乃将新宅命名为“特园”。

“特园”的主楼叫达观楼，由金竹生亲自设计，系一幢三层楼青砖建筑，主楼前后有两个大花园，鲜英夫妇居住。另有一幢一楼一底的楼房，以鲜英第八女鲜继平的“平”字命名为平楼，主要为金竹生的姊妹们居住。还有四幢连排三层楼房，以鲜英第九女鲜继康的“康”字命名为康庄，编为一、二、三、四号楼。“特园”的

黑漆大门高三米，宽两米，门楣上方有鲜英手笔“鲜宅”二字，苍劲有力。除达观楼、平楼、康庄外的其它偏房，供佣人使用或出租。

“特园”其地清幽，北滨嘉陵江，可见帆影点点，赏心悦目。宅内遍植花草，三月花放，九月蝉鸣，本是颐养天年的好地方。可是，大时代呼唤着鲜英，要他再次出山。

二

鲜英投身政治，与张澜有很大关系。张澜字表方，1872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县与西充县交界的张观沟，与鲜英是小同乡。旧社会虽然礼崩乐坏，但同乡关系靠得住，这一点很重要，过去未交代清楚。

1911年四川发生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函电纷驰，争议嚣然。张澜作为南充民众代表，赴成都与清廷四川总督、人称“赵屠户”的赵尔丰当面抗争，显示出大智大勇，名声鹊起。辛亥革命成功，他出任四川省省长，倡导地方自治和兴办实业，力主裁军和废除防区制，并创建成都大学和担任该校校长，世人皆知敬重。

民国初期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时，委任鲜英为护卫营支队长（相当于团长），可谓鲜英的老长官，关系又亲近了一层。

“五四”运动风起青萍，张澜为将新思想新文化潮流导向四川，从北京致函鲜英，嘱其在重庆与陈愚生等人创办《新蜀报》。该报聘请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和国民党左派漆南薰等主持笔政，嘉惠全川民众，也启迪了鲜英的爱国思想。

1933年春，鲜英受刘湘托付，与张澜一道出川考察，实则联系宁、沪、粤、桂等地的抗日反蒋势力。抗日战争前夕，中共从陕北派于江震、贾子群等人回川北开展工作，在张澜的关照下，鲜英多所协助。如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张澜任校长，贾子群任副校长，鲜英即任该校董事长。抗日战争爆发，南充的彭云等不少青年奔赴延安，鲜英特发给专署护照，分赠川资，并为之祖钱以壮行色。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全国民众要求下，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四川共遴选出四名参政员，张澜是其中之一。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在武汉召开期间，张澜会晤了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因而结识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切合张澜心意，从此他成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向张澜表示，中共将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希望鼎力协助。张澜慨然允诺。

国民参政会闭幕，张澜回重庆，下榻于老乡鲜英的“特园”。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周怡前往拜访，张澜便将周怡介绍给热情好客的鲜英。过了几天，鲜英设宴招待黄炎培、江问渔等远方来客时，张澜在席间说，因战局恶化，可能将有大批爱国志士进川，大家应尽地主之谊，妥善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还谈了周恩来所托之事，希望鲜英尽力。

当时虽然有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因为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云集，社会活动极为频繁，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仍然严加防范。他们密令青年会、抗建堂、西南实业大厦、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公共场所，不准租借给共产党活动，否则要追究责任。所以中共先遣人员从武汉到重庆后活动有困难，先在机房街租赁民房设置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后又自力更生修建红岩村。

三

1938年冬周恩来到重庆，先请董必武去“特园”同鲜英面商，大意为中共为同各界人士广泛联络，需要有共商国是的场所。鲜英倘能开放“特园”，提供开会方便，当然是最理想之处。

鲜英当然知道如果帮助共产党，要犯国民党的禁忌，但他爱国情殷，钦佩英勇杀敌的八路军，表示欢迎。第二天周恩来由董必武陪同，亲赴“特园”感谢鲜英的支持，并与鲜英恳谈三个多小时。周恩来对鲜英说：“我们在鲜先生府上活动，可能会给您带来麻烦，您有没有顾虑？”

鲜英答道：“大家都是为了共赴国难，我一是愿意，二是不怕！”

周恩来抚掌大笑。由于国民党多年的反共宣传，国统区各界人士不了解共产党，周恩来与他们接触有困难。鲜英位置超脱，在他家会见各界人士甚为方便。

此后中共在重庆设立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叶剑英、陈绍禹、秦邦宪、王若飞、陆定一、李维汉、廖承志、徐冰、叶挺、邓发、罗瑞卿、罗世文、王维舟、钱之光、华岗、傅钟、魏传统、张友渔、许涤新、熊瑾玎、胡绳、夏衍、王炳南、章汉夫、荣高棠、孙敬文、陈家康、乔冠华、廖梦醒、张晓梅、刘昂、赵世兰、龚澎、龚普生、童小鹏、梅益、于刚、徐盈、戈宝权、何其芳、熊复、陈野苹、薛子正、于江震等人，都先后到过“特园”，开展一系列活动。

周恩来住曾家岩50号，离“特园”不远。惟军统人员日夜监视，中共人员进出要遭到盯梢，民主人士来访也有特务打小报告。自从“特园”敞开大门，先约好要见的各界人士，周恩来再悄然前往晤谈，可摆脱军统耳目。

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都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政策。周恩来多次强调：“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启发各界人士深体时艰，团结抗战。这样的集会经常在“特园”举行，甚至中共内部的某些集会也在“特园”举行。

1943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从延安来渝，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陪同他在“特园”会见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民主人士，鲜英设宴欢迎。

1945年2月，周恩来假座“特园”，宴请孙科、于右任、谭平山、陈铭枢、杨耿光、王昆仑、屈武、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陶行知、李璜、左舜生、冷御秋、郭沫若、邓初民等20余人。席上，周恩来向大家报告了国是问题最近的洽商经过，并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向

当局进言。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中共领袖毛泽东三次光临“特园”。第一次是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他就欣然光临“特园”，同张澜、鲜英恳切长谈。第二次是9月2日，民盟领导人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宴后毛泽东应鲜英之请，为鲜英女儿挥毫写下“光明在望”四个大字。第三次是9月15日，毛泽东去“特园”为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张澜提出由他给蒋介石、毛泽东写一封公开信，公开国共双方的谈判内容，以便在全国民众监督促使成功。这个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和赞许。毛泽东抵渝、离渝之日，张澜和鲜英都亲去机场迎送。

四

除支持中共外，鲜英本人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9年秋，梁漱溟在“特园”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晏阳初、光升等知名人士20余人相继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在“特园”多次举行座谈会，也曾综合座谈意见向国民党当局进言，可是从未受到重视。入冬，因国民党顽固派挑衅，国共摩擦加剧，“统一建国同志会”担心影响抗战大局，欲从中调解，做些实事，于是在“特园”酝酿筹组新的党派组织。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山城，张澜、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李璜、左舜生、张君勱、罗隆基、章伯钧、丘哲等十余人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强调枪口对外，各党派要真诚对待坚决抗日的中共。考虑到孤立的个人对社会重大问题无能为力，同年3月由上述17人发起，在“特园”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鲜英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委员。10月10日，民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特园”实际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及后来改组的中国民主同盟，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特园”举行的。

民盟是在野党，没有经费来源，开展工作及日常开支，常由鲜英赞助。民盟总部机关报《民

主报》的开办经费，也是鲜英慷慨解囊。鲜英说：“既然大家信任有加，将我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就要竭尽绵薄之力。”

鲜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随着民盟改组，吸收进步分子以个人身份入盟，盟员不断增加，成为除国共两党外的第三大党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加之中共、民盟均以“特园”为主要活动场所，各党派团体、各界人士纷至沓来，一时间，“特园”外车水马龙，“特园”内冠盖如云。

“特园”的常客，共产党方面，有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人员。国民党方面，有元老、要员、地方实力派于右任、冯玉祥、李济深、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孙科、张群、朱绍良、贺国光、陈诚、杨森等人。其它党派团体方面，有青年党的曾琦、李璜等人；国社党的张君勱、蒋匀田等人；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黄琪翔等人；职教社的黄炎培、江问渔等人，乡建派及平教会有梁漱溟、黄艮庸、晏阳初、翟菊农等人；救国会有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张申府、史良等人。还有妇女界、工商界、学术界、文艺界的名流，有时一天要来几百人。

“特园”是陪都各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主要场所，董必武乃将鲜宅誉为“民主之家”。冯玉祥亲笔书写了“民主之家”的横匾，高悬于鲜宅的二门；张澜为之撰写楹联，分悬两侧。其联曰：“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帝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若干年后梁漱溟的儿子回忆道：“我去‘特园’探望家父，正逢画家丰子恺先生来访，当时‘特园’贵客盈门，车水马龙的盛况至今犹有印象。”

鲜英夫妇好客，为了接待宾客，“特园”的餐厅加宽，厨房内备有煤灶三个，还有两个小灶专做西餐，厨工杂役十多名，好似机关的伙食团。其它不说，仅燃煤一项，因需求量很大，由煤厂一车一车送来，力夫络绎不绝在山道上搬运，管事的发展子结账。

那时每天在“特园”用餐的人很多，最多时上千人，厨房从早到晚都在做饭、开饭，客人随到随吃。为此，鲜家的饭局被称之为“流水席”，犹如行云流水没有间断，并且是免费敞开供应，各届人士沾光不少。

中共南方局人员很是客气和节俭。有一次周恩来来到“特园”时间晚，正餐已开过，厨房准备另外为之备餐。周恩来不同意，将就桌上的剩菜吃了一顿。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人，也曾有过这种情况，同样吃剩菜。

张澜、梁漱溟在重庆无房产，长期寓居“特园”，鲜英无偿向他们提供客房。许多外地民盟成员，到重庆办事也临时住在这里。

总之，抗战时期是“特园”的鼎盛时期。

“特园”的频繁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出爪牙，伪装成小商小贩，遍布四周，密切监视。不久，戴笠本人又强租“特园”康庄，就近窥测动向。陈立夫还派人向鲜英许愿，只要“特园”拒绝接纳共产党人，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鲜英的回答是：“多承美意，但鄙人办不到。”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王若飞、吴玉章、秦邦宪等中共南方局人员不分昼夜，经常到“特园”去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民盟领导交换意见，达成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民盟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的“君子协定”，使民盟和中共的合作更加紧密。

五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民盟总部等党派团体随同迁宁，但“特园”仍然发挥着民主堡垒作用。11月初，民盟重庆市支部改选，选举鲜英为主任委员。民盟总部机关《民主报》归重庆市支部主办，发行人为鲜英。“特园”一如既往，与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新华日报》社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情况。

重庆是国统区的大后方，国民党将西南长官公署设立于此，特务机关亦以重庆为侦防重点，斗争十分激烈。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当局于

1947年3月悍然将驻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新华日报》社遣送延安，又在全城四处粘贴“消灭共产党和消灭共产党的尾巴”等标语，准备对民盟开刀。

经西南大区乙种会报同意，由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出面，突于3月6日通知民盟主办的《民主报》编辑部负责人唐弘仁、李康前往该部谈话。孙元良在政工处长杨敬年陪同下接见唐弘仁、李康时，恶狠狠地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话，是因为你们的报纸一直附和《新华日报》，惹事生非，煽动学潮。现在《新华日报》走了，你们还在制造谣言。我现在以警备司令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忠告，这样下去我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因为市民对你们异常反感。”孙元良所谓的市民，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市党部及中统领导的“社会服务总队”，他们正放出风声来要砸《民主报》。孙元良的意思，如果《民主报》不关门，挨了打他就不负责。

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亲到“特园”，话中有话地对鲜英说：“鲜师长，您是明白人，报纸不办了，留点钱给后人。”

鲜英说：“政府不是允许言论自由吗，怎么不让办报？”

徐远举说“这是南京的命令，《民主报》非停刊不可，许可证已经吊销。兄弟我马上要派人去报馆监督停刊。”

鲜英生气地说：“那就恕我不送徐处长了。”

《民主报》被迫停刊，报社地址也没有了，只留下牛角沱印刷厂供员工对外加工营业，维持生计。鲜英建议印刷厂多留点人，必要时还可以复刊。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峻，国民党为了搞一党专制，加紧镇压大后方的民主运动。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当局借口预防“共产党利用学生搞暴动”，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在重庆、成都同时实行大逮捕，史称“六一大逮捕”。民盟首当其冲，中央委员杨伯恺、张志和、范朴斋及盟员数十人被捕，《民主报》印刷厂被搜查，员工被抓走。经民盟总部、民盟重庆市支部强烈抗议，以及各界人士的声援，特务头

子徐远举答应释放部分民盟盟员，但指名要鲜英担保。鲜英挺身而出，一次保释民盟盟员20人。尚有多人被保密局认定为“死硬分子”，未能保出。

由于民盟公开表态要与共产党共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国统区民主运动中打头阵，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取缔，南京民盟总部、民盟上海办事处被包围，宣传部长罗隆基失去自由。

在重庆，绥靖公署代主任萧毅肃发表谈话称：“政府要求民盟停止活动，本地民盟组织应自动解散。”重庆警备司令发言人也宣称：“民盟分子应向警部自首。”同时又有自称为“民意代表”的六个民众团体请求国民党当局解散民盟，闹得满城风雨。

这段时间，民盟办的重庆社会大学被查封，与民盟有关的西南学院被勒令关闭改组，民盟的“新中国剧社”被迫解体。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华时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民盟的回光反照》《民盟的解体》等社论，并在《和平日报》的“陪都画面”栏目以假消息大肆诬蔑民盟，极尽诽谤之能事。《新华时报》则根据军统所搜查到的民盟名册，进行点名恐吓。

鲜英呢？照旧听远在上海的张澜的指示。张澜让范朴斋、曾庶凡带信到重庆给鲜英，请鲜英转告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盟员，密切配合中共的地下斗争。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盟盟员不畏高压，坚持秘密工作。

1949年初，张群出任西南绥靖公署长官，出于私交，他上任前去上海拜访了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的张澜。张澜向张群恳切规劝后，提出两项要求：一、释放被囚禁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民盟盟员。二、减免四川征兵、征粮负担。

张群到重庆上任，3月里两次请鲜英、范朴斋谈话，商谈释放民盟盟员，并请鲜英开据名单。鲜英随即通知成都民盟负责人，分头营救成渝两地历年被捕的盟员。被捕盟员均在保密局严密控制中，结果成都被捕盟员未能救出，全部牺牲。

而重庆方面，鲜英在范朴斋、冯克熙等人的协助下，从渣滓洞集中营内成功营救出田一平、唐弘仁、孙文石、刘慕宇、李康、舒军等20余位民盟盟员，其中包括数名交叉的中共党员，只有部分盟员未能救出。

脱险的民盟盟员出狱后，大都住在“特园”，后来他们疏散转移时，鲜英还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但是，其中一位盟员为了作纪念，并未告诉鲜英，就将自己在狱中受刑时所穿的血衣埋在“特园”的花园内，日后酿成了“血衣案”。

在上海遭软禁的张澜行动不自由，主要通过鲜英密切联系西南地区盟员和地方势力。与已经转移到香港的民盟总部保持联系，也主要通过“特园”中转，因为鲜英的社会关系多，国民党当局投鼠忌器。

解放前夕，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秉承国民党最高当局旨意，准备对重庆的发电厂、自来水厂进行破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除重庆总商会头面人物去找杨森说情外，鲜英也去拜访杨森，希望他不要糜烂地方，危害民生，以免留下骂名。鲜英与杨森早年是弁目学堂的同学。

杨森既然已得到重庆总商会交纳的“保护费”，又有个人的考虑，乃答道：“既然是特老登门说项，不炸水、电厂也可以。但是，鄙人也有一事相托。”

鲜英问道：“何事？”

杨森说，他打算将一位小老婆留在重庆，托鲜英照顾，另外，还有一些带不走的杂物要存放在“特园”。很显然，这是杨森的交换条件。

值此紧要关头，鲜英答应了杨森的要求，就此埋下祸根。

杨森并未食言，派兵到水厂、电厂虚晃一枪，就谎报已经炸毁。国防部晚间见灯火通明、自来水长流不断，追问杨森，杨森又谎称可能被中共派人修复。隔了一天，解放军兵临城下，国防部自顾无暇，未再追问。重庆的水厂、电厂始终未遭大的破坏。

“特园”在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已建成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荣耀千秋。

原载《文史精华》2003年第3期“史海存真”栏目，有修改。

李公朴：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文/胡平原



李公朴在重庆时留影

李公朴（1902年11月26日—1946年7月12日），谱名永祥，字晋祥，号仆如，少年时自取名字公朴，江苏省武进人。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社会教育家，爱国“七君子”之一，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共副主席周恩来称“他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为进步和抗战而奔走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唤醒了炎黄大地的有志青年。这时在店当学徒的李

公朴，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怀着一腔爱国激情，作文在报上公开揭露一些奸商将日货改贴商标冒充国货。店主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开除了李公朴。1923年，李公朴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考入了文华大学校前去武昌求学。1924年又考入沪江大学附属高中部学习，由于他刻苦努力，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沪江大学。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杭州，李公朴前往会见十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斯白（镇江人，与李公朴在润州中学读书时结友）。在陈斯白的推荐下，李公朴在十四军政治部总务科任股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公朴愤然离职。1928年8月间，李公朴回镇江拜访陈斯白、杨方震（曾创办镇江《救国报》）和闻谅直（与李公朴是润州中学同学），畅谈爱国之情。李公朴对镇江感情之深，常以镇江人自居，会说一口流利的镇江方言，更把镇江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对镇江老乡给予格外的帮助，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

1928年，李公朴考取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半工半读。留学期间，对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教育状况进行考察研究，认为学校“是改善社会环境的策源地”。

回国之后，李公朴与高士其在南京筹办《徐球通讯社》，与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创办旨在改变店员和青年学生痛苦生活的申报流通图书馆。

1934年李公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一部中译本《资本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选为常务委员。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35岁的李公朴在法庭审理中据理力争。宋庆龄、鲁迅、何香凝等名人发动爱国入狱运动，中外电报声援纷至沓来。因此，被羁押8个多月的爱国“七君子”被无罪释放。



1939年李公朴右三等访问延安

李公朴出狱后到山西考察，其间专门拜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并与大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进行座谈。李公朴经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对抗日形势作了全面考察。10月10日回上海后，发表了《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等一系列文章。文章认为“没有全民的动员，就没有全民的战争”。之后，李公朴应阎锡山的邀请去山西主持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拟订的民族革命大学十大纲领，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李公朴的名气，民族革命大学教职员很快增加到五千多人，后来不少学生去了延安。毛泽东在延安看望李公朴等人，还为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所画的《长城图》题了旧作《清平乐·六盘山》，支持李公朴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并给他配备一个红军老战士做警卫员。李公朴一行深入华北敌后晋察冀，教学团像一所流动学校，每到一地都开办短训班，宣传抗日，传播抗战教育的种子。此举引起蒋介石的仇视，命令严予查禁。李公朴6个多月的晋察冀之行，走访了

15个县500多个村庄，认为晋察冀是今天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型。从1937年8月到1940年11月的三年多时间，李公朴四上华北抗战前线、两访革命圣地延安，完成了四五十万字的抗战言论、战地通讯、抗战教育文稿。其中《全民动员论》《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4本著作风行中国，倍受读者喜爱，给人以抗战到底的巨大力量。李公朴为进步和抗战而奔走。

为民盟和民主而奋斗

1945年秋天，李公朴来重庆，是为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民盟刚由政团同盟改组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民主同盟不久，尽管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和职业青年在人数上已经很多，但由于历史关系，它的领导机关却仍然保持着政团同盟时期的结构，尤其是青年党这个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右翼政治团体还把持着民盟总部的部分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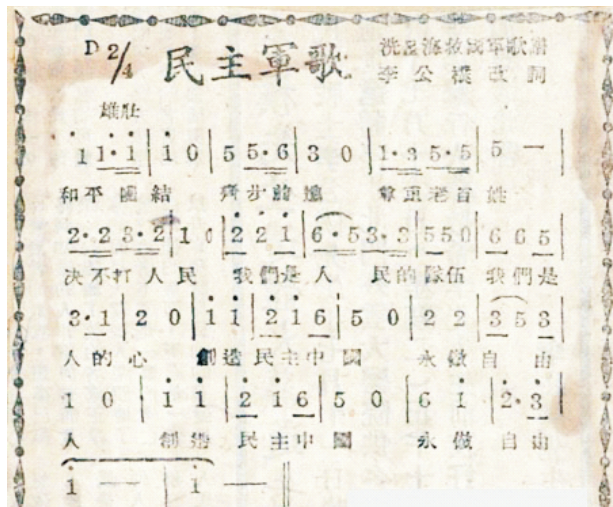


1944年李公朴在重庆与国内外著名人士留影
左二起李公朴、茅盾、王安娜等

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民主运动的开展，广大盟员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当时重庆支部、成都支部和昆明支部是盟内三个最大的支部，因此在大会前夕，总部对于昆明代表寄予很大期望。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都是那次大会的昆明代表，但闻一多等因另有工作，不能参会。那次会议不仅在民盟历史上是一次重

要的会议，在民主运动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事件。那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与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当时的形势是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中国向何处去却还是一个未定因素，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发动内战来扑灭进步力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民盟身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中间人士寄托着希望。不管他们对中国和世界有着多少不同的看法，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民主、团结”，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口号，也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中间人士在政治上的迫切要求。因此，在盟内清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党的影响，对把民盟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向前推进一大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公朴在这场斗争中不仅和昆明的代表一起向倒退的、保守的意见作坚决斗争，而且他还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团结了更多的力量，使顽固的青年党代表十分孤立，起到了很重要的民盟骨干作用。他态度和蔼，广交朋友，善于求同存异，也善于从大处着眼，又有组织才干，所以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他是社会活动家，各方面人都能联系，能沟通文化界和职业青年团体，把各方面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团结青年方面，作用更加显著。这也说明他的政治责任心很强，能自觉地发挥他的长处，为民主事业尽心尽力，死而后已。



李公朴作词的歌曲

民盟的那次大会是10月召开的。1945年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别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大学（现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箐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昆明惨案。当时，重庆各界十分震惊、愤慨，认为是国民党好战派蓄谋彻底破坏《双十协定》的阴谋，也是他们发出的要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信号。重庆社会各界并没有被昆明血案所吓倒，都在想办法要大力支援昆明的民主斗争，既要揭露国民党法西斯血腥暴行，要求惩办凶手和主使人，也要继续扩大掀起反内战的民主斗争。此时在重庆的李公朴心情特别沉重，因为他与昆明的青年和战友们有深厚的战斗情谊，他和他们在昆明是一道为民主而斗争的。

李公朴焦思苦虑，深入到重庆各界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征询意见，深入到民盟青年支部和重庆青年群众团体中去和青年们共同研讨如何以实际行动来声援、支持昆明的斗争。李公朴当时是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终于想出了办法，争取了各界的大力支持。民盟多数常委经过研讨也决定出面坚决支持，而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也正是在这时期迅速筹组成立的。12月9日至11日，重庆各界决心突破国民党的镇压、封锁和白色恐怖气氛，非常迅速、非常成功地组织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庆各界追悼昆明‘一二一’死难师生大会”。

追悼大会在重庆市长安寺内举行，到会有各界人士和群众3000多人，各界又公祭两天，人山人海，轰动了山城。在广大群众中公开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和法西斯暴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内战、反暴行、争和平、争民主的浪潮，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由于各界迅速行动，并特别机警，会场地点临时互相口头通知，所以在开会当天，已经突击布置好会场时，国民党反动派才知道，匆匆派来十多名警官，慌慌张张地看了一下

会场，未敢破坏就都溜走了。这次反内战的追悼大会开得很成功，李公朴在组织、联络和疏通意见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李公朴为民盟和民主而奋斗。

为和平和民主而献身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朴积极争取和平民主。他在重庆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将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编《民主教育》，组织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重庆各界协进会，并积极开展系列活动。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受蒋介石的唆使，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被打伤，送进医院治疗。面对黑恶势力，他对夫人张曼筠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

1946年5月，李公朴从重庆来到昆明，给昆明人民增加了巨大的民主革命力量，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于是，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特务到处张贴标语、散布谣言，说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勾结”，利用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并还说李公朴携带中共提供的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为了揭穿反动派的阴谋和向昆明人民说明真相，民盟支部在昆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民盟负责人再三声明，民盟是一个非暴力的革命团体，只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民主，暗杀和暴力更是民盟所坚决反对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被揭穿以后，他们千方百计又对李公朴等人进行造谣中伤和威胁恐吓。李公朴毫不畏惧，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李公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譬如：在一次集会上，李公朴雄狮怒吼：“想用死来威胁我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今天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同年6月底，中国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虽然民主同盟一再声称自己并非暴力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反对暗杀和暴动。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

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宜处置。”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奉令之后，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的名单。李公朴被列为第一名，闻一多为第二名。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在外出归途中，在青云街大兴坡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次日凌晨光荣牺牲。噩耗传出，第二天整个昆明沉浸在悲哀与愤怒之中。“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生于飘摇乱世的李公朴，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去迎接黎明前的曙光。李公朴牺牲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唁电：“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李公朴烈士墓



李公朴故居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党政为纪念这位为民主和平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修建了“李公朴烈士墓”和“李公朴故居”。1996年7月12日，在李公朴殉难5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为缅怀烈士英灵，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和湖塘镇政府共同拨款，重建“李公朴故居”。1997年底，李公朴故居修饰一新，作为常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新一代继承革命烈士遗志，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参考资料】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等。

杨秉孙 从难童到小提琴家的坎坷人生

文/罗昌遐

时光流逝，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现居美国患病的杨秉孙同学，原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奏员，首席、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理事，社会音乐学院副院长，1929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武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片领土，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九岁的杨秉孙和他哥哥进了武汉战时儿童保育院，被转送到重庆万寿宫临时儿童保育院后，分配到曹孟君任院长的歌乐山第一保育院，在那里生活学习。

1939年夏，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了育才学校，派孙铭勋、陆维特、常学镛老师到各保育院去挑选学生，杨秉孙被选进了社会组。他虽然分在社会组，但心却向往音乐组，当时音乐组主任贺绿汀先生教视唱练耳，乐理课，姜瑞芝老师教钢琴，杨秉孙常常在音乐组教室门外听同学弹琴，这情况被老师知道了，他于1941年冬转到音乐组学习。

1941年“皖南事变”后，贺绿汀、姜瑞芝、常学镛老师都到延安、新四军去了。只有范继森教授半年到古圣寺来教钢琴两三天，杨秉孙就跟随他及巫一舟老师学习钢琴。

杨秉孙在育才这所温暖的师生亲如父母兄妹的大家庭中生活了十二年，直到1951年6月，虽然生活很艰苦，穿的是草鞋子，吃的是长了虫的蚕豆和掺有沙子、稗子的糙米、牛皮菜、藤藤菜等，但丰富多彩的生活充满愉快。

1943年为了就近找老师学习提琴、钢琴，音乐组由北碚乡下搬到重庆江北观音桥，陶校长设法要来了一千元钱在中华交响乐团附近山沟里购得泡牛皮的茅草棚数间，作为音乐组安身之地。

同年春，杨秉孙师从中华交响乐团首席黎国荃老师学习小提琴，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刻苦，技术进步突出，深得老师的称赞，没多久就能演奏《嘉禾舞》的乐曲了。

1945年1月11日为庆祝《新华日报》七周年纪念，在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馆举办了文艺演出，演出了《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一朵小红花》等秧歌剧，全台演出由杨秉孙、杜鸣心、程贻鑫三位育才音乐组同学伴奏，演出非常成功，这是秧歌剧首次在重庆演出，后经育才在重庆北碚等地多次演出，秧歌剧在大后方广为流传。

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杨秉孙随黎国荃老师参加中华交响乐团去昆明慰问美国空军的演出。

育才学校的音、戏、绘、舞、文、社会、自然组于1947年4月乘船顺江而下，于5月1日抵达上海大场余庆桥。同年杨秉孙先后随廖玉玠、威登堡、约阿希姆等外籍教师学琴。

1948年冬先后入上海市交响乐团，后任第二提琴首席，并担任独奏任务，开过多次独奏室内音乐会，包括为抗美援朝捐献的演出。

1951年夏由文化部组建的中国青年文工团220余人赴柏林参加第三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艺术种类最丰富的演出团体，演出歌剧，歌

舞、合唱、京剧、杂技，带着中国人民的重托，宣传中国人民的胜利和五亿中国人的真诚情谊，自7月到1952年9月，应邀访问了民主德国、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等9个国家，足迹遍及152个城市，巡回演出437场，观众达242万人，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达到了和各国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的目的。

杨秉孙作为青年音乐家，1951年6月从上海调到北京，在文工团管弦乐队任首席和担任小提琴独奏，在联欢节期间，参加文艺比赛，获得小提琴优秀奖。

在访问匈牙利时，开幕式演出前一天，团领导交给他一个特别任务：要在开幕式时演奏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学院长查图莱茨基改编的《给孩子们》，说匈牙利朋友希望在开幕式上演奏。接到任务后，他想：这需要二周时间才能练好的节目，时间太紧，领导反复给他作工作，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当晚加紧练习，第二天又去向查图莱茨基教授请教，到晚上演出时，已完全背出那道乐曲，演出完，观众反映十分热烈，团领导在事后的总结会上高度评价他的演奏。

后来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都接受了同样任务，并把在那些国家学到的，有他们民族特色的作品带回到中国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罗马尼亚民间音乐《云雀》长时间享誉国内，包隆贝斯基的《叙事曲》作为小提琴名曲之一，在中国出版。

青年文工团在国外一年多，于1952年9月回国，杨秉孙留在了北京了，先后在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工作。

1954年杨秉孙和本团的钢琴演奏员巫漪丽结婚，同年由国家派往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留学深造三年至1957年毕业。

1955年在华沙联欢节，1957年在莫斯科联欢节获小提琴比赛获四等奖、三等奖。

1957年11月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1958年在莫斯科首届柴可夫斯基比赛中获证书。

1958年后在国内各省市演出，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兼课教师，在近八、九年时间里，他的工作、生活一帆风顺，在他生活条件较好时他没有忘记曾与他同甘共苦的同伴，他接济生活困难的

老同学(他是保育生)和老朋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从这里可看到杨秉孙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把爱给了别人，自己也从中得到快乐！

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前途无限辉煌时，“文革”十年浩劫开始了，祸从天降，把他从天上打入地下，给他带来的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他虽然在“样板团”也逃不脱厄运，只因和朋友们私下谈论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事，被人揭发说炮打中央“文革”，被定为“4·17”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现行反革命，1968年7月遭逮捕，被判十年徒刑，送监狱忍受那漫长岁月的煎熬。

我们不知他在狱中是怎样熬过那些苦难的日子，在他出狱后只听他说过在石家庄监狱里，从早到晚做预制板，每天吃的是窝窝头和贴饼子，到过年才给一口米饭和馒头吃，他伸出被磨得粗糙带有老茧的手给我们看，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小提琴家的双手如何去搬动那尖硬的水泥板？由于长年劳改生活，他已被折磨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日夜疼痛不堪，即使生病也要劳动。

在他被判刑后，在监狱中他主动提出离婚，由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作为反革命家属的她在政治压力下，为划清界限，也被迫提出离婚，在1975年—1976年他们离婚时，在财产分配问题上他提出：“我最关心的是我的提琴，它的寿命也超过半世纪，我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但我不能放弃琴(当时军代表已将琴借给乐团其他人使用)，除了把琴取回来，其它诸如借用，折价我都不同意”。由此可见他将这把琴视为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到了劳改后期，由于他有小提琴演奏技术，就教监狱长的孩子拉琴，和给河北歌舞团的同志上课，他得到“特殊照顾”免去干苦活，才有机会在犯人过年的晚会上拉上一两首提琴曲。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通过贺绿汀等老师，他得到邓颖超大姐的关注，终于在1977年11月从监狱中放出来，至此，他已整整坐了九年零四个月的牢。

197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给杨秉孙平反，恢复了他在乐团的工作，1978年4月初，文化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杨秉孙、王昆等五位

艺术家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并在《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报刊上刊登，重新焕发了他的艺术青春和施展他的才华，在交响乐事业上 and 全乐团的同志们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作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他代表国家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增进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文化使者的作用，1980年曾赴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1981年去日本长崎交响乐团开独奏会及演协奏曲，1983年带一小队去菲律宾演出，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访华，他担任首席并当翻译，小泽征尔特邀杨秉孙手牵手一起向观众致谢。

1983年-1984年接受柯达依纪念委员会授予的证书及柯达依纪念像，以表彰他介绍柯达依作品的成绩，又应匈牙利邀请担任第二届布达佩斯音乐节之作品比赛评委。

1986年担任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邀请赛评委。

1987年6月随中央交响乐团赴香港演出，任首席，副团长。

1987年以中央乐团首席，副团长身份赴美国24个城市访问演出，演出获得成功，受到美国人民欢迎。

正如领导对他几十年的艺术成就和工作的评价：“解放前在上海开过独奏音乐会，57年后参

加莫斯科小提琴比赛，分别获三等奖、荣誉证书等。多次在国内外开独奏音乐会及演协奏曲，并任国际比赛评委。多年任中央乐团独奏演员和交响乐队首席，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提高作出了贡献。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正确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及各项方针，在任中央乐团领导工作中认真负责，能团结同志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很好地完成国内各项工作任务。”

1978年3月杨秉孙平反后，和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医生结婚，1991年移居美国。

2001年中央乐团建团45周年，特邀请他回国参加纪念演出活动，他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立即飞回国参加纪念演出，在临回美国前的一次家宴上，他吐露出心里话，“我真愿意回来”。他考虑女儿正在美国上大学，还需他养活全家，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北京。他虽然离去了，但他心仍系念祖国。

在美国他靠教提琴维持家庭生活，由于日夜劳累于2006年在行车途中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才脱离危险，落下瘫痪后遗症，经过两年多康复治疗，现行动不便，靠轮椅在屋内行走，目前身体恢复到可以拉琴弹钢琴半小时了。

寒冬过去，迎来了2009年春天，祖国的亲人同学朋友，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全家幸福，安度晚年，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沉痛悼念程代辉同志

文/《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惊悉程代辉同志于2022年12月28日0时10分在上海因病不幸逝世，享年93岁。深切悼念，不胜哀恸。

程代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一级编导，上海芭蕾舞团老艺术家、原编导、离休干部，曾参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工作，是中国原创芭蕾舞剧《白毛女》编导之

一，为中国芭蕾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程代辉同志的离世，是中国芭蕾舞界的巨大损失。

程代辉同志千古！

《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2022年12月

沉痛悼念周令钊同志

文/《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中国著名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国艺术设计大师，中国壁画运动开拓者之一，中国文联第十届造型艺术成就奖获得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共党员周令钊同志于2023年1月3日15时06分安然离世，享年104岁。闻讯我们悲痛万分。

作为中国艺术设计大师，周老曾主笔或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团旗，第二套、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等。在期颐之年，他心系祖国接班人培养，对美育工作、美术事业发展不懈追求，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周令钊同志千古！

《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2023年1月

沉痛悼念姚文忠先生

文/《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惊悉姚文忠先生因病救治无效，于2023年5月13日3时20分于成都与世长辞，享年84岁。

姚文忠先生是全国著名基础教育专家、著名陶行知研究专家，曾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等职。先生一生从教，一生弘陶，从2005年开始便致力于研究陶行知教

育思想，曾发表《陶行知的教育人格》等颇具见地的论著。姚老学陶、研陶、践陶、弘陶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沉痛悼念，深切缅怀。

姚老千古，风骨长存！

《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2023年5月

析文感情，因情育人

——浅谈陶行知“情育”思想与语文教学

文/戴建新

语文课程是最重要的人文教育课程。析文感情，披文入情，因情育人，应是语文课堂教学的灵魂与重要教学方式。陶行知先生就非常重视“情育”在人的情感与道德、人格的成长与完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陶先生曾说：“知情意合一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我们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在知情意合一的教育中，“情育”应该处在首要的和核心的位置。这是因为：第一，思想感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情育”是构建“生命课堂”的决定要素；第二，“情育”属于德育的内容范畴，对智育等其他诸育起着引领和指导的作用；第三，“情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他诸育同时开展的过程。正如陶先生所说：“情育不是儿童脆弱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情感之调节与启发重视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的教育。”

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今天，重新学习研究陶行知关于“情育”的论述，对于追求积极有效的语文教学情感文化，构建充满生命活力的语文课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课程条件下的语文课堂为什么要关注情感文化呢？

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是教师执行“教案”的过程，对学生的反应和感受一般都很少考虑。教师根据教案（教学设计）环环相扣、步步紧逼，

学生正襟危坐、战战兢兢。这样的语文课堂教学，学生缺乏情感的体验、沟通和交流，缺乏自由、宽松、和谐的心理氛围，因而也就缺乏了生命活力。《中国教育报》曾登载过两篇文章，很能引起我们深思。一篇是《语文教育：我们最缺少的是眼泪》（冉正宝文），文章说：“在语文教育的路上，我们失落了眼泪。当一切被技术化、机械化和制度化以后，语文也无可奈何地浸染了科技文明带来的流行病症——情感窒息，主要特征就是流淌不出真情的眼泪。”另一篇是《教育中不变的是文心与诗情》（胡修江文），文章写道：“回归到语文本身的意义，语文不是某几篇文章的字词积累、言语内涵，而是文学之心、诗性情怀的逐渐养成和深化。作为语文教育者，所执掌的是语言的帅印，所传达的是文字的深情，舍此文心与诗情，言语就会失去灵魂。”由此可见，语文教育必须关注情感文化，语文课堂必须营造令人动容的情感场。

文章不是无情物，师生俱是有情人，理想的语文课堂教学应该是以“情”贯穿的情感共振课堂；同时，语文课堂里师生涌动的情感不应是外加的、作秀的、硬性灌输的，而应是自然的、真实的、不露痕迹的。

曾经有一位老师教学《厄运中的海伦》一课，整节课的主打问题就是“哪些文字让你感动？想想自己为什么感动？”于是，学生就围绕着老师所要求的感动来述说自己的感动，虽然学生们也听从了老师的指导，纷纷站起来述说自己

所谓的感动，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和眼神中你却根本看不出有丝毫真正的感动。

同样是这篇课文，我在指导一位青年教师执教公开课时，指导这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是：“请大家认真读读课文，仔细想想，默默地感受一下，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海伦？”学生的思维马上如放飞的小鸟：我看到了一个聪明的海伦（仅用手指触摸就学会了说话）；我看到了一个勤奋的海伦（用盲文学会几国语言）；我看到了一个顽强的海伦（在厄运面前不屈服）；我看到了一个幸福的海伦（同时享有父爱和师爱）……学生的体验是多角度、多层面的，立体的，海伦的形象就这样在大家的交流中丰满起来。师生在整节课中没有说到“感动”二字，但课堂上却洋溢着深深的祝福和感动。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文化的建构，关键在教师，作用在学生。其基本的方法是：一是用文本的力量感召学生；二是用深情的话语感染学生；三是用创设的情境感动学生。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一次执教《一夜的工作》公开课，即将结束教学时，学生们哭了，许多听课老师流泪了，以至于王老师连说三遍“下课”，学生竟没有反应，仍然沉浸在对周总理无限的崇敬和缅怀之中。一篇内容本身并不非常感人的文章，怎么会有如此感人的力量？原来这是王老师综合运用三种方式，营造语文课堂情感文化的结果。在这一节课的教学中，王老师一次又一次地、不着痕迹地用多种方式积蓄学生的情感，提升学生的情感，不断掀起学生情感的波澜。例如：引导学生回顾课文感知周总理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补充介绍总理逝世前后的有关情况，然后启发学生

“孩子，你想说什么？”——这是用总理的品格感召学生。教师的讲述抑扬顿挫、张弛有度、饱含深情——这是用教师的感情感染学生。学生齐读《你是这样的人》之后，全体起立，观看《十里长街送总理》录像片段——这是用创设的情境感动学生。凡此种种，这样的教学，怎能不使人动情？这样的课堂，怎能不令人动容？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就这样在“文心”和“诗情”中得到了和谐统一。

这个例子也说明，语文课堂情感文化的建构，主要取决于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第一，教师应该是“情”的创设者和激发者。教师要积极营造自由、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以利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还要善于运用饱含深情的话语和体态、形象而有效的教学媒体，保证催生激发学生的“有情”“深情”和“用情”。第二，教师应该是“情”的表达者和传递者。教师要能够很好地领会文本和作者的情感，变“他情”为“我情”，还要善于把这种情感“迁移”到学生身上，润物无声地感染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着痕迹地自然地流露。第三，教师应该是“情”的保持者和调适者。教师不仅自己要保持与文本相一致的情感，而且要有效地发挥教学机制，掌控好课堂的“情调”与气氛，以保证学生的学习“情归原位”。

可见，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整合多种资源，运用多种方式，激励引导学生析文感情，披文入情，营造“情场”，因情育人，是我们语文教学，也是我们语文教育必须加以重视、研究并努力实践的。

跟着名家学写作，巧摹经典成佳文

——谈中考散文类文章的修改润色

文/重庆高新育才学校 李龙云

【摘要】谈起写作，学生往往面露难色，一是感觉无话可说，二是感觉不知怎样写才能写好。其实，根本没有一写出来就一定是好文章的说法。伟大的作家如此，初学写作的学生更是如此。本文旨在探索在文章修改时，巧用中外各种写作理论，借鉴名家经典之作，为学生修改文章提供切实可操作的方法，以期学生们能够真正学会写作，爱上写作。

【关键词】写作；文章；修改

海明威说：“第一稿永远是一堆臭狗屎。”作家对于自己的文稿尚且如此评价，那么，学生日常写作中不能一写就满意则再正常不过了。第一稿写不出好东西，不等于最终写不出好文章。因此，让学生跟着名家学习，借鉴经典文章技法，一步步地将自己的雏稿修改润色，最终完成一篇较好的考场文章，能够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就成为我们指导中考写作的点睛一笔。

一、分析习作，巧查布局

为何将布局的修改放在最前面来进行呢？一是，教学时我们发现，学生往往不能很好地搭建作文框架，以致写出的文章让人难以卒读；二是，夏老、叶老曾谆谆告诫语文学学习要从形式入手：

“中学里国文科的目的……都非从形式的探究着手不可。

“取少数的文章来精读，学得文章学上的一切，才是经济的办法。”

确实如此，作文的框架好比房屋的框架，框架不好，无论你用多好的砖石也无法修建出一幢

漂亮的房屋来。

有鉴于此，我们在指导学生修改自己的文章时，首先要求进行布局的检查。

（一）检查文章是否有完整的三个部分

关于文章要有完整的三个部分，中外作家都有一致的规范。

马骏在《散文写作教程》中是这样陈述的：

“文章的结构历来讲究的是‘凤头、猪肚、豹尾’，也就是开头要精彩，中间要扎实，结尾要有力。”

著名作家苏珊·M·蒂贝尔吉安在《一年通往作家路》里则说：

“约翰·厄普代克认为故事就应该做到凤头、猪肚、豹尾。

“短篇小说的基本结构包括三个部分：开头部分（人物的希望）、中间部分（人物的努力）、结尾部分（最终结果）。 ”

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中所选的朱自清的《背影》，就是这么一篇典范的文章。

基于此，我们可以画出一个文章的总体框架

来:



(二) 检查文章是否“开篇接题, 应题而作”

关于“开篇接题, 应题而作”, 马骏先生是这样说的:

“文章的第一段最好能在准确理解题目意思的前提下, 接题而作, 而接题而作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就是文中是否出现与题目相关的词汇、感觉、场景和事件等。”

何止考场作文如此, 许多名家作品也是如此, 《背影》开头一段就是如此: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三) 检查中间部分是否写好了三个片段

散文要写好几个片段, 马骏在《散文写作教程》中告诉我们:

“散文……通常由几个生活片段组成。这些生活片段, 表面上看, 时间、地点、事件互不相关联, 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存联系。写好生活片段, 是写好散文的基本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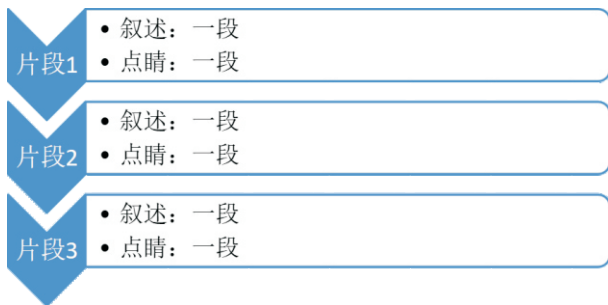
苏珊·M·蒂贝尔吉安在《一年通往作家路》里也提到最小故事的三个事件:

“童话, 经常会用到‘三’这个经典数字, 在中间部分写‘三项测验’。也许, 正如G·普林斯所说, 最小故事由三个相互联系的事件组成。”

看来, 无论是散文写作, 还是童话故事创作, 其中间部分都讲究写好“几个片段”“三个事件”。《背影》一文中, 中间部分就写了三个片段, 分别是: 奔祖母丧在徐州见父落泪, 办完丧事与父同行, 南京一别见父亲背影落泪。

因此, 初学写作, 尤其是在考场作应试作文, 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写出三个片段, 已经足

够了。当然, 学生在写作时, 尤其是在考场写作时, 除了中间要有三个片段外, 如果能够在每一片段后能进行点睛, 自然更好。这样, 将中间部分用图表示, 则如下:



为什么每个片段要叙述一段, 点睛一段, 这也是因为作品写出来后是要让读者懂的。“所谓好文章, 就是达意表情, 使读者读了以后能明了作者的本意, 感到作者的心情的文章。”(夏丏尊、刘薰宇)应试作文的读者当然是阅卷老师, 要让阅卷老师在极短的时间内明白写作者的写作意图, 自然更是不能不在每个叙述片段后都进行画龙点睛。具体怎么检查, 将在第二部分进行探讨。

当然, 有人担心三个片段太琐碎, 好像没什么写作价值。其实, 关于这一点, 还是夏、叶二老说得透彻:

“一是事物本身的不平凡。一是事物本身是平凡的, 但是作者对于这平凡的事物却发现了一种新的意味。从来记叙文的题材不外这两种。”

学生的生活本就平凡, 但是, 让他们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一种新的意味, 也是可以的。

(四) 检查是否做到“结尾点题, 立意隽永”

关于“结尾点题, 立意隽永”, 马骏是这样说的:

“从结构上来讲, 开头的‘接题’, 文中的‘扣题’, 最后的‘点题’, 贯穿才能形成文章的整体气韵。”

《背影》一文中, 朱自清是这样点题的:

“我北来后, 他写了一信给我, 信中说道: ‘我身体平安, 惟膀子疼痛厉害, 举箸提笔, 诸多不便,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 在晶莹的泪光中, 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

见！”

所以，修改文章，尤其是修改应试文章，仍然应该作如下检查：整个作品的最后一段，是否是对前面的总结点题；文章是否完整。当然，是否做到真正的点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分析习作，重研点睛

前面已经检查了文章的布局，学生已经修建好文章这个房屋的框架。下面，将要检查的是文章的点睛之笔。点睛之笔，夏丏尊、叶圣陶两位老先生称之为“新的意味”：

“从来会写文章的人，可以说，大概是能从平凡的事物里发现新的意味的人。”

“新的意味是记叙文的题材的生命。”

这新的意味，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心，主旨，具体到学生的作文，则需要靠点睛之笔来达成。

进行文章修改时，重点应当检查点睛之笔，否则，会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状况。

（一）检查每个片段是否有一个小的中心思想

夏丏尊、刘薰宇先生认为文章既有大中心，也有小中心：

“一篇文章虽有一个中心思想，……，总是联合几个小的中心思想成功的。为了使文章的头绪清楚，……，一个小的中心思想就当作一段，而一段中也只应当有一个小的中心思想。”

臧克家的《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的言行片段》，文章共写了两个片段，分别写的是闻一多作为学者和革命者的说和做。每一个片段又写有三件事，在每个片段后，都有点睛之笔。第一个片段后，是这样点睛的：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第二个片段后，则用了两段进行点睛：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在布局时，我们已经进行了“叙述+点睛”的布局，那么，现在要检查的是：一方面，叙述的文字是否与文章话题相关，如果不相关，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二是点睛之笔，是否与叙述的文

字相关，如果不相关，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检查整篇文章是否有一个中心思想

当三个片段的点睛检查完毕后，就应当进一步检查文章的最后一段的点睛是否与三个小中心一致，如果不一致，则需要进行修改。

以一篇学生课堂定时习作为例，该文的三个片段之后的小点睛之笔是：

“笑声似轻风，扫走愤怒，带来美好。”

“笑声似暖阳，扫走阴霾，带来希望。”

“笑声似种子，扫走沉闷，播种欢乐。”

文章总的点睛之笔有两段：

“耳边传来的笑声愈加放肆，打断了我的回忆，看着趴着看蚂蚁的孩童们，我也笑了：原来生活幸福的奥妙竟是笑声，这笑声能够击溃一切糟糕。”

“生如逆旅，一苇以航。笑声如光，带来幸福、希望。”

这里的总点睛之笔“原来生活幸福的奥妙竟是笑声，这笑声能够击溃一切糟糕”“笑声如光，带来幸福、希望”，则与前面的三个片段的点睛一致，且有所升华。

（三）文中的三个片段的叙述文字可否多写

有时候，我们发现，利用一段文字进行相应的片段叙述，达不到自己想要展现的生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文章的片段叙述则有两段，甚至更多。学生习作中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但要检查是否有必要，如无必要，则要大加舍弃。夏丏尊、刘薰宇则强调：

“文章的内容若十分复杂，一段里面还可分成几小段。分段的标准或依空间的位置，或依时间的顺序，或依事理自然的秩序，全看文章的内容怎样。至于每段的长短，这是全无关系的。”

因此，检查文章的点睛之笔，还应当看文章的叙述文字是否不止一段，有无必要。

臧克家的《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的言行片段》第一个片段的第一件事，叙述闻一多潜心完成《唐诗杂论》，就用了两段文字来写。而该片段的另两件事，完成《楚辞校补》和研究《古典新义》，则只用了一段文字叙述。第一件事详细叙述，这是与作者赞扬闻一多锲而不舍的学者

精神相一致的。后两者有所重复，则简略交待即可。

三、分析习作，智用对白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学生写出来的作文，只知道一味的叙述，比流水账强不了多少，读来无味。那么，有没有什么可操作的方法让学生的习作更具可读性呢？有的。只不过，我们国内的写作教材在此方面缺少研究，鲜有方法。

（一）检查文章中是否选取了适宜的材料

菲利普·罗帕特则用自己的亲身创作经历告诉我们怎么进行散文写作：

“非虚构作家不得不筛除一些事实，合并一些事件或者重新调整发生的时间。”

“近年来……小说和诗歌的技巧被应用于非虚构：‘展现’但不‘讲述’……（我……在自己的个人散文里也用上了对话场景）。”

他谈到散文的创作时，明确告诉我们，散文创作要诚实，但不等于不筛除一些事实，不等于不可以进行艺术化处理。夏、叶二老也反复告诫我们，“依了文章的意味，从题材所包含的事项里选取一群适宜的材料，这是第一步”，“任何微小的事项，只要运用得适合，就会成为很重要的材料”。

朱自清的《背影》，三个片段，就是从生活中选取了一群适宜的材料，因为运用得合适，就成为了重要的材料。材料虽然普通，因为运用得当，写出了人之常情，《背影》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

（二）检查文章中是否智慧地使用了对白

苏珊·M·蒂贝尔吉安则结合自己的写作与教学经验，将故事变得生动的方法和盘托出：

“约翰·加德纳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每个故事都由三个单元组成：一组描写，一组对白，以及一个行动。正是这一组对白令人物栩栩如生……”

是的，一组描写，一组对白，一个行动，可以让学生们在习作时写得更生动些。其实，名家之作也多如此，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朱自清的《背影》都做到了有对白、有描写、有行

动。陆定一的《老山界》，几个片段中，很好地运用了对白、描写、行动。其中，“瑶家攀谈”片段，对白（包括直接对白和间接对白）居多；“绝壁睡觉”片段，也有一些对白，但描写居多，描写了山脚所看到的“之”字形火把接上天的奇观，描写了“之”形路上仰望、俯视所见，描写了半夜冻醒后所见所闻。

以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第三段为例，我们将它的对白分别排列如下：

（1）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

（2）“什么时候？”

（3）“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

（4）“好吧，就明天。”我说。

（5）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

（6）“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

（7）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这些对白，全是直接对白，母亲的话分别在前后加有引导语，我的话有两句则没有任何引导语。上述文字中，加粗的文字，则是母亲的行动。

因此，修改文章的最后一步，是检查文章的叙述部分。

1. 检查片段中是否有一组对白
2. 检查片段中是否有一组描写
3. 检查片段中是否有一个行动

上述三项检查中，至少要保证有“对白+行动”，这样，文章才会有可读性。

总之，“文章不厌百回改，佳作常从改中

运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进行有效作文教学初探

文/重庆市合川区育才学校 肖晓旭

【摘要】作文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教师如果只把目光圈定在作文教学上，忽视了作文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不能立足当下生活，放眼学生的未来生活，那么作文教学不仅当下是低效的，更是无助于学生以后的生活。作文教学应“用生活来教”“在生活中教”，培养关注真实生活，用作文的方法解决问题、传播思想、促进“大我”发展的能力，教出德才兼备的“真人”，教出符合时代发展、能改造社会的“真人”。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作文教学

在基础教育阶段，每学期对孩子进行专门的作文辅导不少于8次。市面上出售的琳琅满目的作文集数不胜数，网络上针对作文教学的音频、视频也如雨后春笋，有心人士都在努力打破作文“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局面，但如果教师只把目光聚集在作文教学上，忽视了作文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忽略了教师只是借着作文教学培养“做生活的主人”这一目标，那么就算学生能按老师的要求，会写几篇或者几类“作文”，但放眼学生终将进入的社会背景中，这样的教学结果也只是低效的。要想激发学生用文字表达的兴趣，形成提高高效表达的内驱力，为学生未来的

生活奠基，教师就得着眼学生的生活，为生活而教，用生活来教，在生活中教。陶行知校长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作文教学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

一、为生活而教

（一）培养人格健全、能力全面的人

陶先生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一颗赤子之心审视教育的功能，着力培养“真人”。

1. 培养敢写真话，敢于自我反思的“真人”

真人就应该直面问题。如果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我们发现了各种尚待解决的问题，只一心

来。”没有修改，就没有鲁迅的《朝花夕拾》；没有修改，更不可能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当然，没有修改，也不会有学生写作上的进步了。

【参考文献】

[1] 苏珊·M·蒂贝尔吉安. 一年通往作家路[M]. 李

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 菲利普·罗帕特. 散文写作十五讲[M]. 孙冬，译.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3] 夏丏尊. 七十二堂写作课[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

[4] 夏丏尊. 文章作法[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想要截取生活的小片段，以纯粹的“作文教学”为借口，逃避问题，那么，学生在教育这个场里获得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的眼光短浅，当面对真正的生活，他们也必遭挫折。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作文教学的三大病症——假、大、空，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学生不敢说真话，作文也就成了一个脱离真实生活的负担。如果教师能让学生敢于记录生活，表达真实情感，暴露自己的不足，甚至直面自己认识上的偏差，那么教师就有机会，用一颗真诚的心，用专业的知识对学生进行专业性的指导。

这种基于学生生活、服务于学生生活的真实教学是学生需要的，也是真实有效的，不仅能让学生拨开成长中的迷雾，既养成了“公德”，又培养了“私德”——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遵守规则与道德的品质。培养敢于追求真理、有道德的“真人”，是教育的目的，也是作文能借“抒发真情实感”走向目的的有力途径。

2. 培养在能力上会应对、敢创新的“真人”

育才“二十三常能”要求学员“会当书记”（“书记”一词在这儿当“书写、记录”讲）“会应对进退”“会烧饭菜”“会种园”等，陶先生主张“生活即教育”，生活所需要的，教育都可将之纳入其中。

我们现在的课程体系按不同的科目教学，但教育人都心有总目标，各科应分科不分家，总体推进“人”的教育。

作文教学是语文学科的一大部分，它不仅培养学生会写几篇通顺、流畅，或者“能表真情实感”的文字。更应该让他们借用作文的方式观察世界、提升自我、做出贡献。我们不仅要教学生如何表达，更要教会学生如何思考、让学生感受改变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快乐，成为德才兼备的“真人”。

（二）培养符合国家需要、时代需求的人

1. 推动“终生学习”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我们不应只重视当下的积累，还应培养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的态度、能力和习惯，为“终生学习”打下基础。

写作能推动“终生学习”，写作者通过写

作，懂得反思，促进自我成长：通过写作，积累素材，在更大的时间跨度里找到参照的对象：

“输出”倒逼“输入”，写作能有效推进“阅读”。

作文教育不仅着眼于学生的当下，还应着眼于学生的未来。

2. 传播“研究成果”

国外重视写作教育，尤以美国最甚。从小学写作起步，到投入各行各业，他们无不以相应的文体写作，记录、传播自己的思考、发现。

现今，国内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教学多以记叙文为主，再细分为写人、记事、写景、状物几大类，对应用文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充分。比如笔者所用教材西师版在应用文的选择上，只有带留言条、通知、书信。但我们应该着力学生生活需要，拓宽写作用文体。除表扬信，道歉信、倡议书、启事、新闻等应用文，在学生生活中发生了相关的事情，教师就可及时指导外。研究报告、策划书、主持词等思维含金量高作品也应适时教授。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传播写作者的“研究成果”的作文课，能培养与时俱进的创新人才。

3. 加速“大我”形成

“生活教育”理论下的作文教育，不仅关注学生个体的成长，还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教师运用作文这一媒介，可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学生用笔发表对班级事情的看法、对当今热点事件的评论，这不仅是作文教学，还是公民教育。

笔者所在学校大力推行“小先生”制。我的作文教学也采用“小先生”制，形成师帮师、生带生、师帮生、生帮师的良好教学氛围，师生们积极探索、乐于分享，“即知即传”“自觉觉人”，用“小我”的成长，带动“大我”的发展。

“位卑不敢忘忧国”，当孩子们具有通过“小我”成长带动“大我”发展的意识，正能量的传播与挽结就会加速“大我”的形成。

二、用生活来教

（一）生活才是作文的来源

陶先生说：“要是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立足儿童生活，才是教育的基础。

曾经“游戏作文”活跃在作文教学的舞台上，但教师们发现，如果每次习作前，教师都要组织学生来一场游戏，学生才能动笔，那不仅浪费时间，让作文与生活形成两张皮，还让学生养成了被动学习的习惯——教师不给素材，学生就“没米下锅”。

叶圣陶也曾说过：“生活如泉源，文章如溪水，泉源丰盈，溪流自然活泼泼地昼夜不息。”作文不用脱离于学生生活另起炉灶，我们应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的大小事情，哪怕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对作文有所裨益，可提供无穷无尽的源泉。

（二）作者的独特性是生活多彩的根本

面对相同的素材，不同的作者表达的情感、观点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经历，这种差异性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学生不必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懊恼、自卑。挖掘学生个性的体验和风格，是作文教学内容上的法宝，更是接纳学生、培养健康人格的重要起点。

一个孩子写班里的“话包子”片段为：

肖老师怒视他多次，他还是放不下那颗八卦的心，一会儿就又转身和旁边同学“谈论人生”去了。尽管他吸取教训，懂得用手捂着嘴巴，将头埋在桌子下，以免“雷达”检测到，但肖老师是何等人士——千里眼呀，于是人赃并获，落得个“凉凉”下场！

可他“话心不死”，下课后，话篓子必定又得打翻，凑到人多的地方，畅谈他的“王氏哲理”。

另一个孩子也写的同一个人，片段如下：

不过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也有他的优点。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和好友正在玩游戏，一阵“疾风”吹过——啊，好痛！我的脚快残废了！是谁？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这个风一般的男生——李岩松。我正想和他说

说理，他却面露凶相，准备恶人先告状。只怪李岩松命不好，碰上了王桂鑫这个话痨。王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破口大骂，他的眉毛一皱，眼睛里透着杀气，谴责道：“李岩松！你怎么能骂女生，太可耻了！……”王桂鑫难道是唐三藏转世，竟然会念“紧箍咒”。李岩松也是一个苦命的“孙悟空”，遇上了王桂鑫这个“师父”。看着王桂鑫的嘴巴不停地翻动着，上万个音节不断地冒了出来，我的头也要残废了。不甘示弱的李岩松出击了，他俩争过去争过来，我倒成了享受VIP的吃瓜群众。不出我所料，李岩松败在了话唠大王——王桂鑫的“金口”之下。败了的李岩松宛如丧家之犬乖乖地给我道歉——李岩松能乖乖认错也是我们班的一大“奇葩”事。

原来话多能“变废为宝”哇。

两个同学都用调侃的笔调写了同一个人，但一人纯写他的不足，流露出无奈，一人用自身经历发现同学话多的好处，明“损”实“夸”。一个概括地写，一个用具体事例传情，但两段文字都是自由表达的产物，毫无套话、空话。

有人喜欢写人，有人擅长写景，有人爱用幽默的方式表达，有人钟情于端庄的文字风格。我把他们的文章放在一起，让大家比较异同，发现自己的特征，学习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雕琢自己的灵魂，这样多彩的生活，正是基于尊重孩子们的“独特性”。

三、在生活中教

（一）让作文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周先生主张“生活为教育之全部”，教育者要关注“怎样把教育去纳入儿童生活中”，所以生活发生变化，教育的方式也必然跟着变化，教育应该敏感而深刻地体察生活变化所呼唤的需要。

教师在作文教学中，目光不能只盯着作文表达的生动、具体，也不能只追求思维的深刻、审美的高雅，我们是在用作文的方式，联通学生的经历、体验，还有他整个生命的体悟、行为，联通他与世界的关系。

当生活中遇到问题，我们可以思考：该如何

解决问题呢？用作文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吗？在解决的过程中，我有什么值得记录，对今后的自己或他人可作参考、有所启发吗？

比如手机的普及给众多家长在育儿上带来烦恼和困惑：该不该让孩子使用手机？如何指导孩子使用手机？我让孩子们分小组讨论，在讨论中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让观点一致的同学合成一队，分成正方和反方，开展一场辩论会。在教如何演讲的过程中，有很多同学选择“该不该使用手机”“如何使用手机”这类主题。在思维的碰撞中，学生多方参考他人意见，形成自己较成熟的看法，然后写入作文里，不仅观点鲜明，事例鲜活，而且情感丰沛，表达生动。关注生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样的教学带给学生的成长，比“画地为牢”的传统作文教学方式更有效。

在讨论、辩论、作文中，大部分学生认为我们可以合理使用手机，那么该如何合理利用？经过集思广益，我们单针对“手机如何帮助助推作文进步”就有如下尝试：

1. 网络中的培训资源可为利用

“喜马拉雅”“快哉”“荔枝FM”等APP里的作文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并且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学生可以多方吸收营养，就算在乘车、步行等不方便阅读的情况下，他们也可持续不断地学习。

2. 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展示空间

微信朋友圈、QQ空间、公众号、美篇、校讯通等，都可以成为孩子的作品展示平台，还可以利用“趣配音”“唱吧”“喜马拉雅”等软件及时录制作文，推送到各个平台，让伙伴们相互鼓励欣赏。这是孩子的日常生活，也是作文教学！

3. 手机为孩子的作文发表提供更大可能

如今，手机的语音识别功能非常强大，学生可以在微信、QQ对话框里输入作文内容，让手机转换成文字发给老师。电子件的使用不仅有效避免“多次修改，他人不易辨认”的缺陷，而且教师可发语音及时对孩子做具体、有针对地指导。定稿前，学生借助手机输入的词组功能，检测容

易出错的字；定稿后，孩子的作品不用再单独输入，发表更快捷。

单是手机对作文教学的作用就非常大，更别提它能带给孩子在其他方面的好处。但孩子们在讨论、辩论、写作中渐渐明晰，使用手机的时间把握不当，使用用法不对，反倒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立足儿童生活，解决生活难题，作文也可以是解决的方法之一。

（二）抓住“冰山一角”，积极改变生活

作文不仅可以被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还可以主动出击，改变不太合理的生活。

1. 指导家庭教育的开展

教师经常听到家长抱怨孩子“拖拉”“不阅读”“用口水话写作文”，但他们束手无策。育才就用出校报、班报、校讯通、编撰家庭教育手册、录音频、录视频、开家长会、办沙龙等方式，主动参与到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中。

教师为了能把问题的症结说清楚，指导的方法、步骤说明白，必须研究适切的表达风格，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明白蕴含教育学、心理学的深刻道理。教师们不由自主地学起了陶先生的“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言浅意深的写作方式。

作文的积累与训练不能只靠学校教学，家长的参与可以让孩子更懂得留心生活，增加亲于情感，做到“生活即教育”，于是作文教学主动担负指导家庭教育开展的工作。

我们教给家长指导孩子作文的方法——他们与孩子聊天时，可有意识地要让孩子知道如何表达心理感受，家长可以分步骤训练孩子描写心理的方法：直接表露想法——用语言表述心理——用行为透露心理——语言与行为齐上阵——写景只为表心理——通过幻想写心理——“浮现情景”表触动。由易到难引导孩子生动表达自己的想法。

交谈中，家长要积极发现孩子表达上的优点，这样，不仅降低作文训练的难度，无形中提高了孩子的作文能力，还增进了亲子关系，增强孩子自信，打通作文与口语、阅读、甚至其他科目的厚障壁，实现家庭与学校共同育人，在生活

中育人的目的。

2. 像个作家一样生活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扩大活动环境”，他说：“需要研究农事，教室就在旷野里；需要研究工业，教室便在工场里；要研究商业，教室便在市场里……”，同样，我们指导孩子的作文，就得引导孩子像个作家一样生活，“教育者要最先指导儿童对于学习的事项……再应用所得之具体经验，与融会贯通的智识，以树立新的概念”。

很多作文课，只关注作文表达愿望、技巧，但对向作家学习严谨的生活态度、规律的生活方式、独特的解码方法、寻找灵感的方法等关注不够。也就是，教师关注的是冰山浮出的那个角，认为把表达技巧这个“关键问题”解决了，作文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用系统的眼光看待“作文指导”，我们就能追索到生活这块水面下的冰山宝库上来。

(1) 写作时间有讲究

比如，在什么时间写作文这个问题，教师可以指导孩子由“固定”到“任意”，形成一个完整的训练点。

学生写作文，很大的毛病在于拖拉。一晃时间过去了，他还在“构思”阶段，甚至有孩子早由不专注的“构思”，跑到一边玩去了。那么，他们的作文时间也是需要我们指导的。

写作文前，我要求他们只能用五分钟思考，然后按下一个“番茄钟”开始动笔，时间一到立即停笔。表面看，如果孩子没有表达完就搁笔，会打断孩子的思路，不利于孩子流畅的表达，实际上，他们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思维高度集中，更多灵感会在写的过程中催生，养成高速完成任务的习惯。时间感的培养不仅有利于作文教学，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同样重要。

我让他们一回家就记录“每日素材”，每天在固定时间开始，一个番茄钟后结束，这样的生活方式让孩子体验到当作家的快乐。当他们能做到一到固定时间就能聚精会神作文后，我建议他们把番茄钟的起始时间换到其他时间试试，去发现哪个时间段最利于自己的表达。当学生找到适

合自己作文的时间和节奏后，我们又挑战“任意”时间段开始，学生都能高效表达。

虽然，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教学、甚至初高中的作文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作家，但把学生放在带着“作家场”的环境里学习，学生从意识到行为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如在英语的环境里学习英语一样，“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让孩子尝试过作家一样的生活，就是他们正在学习的生活之一。

(2) 为“作家一样的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引导孩子过“作家一样的生活”，就得让孩子养成“作品意识”。我把孩子的作品推向各大期刊、报纸发表，还通过举办班报，推荐给校报的方式，以及在公众号里推出，在微信、QQ群里晒，期末把孩子的作文本设计成一本含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序”结构完整、推画和排版精美的“个人专著”的方式，平日里是采用制作“豆本”等方式培养孩子的作品意识。

作文教学名师管建刚在作文教学中，运用系统化操作模式，把作文教学做得风生水起。这个系统包括作文的“骨构系统”“动力系统”“助力系统”“保障系统”“训练系统”“理论系统”。虽然在当今的作文教学中，似乎还没有谁能超越管老师的作文训练系统，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他的系统也只是在他的反复实践中锻造的“工具”。陶先生在《科学的生活》里写到：“第一流的科学家没有不自造工具的。”我想，这也适合所有的作文教学者。管老师在十几年的作文教学中反复实践、思索，再实践，再改变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工具”，在《我的作文教学革命》出版后又不断丰盈，不断提升，生活在变，他的“工具”也在变。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作文教学是语文学习中的重要内容，它与学生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表达息息相关。陶先生教导我们：只有生活的教育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教育。我们应该“为生活而教”“用生活来教”“在生活中教”，通过“生活教育”理论的合理运用，有效促进“作文教学的改革”。

育才科创|育才学子荣获重庆市中小学生科技节表彰“大满冠”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重庆市第十一届中小学生科技节小科学家、小发明家、科技小能手评选结果的通报》(渝教基函〔2023〕6号)文件显示,我校高三9班刘杭荣获“小科学家”荣誉称号,高三6班李赟泽荣获“小发明家”荣誉称号,高二17班刘宸呈荣获“科技小能手”荣誉称号,特此祝贺。



指导教师沈菊颖与获奖学生合影



小科学家——高三9班刘杭
科创经历
第十七届宋庆龄
少年儿童发明奖(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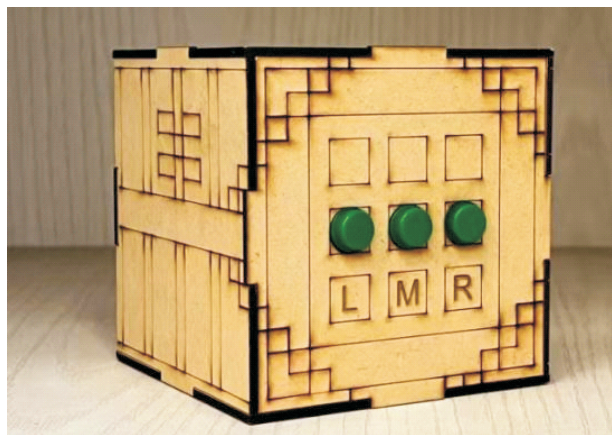
赛区) 金奖

第二十三届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创意智造项目二等奖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二届青少年专利
孵化展铜奖

获奖感想

能获得重庆市“小科学家”这项殊荣,我感到非常荣幸。学校的创造文化让我对科创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了解了科学项目研究的全过程,生活实际问题解决的方法创新创意成果物化的途径。我会时刻铭记老师的教诲,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科创作品——发型及妆容推荐系统

【参考文献】

- [1]胡晓风 金成林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
[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227-249.
[2]多萝西娅·布兰德著.刁克利译注.《成为作家》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版).51-56.

[3]刘娟娟.《叫你发现语言密码》[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版).78-83.

无论是出门前的打扮，还是不满足于现今自身的风格，发型和妆容都是想要改变外在形象的必选题，基于人工智能和激光雕刻技术，刘杭同学制作了一款发型及妆容推荐系统，帮助人们提升形象自信。



小发明家——高三 6班李贻泽

科创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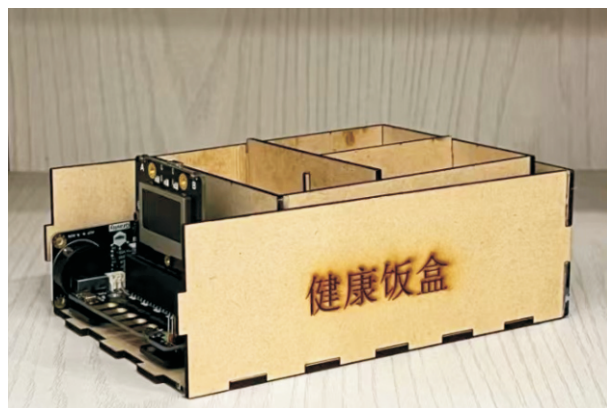
第十七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重庆赛区)金奖

第二十三届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创意智造项目二等奖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二届青少年专利孵化展铜奖

获奖感想

能够参加学校的科创项目，我深感幸运。学校为我们搭建了发明创造平台，提供了实践创作的机会，组织了金牌导师团队悉心指导我们创造发明项目，这些体验为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创作品——智能健康饭盒

智能健康饭盒旨在根据使用者的BMI(健康状况)监管其每餐摄入热量是否合理，结合手机app做到长期记录，帮助使用者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科技小能手——高二17班刘宸呈

科创经历

第十七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重庆赛区)金奖

第五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线上选拔赛

开源硬件创意智造专项赛一等奖

第二十三届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创意智造项目一等奖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二届青少年专利孵化展银奖

第37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获奖感想

这份荣誉不仅是团队相互协作的结果，更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与老师的谆谆教诲。感谢学校给予我在硬件、软件、设计等方面上的教育，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到编程、3D打印以及视频制作等课程。相信在学校老师的指导和自己不断努力下，我一定可以再创佳绩！



科创作品——居家智能食材管理员

该作品基于AI技术、3D打印技术和MQTT技术，借助多种互联网平台，利用开源硬件设计并制作了集食品保质期计时、烹饪指导功能于一体的居家智能食材管理工具。

科创简介

学校高度重视科技教育，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科普教育和科技创新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打造了近2000余平

方米的科创中心，该基地被评为重庆市九龙坡区科普基地、重庆市智慧教育优秀示范基地；组建了10余人科创导师团队，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D打印、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活动，致力于培养科技拔尖创新人才。



3D打印与单片机操作

近年来，科创团队指导学生参加国内外顶尖科技赛事获奖1000人次以上，其中荣获国际一等奖3项、全国一等奖20余项、重庆市一等奖300余项；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1人次，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2人次、提名奖1人次，重庆市九龙坡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7人次。

学校曾荣获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培育奖，先后被评为九龙坡区“十三五”科普工作成绩突出单位、重庆市科技特色学校、全国人工智能科普优秀示范基地。研究成果《生活教育模式下中小学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与实践研究》荣获2021年重庆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亚洲亚军！育才学子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设计了一座太空港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在刚刚公布的第30届国际太空城市设计大赛 International Space Settlement Design Competition(简称ISSDC)亚洲总决赛获奖名单中，重庆育才中学勇夺亚军，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获奖学校。

- * The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ephaestus
- * Chongqing Yucai Secondary School
- * Beijing Royal School-Terra
- * Beijing Royal School-Space A+The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enzhen-Rezero
- * Hangzho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Zeitgeist
- * Tsinghua International School-Bread
- * Shanghai Shangde Experimental School-Leonid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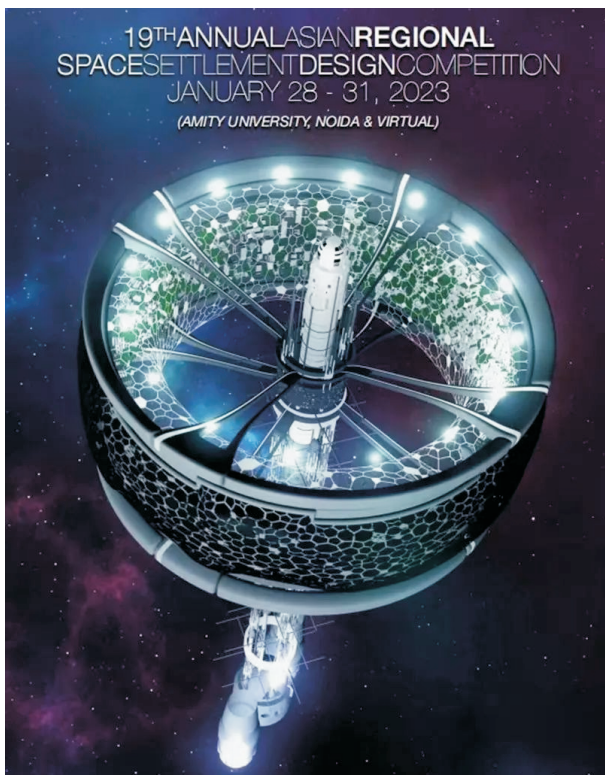
官方获奖名单

集结，“未来纪元”的设计者！

星河浩瀚，到太空中生活是人类的梦想，也是人类脱离摇篮时代的标志，在陆续实现将人送到太空，能够在太空中短期驻留之后，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出现了，那就是建立太空城市，建设人类生存的第二家园。

国际太空城市设计大赛，这个听起来就充满科技感的比赛，将宏伟未来城市的设计权交给全球最具想象力的青少年们。这项在全球太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高中生竞赛，最早由一群美国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工程师和宇航员发起，面向全球8-12年级的学生开放。参赛选手需要组成12个

人的团队，按照Request For Proposal(RFP)的要求，设计自己独特的太空城市方案。



早在2022年初，重庆育才中学国际教育中心的竞赛教练尹老师便将目光聚焦于这项含金量极高的综合性学科竞赛。

一座太空城市的设计，要求学生具备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自动化、材料、能源、商业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为此，尹老师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将大赛相关的信息给同学们做了全面的科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育才中学搭建

起一支由高一和高二AP班12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伍。

从零开始，构建地月间太空港！

自古以来，我们一直都对天空有着无垠的憧憬和梦想。嫦娥奔月、夸父逐日，敦煌壁画中高飞入云的神女，无数星相学家凝望星辰的感悟笔录，都是古人对浩瀚星空的遐想和探索。而将遐想落地，甚至从零开始搭建一座适合人类居住的太空港，是摆在育才参赛学生面前的目标与难题。

自参加ISSDC以来，我校对该竞赛高度重视。育才国际教育中心尹老师、张老师、陈教授携手参与GFSSM 2021的学长、学姐对新一代“太空工程师”们展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天体力学基础、材料科学、宏微观经济学基础、数字建模基础等。太空城市竞赛考验的不仅仅是同学们对于物理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它更强调文理结合，要具备实际的社会参考意义。



国际教育中心老师对学生进行竞赛培训



我校物理组竞赛教练指导学生积极备赛



我校信息中心老师指导学生进行3D制图模型设计

ISSDC的设计方案要求用英文书写，需要涵盖概要设计、结构设计、基础设施和运行、人居与安全、自动化与服务、商业开发等六部分内容，完整地描述一座太空港的设计和建造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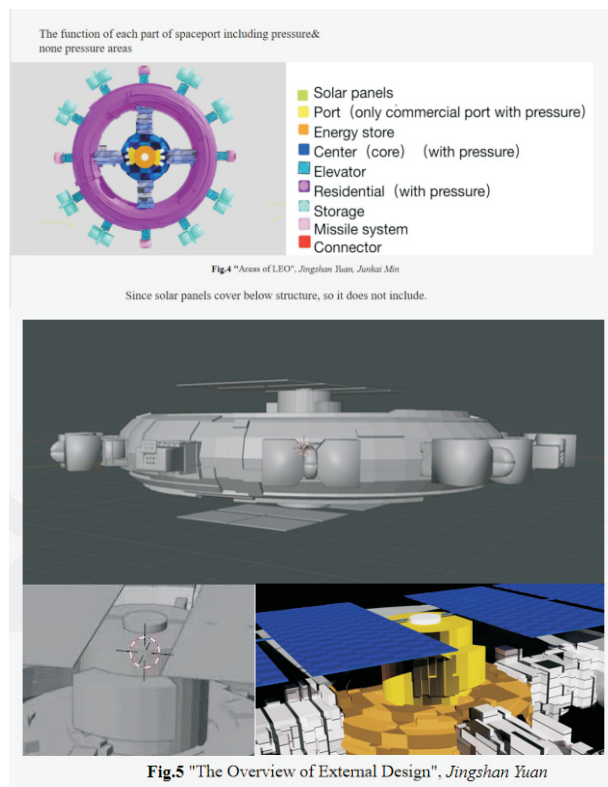


Fig.5 "The Overview of External Design", Jingshan Yuan

同学们搭建的太空港部分设计图

“我们也遇到过许多困难。”一位AP班参赛队员说到，“因为疫情造成的交流障碍和设计意见的不统一，我们曾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但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通过线上多次耐心磨合，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共识，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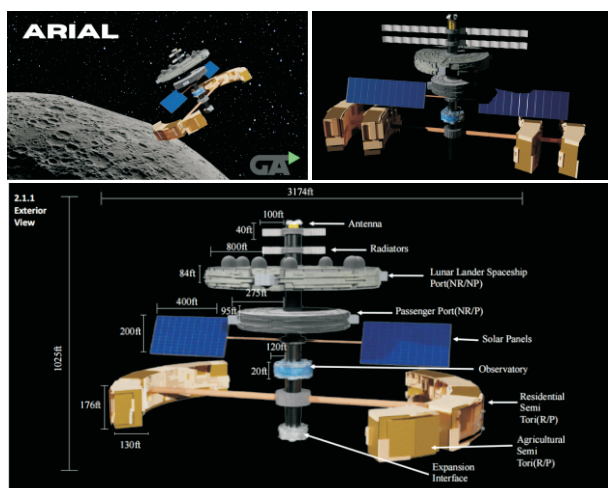
未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从古至今，无数能人志士都对在太空中建设人类家园提出过自己的构想。而在ISSDC竞赛中，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需要有包含附录在内的八大版块。第一部分主要搭建整体设计，向读者阐明团队希望在这个太空城中提供什么，需要怎样的耗材；第二部分落实到每个细节，阐述城市的结构和具体的分布；第三版块则是解释如何搭建、运营、设置怎样的基础设施等。

看似庞大的工程，在育才老师和AP班参赛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慢慢有了清晰的框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国赛中首次出战的育才参赛队，便赢得了西南地区唯一一张亚洲赛的入场券。

首战告捷的战队成员们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备战随后而来的亚洲赛。

队长刘博元谈到：“太空城市竞赛是一个综合的竞赛，每个人的工作都十分重要，我们团队无论缺少谁都无法存在。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学好专业知识，才能让我们的太空港在整体规划和细节方面都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设计背景

2043年，The Foundation Society计划在地月空间建立一个能容纳2000名常住居民，可扩展为10000居民并命名为“Arial”的太空港。它可以用



夏颖副校长全程十分关心同学们的比赛进程

作轨道间的航天器和运送货物及乘客的航天港。

亚洲赛的比赛过程更加艰辛。准备提交方案前的最后36个小时，同学们的脑力和体力都在极限拉扯。他们自发来到学校，以便更高效率地进行沟通；有的同学甚至彻夜未眠，精修最终的设计方案。

大家最终能取得亚洲区决赛亚军的好成绩，作为竞赛指导教练的尹老师并不感到意外。

“从作品准备到参加亚洲区决赛，我明显感觉到学生配合越来越默契，沟通效率愈加提高，大家逐步适应了一个团队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务的氛围。”尹老师说到。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唐朝诗人李白千年前的遥想如今已被现代科技转变为现实，那么，太空城市的建设在不远的将来想必也是大势所趋！

这样的赛事经历，也许是参赛同学们成长过程中一件微不足道的成功，也或许，会为他们埋下未来深耕太空事业的种子。

从这里，他们将走向星空。



育才中学ISSDC参赛队伍合影

全市第一|育才多名学子入选重庆市2023年“英才计划”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心怀创新志向 追逐科学梦想

近日，重庆市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英才计划”）选拔工作圆满完成，全市报名学生经过笔试、面试选拔，经导师审核、名单公示以及全国管理办公室审核后，共有25名学生最终入选2023年中学生英才计划培养名单，其中我校共6名学子入选，录取总人数位居全市中学最前列！



英才计划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有关要求，切实促进高校



优质科技教育资源开发开放，建立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方式，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自2013年开始共同组织实施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英才计划”），培养周期：1年。

2023年重庆市成为中学生“英才计划”正式实施单位。主要由市科协、市教委、市教科院、重庆大学联合实施，通过选拔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中学生走进大学实验室，阅读科研文献、参加学术讨论、听取学术报告、开展课题研究，使中学生感受名师魅力、体验科研过程、激发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科学志向。



见面会现场

英才见面会

2023年2月18日下午，重庆市“英才计划”见面会在重庆大学A区举行。重庆育才中学刘刚副校长带领新学员前往重庆大学，与各学科导师团队进行面对面深入交流。

学员心得

罗悦鸣（化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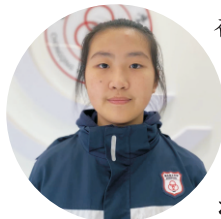
新的开始新的梦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会积极参与项目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断提升自己的化学素养！

秦诗韵（计算机）

很有幸能参与到英才计划的培养当中，这让我结交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让我更加确定了对计算机的兴趣，也使我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愿自己学有所获，不断成长。



刘奕涵（生物）



奋楫扬帆正当时，不负青春争朝夕。科研是不断探究，追寻真理的过程，愿自己学好必需的科学知识，掌握必需的科研方法，提升必需的科研精神，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杨珩艺（生物）

无论是冬令营中专家教授的学术报告、学长学姐们的经验分享，还是开营仪式中与教授、同学们的交流探讨，都激发着我对研究生物课题的热情，辅助着我怀抱踔厉奋发之心，追逐生命科学的星辰大海。



喻科霖（物理）



游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物理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希望自己可以在物理的逻辑世界筑梦远航。

刘博元（物理）

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学会感恩、学会做事、学会做学问，以此自勉。



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秦诗韵（计算机），刘博元、喻科霖（物理）、杨珩艺、刘奕涵（生物），罗悦鸣（化学）等6位育才学子将进入重庆大学实验室参加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和科研实践，希望他们砥砺前行，逐梦远航！

誓师冲刺 | 决战百日，折桂蟾宫，育才加油！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时维孟春，岁于癸卯，青葱少年马蹄疾，意摘六月长安花。2023年2月27日，料峭春寒时节迎来了少有的暖阳天，“决战百日，折桂蟾宫”育才中学高2023届百日誓师大会在谢家湾本部运动场上隆重举行。

并肩作战是三年同窗的情谊，全力以赴是为梦而战的纯粹。下午四时许，各班旗手手持各班创意红旗，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各出奇招、各有新意，向着同学、老师和家长发出百日誓师“最强音”。台上摇旗一呼，台下必有回应，高

2023届的同学将青春的誓言洒满天空，久久不停，尽显青年本色！



高2023届百日誓师大会现场

高2023届胡宝银主任将自己的名字解释为高2023届高考“保证能赢”，并激励全体学子说：“最后的一百天，大家都是奇迹的创造者，只要坚持耕耘，培养前进的锐气和沉稳的静气，必能‘手摘星辰，折桂蟾宫’。”



高2023届年级主任胡宝银发言

学校是学生的主场，更是教师和家长的台前幕后。高2023届学生家长代表在主席台的演讲真实地打动了无数学生的内心。她说：“今生何其有幸，我们与你们相遇”。高三的快节奏让这群十七八岁的少年懂得为一个目标努力的坚定，也让亲情的慰藉显得弥足珍贵，家长在台上给孩子做出了承诺——“你只管往前冲，我们为你们守好后方”，同时给孩子加油打气并提出美好祝愿：“吃得苦中苦，都上985，烦恼抛一抛，都上211。”



高2023届学生家长代表发言

站在幕后的家长也写了些“悄悄话”讲与孩子听。“给孩子准备两块糖，奖励他们的努力；跟孩子三击掌，为100天加油。”在此温情的环节，许多家长和孩子潸然泪下，唯有苦过，方更知感动，理解父母，是这群少年走向成人的第一步。



学生代表兰紫馨同学从学生角度回忆了这三年走来的一些辛酸，也真实地讲述了高中三年带给自己的蝶变，最后从时光易逝，珍惜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等角度向全体同学发出号召——愿你我，快马加鞭赴前路，振翅逐风上青云！



高2023届学生代表兰紫馨发言

全体高三老师们也在宋毅老师的领誓下首先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在这最后的一百天里，老师们将继续坚定信念，无私付出，守好讲台，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站好每一班岗位。

而今天的主角——高2023届学子，也共同吼出最青春的誓言，坚定最后百日的学习信念，坚





守自我努力不放弃，坚信未来六月金榜题名。青春的姿态正是奋斗的姿态，少年负壮志，奋烈自有时，这群少年必将在六月唱出最动听的青春之歌。

凌风破浪击长空，擎天揽日跃龙门。激越的宣誓仪式后，跃跃欲试的学子们等到了校领导们的寄语祝福，校领导们鼓励学子正当乘时代好风，随壮志青云直上，并寄语高2023届学子“愿你们从育才出发，奔赴属于你们的美丽世界！”



高2023届百日誓师大会现场

十年争渡，只为前方；
百夜秉烛，只为荣光，
高2023届的陶子们
愿你们书写无悔答卷
再创育才辉煌！